

现代思想译丛

市场体制的秘密

THE MARKET SYSTEM

[美]C·E·林德布鲁姆

Charles E. Lindblom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本电子书制作者

江苏人民出版社

现代出版社

F014-36
1

★
主编 吴源
策划 余江涛

市场体制的秘密

THE MARKET SYSTEM

[美]C·E·林德布鲁姆
Charles E. Lindblom

耿修林 译
0018-054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体制的秘密/(美)C·E·林德布鲁姆著;耿修林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ISBN 7—214—03083—7

I. 市... II. ①林...②耿... III. 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研究 IV. F0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0617 号

书 名	市场体制的秘密
著 者	C·E·林德布鲁姆
责任编辑	蒋卫国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页 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083-7/F·675
定 价	1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市场体制的优势·····	1
第一部分 市场体制的功能	
第二章 社会协调·····	17
第三章 市场体制协调·····	30
第四章 肉中的骨头·····	45
第五章 企业与公司·····	53
第六章 最大范围·····	73
第七章 选择的范围·····	85
第二部分 市场体制的利用	
第八章 等价交换·····	97
第九章 寻求什么样的效率·····	108
第十章 市场体制的效率·····	122
第十一章 无效率·····	128
第十二章 太少太迟·····	145
第十三章 自由之见·····	155
第十四章 个性与文化·····	167

第十五章	取信于民·····	183
第十六章	民主的必要条件·····	195
第十七章	民主的企业障碍·····	203

第三部分 何去何从

第十八章	市场体制的选择·····	219
第十九章	其他出路·····	229

第一章 市场体制的优势

我们处在社会的巨大变化中，正从 20 世纪迈向 21 世纪 那么就这样的背景，作为本书的开场白吧。

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经历了一种未曾料及的变革，奉行共产主义的社会正在放弃经济管理中的中央计划的做法，并试图建立市场体系。中国已经将工业从政府规定指标和定额的体制下解放了出来，基本上废除了政府的指令，允许农民为利润而生产和销售。由于缺乏活力，俄罗斯顺应潮流，设法在柏林墙和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中作出艰难的选择。

在此以前，西方世界就已惊奇地发现，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放弃了对市场体制传统的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他们不再急于废除它 相反地 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社会党赞成一种新型的市场体制，即国营而非私营企业。可是，时间不长，他们便开始求助于广为熟知的资本主义私营公司，以通过收入再分配和福利国家的社会方案，寻求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抱负。此后，像今天的英国工党，尽管他们不提国营企业，但却经常谈论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对于“第三条道路”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人给出合适的定义，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它都包含着市场体制的成分。

与此同时，非社会主义者，包括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已重新开始对市场体制发生兴趣，他们坚决抵制政府对企业的管制

以及社会福利计划。这一实质性变化的产生，大部分是由于他们注意到了政府的种种败行，如官僚主义的漠不关心、过度的党派偏见。然而更重要的，也是由于对市场体制取向有促进作用的许多情况的出现，如欧洲共同市场的运作、全球化、“新经济”带来的各种机会等。

尽管出现了这些巨大的变化，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也许并不彻底。前苏联中的一些国家，或者更明确地说就是俄罗斯，由于不能继续忍受转变的苦痛，还有可能会回到旧的道路上去。许多俄罗斯人抱怨，他们现在这种处于“胚胎状”的市场体制，简直就是盗匪的孪生姐妹，所谓的过渡体制，其实就是巧取豪夺。今天的俄罗斯确实暴露了市场体制某些坏的方面，事情的最终结果究竟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跨入新世纪了，我们应该怎样开始呢？诸如此类的巨大变化和断裂，需要有一本书来认识市场体制。长久以来，人们能在不理解市场体制的情况下研究经济学。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对市场机制无所认知。即使我的老师们了解它，他们也不会自找麻烦去向我们解释它的结构，老师告诉我的只是树木而不是森林，他们会教给我们通货膨胀、垄断和国际贸易的知识。由于种种原因，老师们不会告诉我们如同市场体制那样的社会组织结构。你或许能够看到一幅画中所有有趣的细节，可是当你仔细观察一下，你会突然发现一张面孔或其他隐藏在细节背后的物体，因此，我认为，细节可能很丰富，但若干年之后我可能会找不到面孔。

一个半世纪以来，许许多多的团体总是会陷进对市场体制令人不安的争论中，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在平静和透明的环境里思考这些问题。市场理论家们已经认识到了对计划经济体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他们可以从意识形态的樊篱中挣脱出来，凭理性而随心所欲地讨论市场及其有关问题。社会主义理论家们也认识

到，停留在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上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正视创造的复杂性。

即使如此，仍不能轻易而直接地思考市场。由于市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恩惠，在一定程度上使其缺陷被掩盖了，因此，主流经济学家不可能不犯错误。另一方面，许多批评家带着燃烧着的非难来理解市场的优势，即使在学术味很浓的讨论中，沉默的固执也经常存在着。关于市场体制，人们没有发现经济学家之间理智的交流，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极力推崇它，可是像社会哲学家 J·哈贝马斯这类历史、文学、哲学方面的学者常常从自由、合理和道德方面评判市场的后果

对市场体制是怎样发生作用的迷幻般的观念，使得人们对市场体制的认识经常受到阻碍。二百多年以前，亚当·斯密曾形象地指出，市场的活力来自于一只“无形的手”的操纵。社会发展到今天，要想对这个问题作出全面的解释，我们认为除了“无形的手”之外，还要考虑到许多“有形之手”。

一、什么是市场体制

首先，需要对市场体制和市场进行区分。尽管不是所有的社会都拥有市场体制，但现在的社会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利用着市场。不论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还是在过去的苏联，只要你沿着街道边走一走，便会看到理发、自行车修理和居民消费品市场。如果你是一个善于观察的参观者，你还会发现一些原料和机器市场（可能是黑市交易，谈不上什么合法不合法）。无论何时，当他人给你提供劳务，比如唱了一首歌、挖了一锹煤，你都要给他报酬，诸如此类的交换活动就构成了市场。然而，即使在毛泽东时代和过去的苏联，这样的交换也司空见惯，但这些国家那时并没有市场体制，因

为市场体制只存在于通过市场实现增殖，并且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人与人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场合。一箱零部件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变成一台计算机，除非它们被用某种特殊的方法装配起来。所以，各种各样市场的存在不会自动产生市场体制，除非它们在一种特殊的方式下被使用着，尤其是在组织或协调社会中成千上万的活动的时候。

市场体制对社会活动的组织或协调，不是通过政府计划，而是通过买卖双方的相互交换来实现的。建立市场体制，单凭人与人之间的买卖活动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不通过中央机构实现采购和销售，从而达到社会的协调。据此，我们可以对市场体制进行定义，至少就我们在这里的意图来说，是绰绰有余的了。所谓市场体制，就是不通过中央指令而凭借交易方式中的相互作用，以对人的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协调的一种制度。

为了使我们对市场体制的认识更加明确，把市场体制与小规模的家庭组织方式进行比较可能有所帮助。在非市场的家务活动中，父辈或其他当事人协调着家庭成员的活动，以满足生活的需要和享受，不论他们需要什么或想要什么，家庭成员都可以被组织起来自给自足，照看孩子的、处理家务的和耕地的，都可以得到井然有序的安插。有时候家庭也可能要求来自家庭以外的一些援助，比如：结婚仪式上需要奏乐的人，或者家庭自己不能生产的某种日用品，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可能还不会见到。当千千万万的家庭开始为出售而不是为自己的家庭使用进行生产的时候，市场体制便现出端倪了，换句话说，当各个家庭大量地为远方的家庭进行生产的时候，市场体制就应运而生了。因此，当大规模的、分散的社会协调需要出现时，市场体制便开始粉墨登场了。

市场体制没有从根本上取代自给自足，家庭仍然是现代市场体制的基石，它继续担当着小孩养育、食物自备以及家庭生计维持

的功能。那么，市场体制的出现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最典型的是家庭会分配一两个家庭成员甚至更多的家庭成员，专门从事与出售目的有关的生产，这些分化出来的人可能做着鞋子修补、鞋子缝制等活儿，这样，家庭就能够获得它自身无力生产的其他物品和需要的帮助。

一个家庭尚且如此，那么一个社会要想得到协调，在广泛的社会生活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同样也需要根据社会需要被分配给各种各样的任务。工具和机器应制造出来，分配给那些使用它们的人，农民除了养活自己外，还要为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提供粮食。假如这一切都能通过中央指令得到安排倒也罢了，然而历史事实证明它行不通，一切都要取决于买卖双方的意愿。

劳动力市场、农产品市场、由工业部门提供给消费者的货物和服务市场，是我们大多数人比较熟悉的三种类型的市场。由生产者提供给生产者的半成品货物和服务市场——比如计算机集成电路块就是半成品货物，购买它的企业可以用来装配计算机——以及资本市场，特别是借贷、保险和其他投资市场，这两类市场不很明显，但也是市场体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这两类市场中，主要的参与者不再是普通的人，而是企业、企业家和金融机构。

超出家庭范围，为货物和服务的出售目的进行生产的市场体制协调的出现，它所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也是十分缓慢的，直到 1800 年左右，英格兰才出现了市场体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可能更早一点）随后才是西欧、北美。

可是，将人从家庭圈子里带出来投入到广阔协作中去的意识，比市场体制要早得多。对此，通常的程式化解释就是中央协调。古埃及的统治者将劳动力从每个家庭中驱赶出来，迫使他们兴修水利工程、保卫王国、建造庙宇和构筑金字塔。尽管王室对大批劳动力的协调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逐渐衰落了，但社会范围内的

中央协调的观念并没有消失，在将近三千多年之后它仍然存在着。19 世纪中叶，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一些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中央指令组织社会生活。这些人最大的抱负就是要消除货币、价格和市场，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合理的充满人情味的社会组织存在的障碍。直到现在，一些具有乌托邦思想的人，仍然在追求着这样的理想。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早期 出于对市场体制的反抗 中央计划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中央计划的目的，是要把通过货币和价格进行交换的结构，转换到中央协调体制。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新计划者们在俄罗斯获得了政权，此后就是中国，以及其他的模仿他们做法的一些小国。他们不是 20 世纪的法老，但却是物质产品计划的拥护者，他们是善于调整的计划者，使用货币、价格乃至利用市场（不是指完全的市场机制），并把它们作为中央控制的工具。当然 正是这样的机制 激起了 20 世纪计划体制对市场体制的巨大挑战。

二、市场体制的重要性

同政府功能一样，市场体制是控制与协调人的行为的一种方法。假如你招呼一组园艺工人去锄草 尽管你不是政府 但你已经在实施控制了，使得这些人能与你很好地配合起来。他们一边翻着土，一边去除杂草 无须胁迫、强制或命令 你就能使他们按照你的意图来做，只要付给他们报酬就行了。当几百个工人每天早上 8 点准时到达工厂大门口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受到哪个政府机构的命令 工人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他们受到工资承诺的牵制。

外表上混乱的买卖活动所完成的一切，是否真的比控制和社

会协调还意味深长呢？人们可能看到了政府完成的对整个社会的某些协调，可是，要看出市场体制的协调作用就不那么简单了。有人认为，人要么由政府来协调，要么任由他做他自己想做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是一个巨大的错觉。在市场体制下，人并不能自行其事，他们被捆绑在一起，通过市场的内在作用而向这边转或向那边转。假如让他们自行其事，他们将不可能取得令人感到吃惊的具有市场体制特征的生产业绩。市场参与者似乎可以作出自觉自愿的选择，但这与他们始终受到购买和销售的制约并不矛盾。

无论如何，市场体制决不是亚当·斯密所说的放任自由，同时它也不是那种依赖于小政府的市场机制。在我们这个时代，市场体制是带有被管制性质的，或者就像旧式自由市场人所诋毁的那样，它是受到“干涉”的。在这个体制中，政府是最大的买主，它常常有个长长的购货清单，购买的东西包括：军队、高速公路和官僚、警察服务，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巨大的供应商。尽管政府提供了许多力所能及的服务，比如初等义务教育，但它通常是在分发产品而不是出售。除了让供给与需求自行定价外，政府经常会做这些事情：维护农产品价格，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或者控制农产品价格，以减轻城市贫困居民的困难。政府会禁止某些买卖，比如现在在许多国家就明令禁止奴隶交易。税收是政府赖以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政府通过税收可以控制某些行业的生产，比如烟草。政府是一个大宗的举债者，同时，它时常也是一个巨大的放贷者。政府在国外以国家形象进行促销，可以帮助本国企业扩大海外市场。政府掌管的庞大基金和实施的社会福利计划，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另外，政府通过对银行的控制和采取的财政政策，表明它还是货币和信贷积极的管理者。

为了保持市场体制的繁荣，上述政府行为是十分必要的。有些政府行为可能是有帮助的，但另一些可能会造成浪费。当然，还

有一些政府行为除了打劫公民的钱财，其他的什么都不是。无论怎样评价，有一条似乎可以肯定，这就是政府行为是市场体制发挥作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对我们人类社会而言，买卖活动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市场体制就不同了。与人类历史相比，市场体制只是在近代才出现的，公司法的复杂条款不是天生的，股份所有制也不是集体要价的仪式。市场体制不像其他东西，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上帝的恩赐。今天的市场体制与 50 年前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同样它也会与未来的市场体制存在着差距。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市场体制，其中所有的企业，或者所有的大型企业，它们都是国营的。尽管如此，这些企业仍然是生产商品的企业，因为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投入的原料都要经过市场进行买卖，而不是政府指令全部能办得到的。我们也可以想像另一种情形的市场体制，在那里，所有的企业都为消费者所有，或者所有权和经营权都归雇员所有，这样的市场体制属于合作社性质的市场体制。在现实中，这两类市场体制都不存在，现在主流形式的市场体制，按照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也就是经常被称做私营企业的体制。这种市场体制才是我们所极为关心的，后面将主要讨论它，但也不排斥其他类型的市场体制，包括令人比较感兴趣的、有政府参与的混合型的市场体制。

今天，市场体制运动与近年来剧烈发生着的由集权向民主转变的运动相互交织在一起。前苏联在追求这两种运动的过程中，算是彻底地毁灭了。许多实行市场体制的国家，并没有尝试民主，比如墨西哥，或现在才勉强推进民主化进程。如果你赞成市场体制运动，必然会导致民主化，那么至少可以说你是不成熟的，有可能还会弄得大错特错。在虚假的民主社会里，市场怀疑论者常常担心市场体制最终会导致民主化，其中也包括大公司会行使着与民

主不一致的权力，跨国公司威胁着小国政府。总而言之，我们能够从直接的事实中开始，但困难的是怎样才能澄清市场与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

市场鼓吹者认为，西方国家的经历不容置疑地表明了市场体制能够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并且还断言，市场体制也能给人身自由提供更多的保障。由此，这些人认为，市场的成功使得那些陈腐的、老掉牙的对市场的种种攻击不攻自破。所以，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全面地认识市场体制。这些人相信，我们需要经济学家对市场体制进行专门研究，以保持它能健康地发展，除此以外，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市场体制的‘生理’和基本的‘解剖’结构。

然而，技术和工业化比市场体制更能带来社会财富，似乎更可信一些。难道实行市场体制的国家不践踏民主，市场体制就能得到加强？或者，我们应该承认许多国家的政府一直遭受着哪些地方应放弃市场机制的困扰？绝大多数商品社会，由于面临着将市场体制与福利国家结合起来的任务，似乎也麻烦不断。市场调节能否保护环境，这是不能十分肯定的事。在某些商品社会，遇到的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是，市场化就业是否对所有体格健全的成年人都有好处呢？与高技术联合在一起的市场，现在是不是使熟练程度低的工人成了多余的人呢？此类问题的解决，只有靠专业化的、熟练程度高的经济学医生。它们是自由与公平的问题，是个人主义与公有制的问题，同时也是比较具体的问题，就像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一样。假如谁希望从诸如此类的问题中作出明智的选择，那么他就必须对市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人在市场体制中能够和不能够做出什么选择有一个更好的

认识。比如，假设市场体制确实是收入无保障或极端不平等的无法医治的根源，那么可以用税收和福利政策通过收入再分配进行适度的调节。

尽管对市场体制赞同的共识不断增加，然而在这些赞成市场体制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不排斥有误入歧途的。这些共识的存在构成了某种政治氛围，但毕竟不是科学上的证实。我们不能无视许多有根有据的反对者的声音 这些人认为 无论什么人 只要他不囿于偏见，都应该看到市场体制已经使我们走上了毁灭的道路。他们的理由是：(1) 市场体制耗竭了世界资源，随着全球气候变得越来越暖，人类生存的环境面临着可怕的灾难。(2) 市场体制带来的大量的农民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已经造成了对身体健康有害的城市环境。不过，这些人可能也看到了市场体制结束了残酷的、极端的贫困。这部分人认为 市场体制的这些弊端将会导致新型的市场化社会。替代市场体制的东西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这不是看不到市场体制给它的参与者可能带来的东西的充分理由。

所有这样的看法 也包括其他赞成和反对市场体制的主张 都不能说明明显是错的或者明显是对的。市场体制具有像它的赞成者相信的那种效率吗？看看它的巨大产出就能找到答案。市场体制不具有效率吗？从贫困和不充分的医疗保障中也能找到验证。商品社会破坏了环境？耗竭了能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他不实行商品生产的社会也是这样的呀，我们切不可弄错原因。市场体制使个性和文化堕落了么？关于这一点 我们作为证据考虑的是 追求金钱的人是否会排斥其他价值观呢？或者科学、教育和艺术在商品社会能否得到繁荣呢？市场体制是民主的催化剂还是敌人？我们称做民主的东西在商品社会之外根本不存在，从政治学的角度看 金钱或货币的影响 使我们产生了一种怀疑 即无论什么样

的社会，都不是十分民主的。

在关于市场体制争论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中心问题是：商品社会中，市场体制究竟做了什么？带来的成就和毛病都是什么？对正在构建市场体制的国家它能带来同样的结果吗？它对未来有什么影响？对各种不同的市场体制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一句话，市场体制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条件？我们现在能够采用什么条件？

现在我们谈论未来，常常会用到一些新的词汇，比如信息革命、光子学、细胞中枢网络、全球化等。这些词汇表明，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技术多元化的时代。从表面上看，信息似乎已成为基础性资源，部分取代了劳动、土地和资本这些传统的生产三要素。信息或知识这些具有高度流动性的新资源，是怎样在一国和全球范围内组织和协调起来的呢？我想恐怕没有人建议去使用各个国家的中央机构吧，我也从来没有听到多少声音，主张成立一个世界政府以协调信息、知识和新技术。然而，我的确听到了这些议论：新的力量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新市场”“市场正在全球范围内铺开”，“信息技术正在加快商品社会的变革速度”。姑且不论好坏，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有坚定的理由，可以把市场体制理解为最大的全球化者，作为主要的制度性工具，市场体制将单个民族国家的自治彻底切开了，促进了劳动和资本在地球表面的各个角落永不停息地流动。

关于市场体制的争论，是个无休无止的话题，对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确立与它有关的一些关键性的事实。无论是从粗略方面看，还是从细微方面看，市场体制协调人的行为或活动，都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体制、制度和社会进程，只不过它比较粗糙，有时还带有一点残酷性而已。它既是人身自由的盟友，又是人身自由的敌人。说它是盟友，是因为它为每一个当事人开辟了更大范围

的选择机会 说它是敌人 是因为它关闭了一个自由的人可能在其他方面所能作出的重要选择。市场体制一方面摒弃了过去的许多不平等现象，但另一方面又带来了它本身不能解决的不平等。通过市场体制 能够获得额外的效率 这是因为市场体制允许它的参与者在精打细算后作出选择。话分两头讲，市场体制也会造成严重的无效率 原因就是它闭合了选择。在历史上 市场体制支持了民主 须知没有商品社会 根本不会有民主存在 但市场体制也破坏了民主国家某些重要的民主特征。市场体制还是民主的竞争者，这是因为市场体制和民主都允许对政府和企业精英实行大规模的控制。市场体制适用的范围比我们的想像要广阔得多，它能够做比我们想像的更多的事情 但有点自相矛盾意味的是 它不能在处处与它打成一片的场合中运转。我们还能找到根据，从而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市场体制能一如既往地得到政府很好的支持。

这本书中，有没有一个中心的或贯穿始终的主题呢？套用一句俗话，信则有之，不信则无。大家都讨论的话题，可能不是我在这儿想说的，我不会劝说你去赞美市场体制，也不会说服你去诋毁市场体制，一切取决于你个人的思考。我不去介绍历史上关于市场体制的各种各样的论点。因为随着市场体制的胜利，它们的生命力已经走到尽头了。我要讨论的主题是，在未来的社会里，究竟应该把市场体系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

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我撰写这本书的呢？告诉你，是一种欲望，它始终在召唤着我去考虑作为一种特别的社会过程的市场体制，这就如同是怀着一种惊奇甚或敬畏的心情，去检查特别复杂的机器或生物有机体一样。市场体制对我们来说总体上并不陌生，但即使是经济学家也不完全理解它。作为一个经济学工作者，我

愿意把我的理解传达给读者，有道是互相交流嘛。

1. 如果问到关于市场体制最重要的一本书是什么时，许多人可能会说是亚当·斯密的《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书出版于 1776 年。其他的人可能会回答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分人认为，《资本论》即使不能取代《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至少也可以说可与之相媲美。《资本论》共有三大卷，其中第一卷出版于 1867 年，第二卷出版于 1885 年，第三卷出版于 1894 年。该书的后两卷是马克思去世以后，由他的合作伙伴恩格斯整理编辑而成的。这两本书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我个人认为，学习和研究市场体制，上述两本书是需要阅读的。

2. 如果要了解市场体制的起源，解读历史学家们对市场体制发展史认识的差别，可参阅 W·B·罗森伯格的著作《从市场到市场经济，关于 1750—1850 年马萨诸塞州转变的考察》。

3. 关于私有化，可参见 J·维克斯与 V·赖特编写的《西欧的私有化政治学》。

4. 在这里，我把物质计划定义为不通过货币、价格或者是市场，仅依赖行政命令的计划。在书中别的地方，有时候又指使用货币、价格或者是市场的计划。也就是说，完全是作为市场体制的替代使用的。

5. 关于近年来市场体制状况的评价，可参见：① R·库特勒的著作《一切为了销售：市场功效及其局限》；② R·基尔平的著作《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挑战 21 世纪世界经济展望》。

6. 关于欧洲共同体市场，参见 P·B 凯南的《欧洲的经济与货币联盟》。该书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在 1995 年出版的。另外，也可以参阅 R·L·海尔布鲁诺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逻辑》。

第一部分

市场体制的功能

第二章 社会协调

在提出市场体制是社会协调的一种方法之后，现在我要讨论的问题是：社会协调（或组织）是由什么组成的？社会协调是怎样完成的？协调是一个重要的概念，通过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开启一条通道，以说明市场体制对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

眼下让我们先避开经济体制的习惯性看法，就假定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它好了，另外，再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经常用以解释市场体制的概念上（如供给与需求、商品、生产、分配等）转移出来，暂时将它们统统忘掉，因为这些东西会妨碍我们认识市场体制与社会协调（或组织）之间的重要关系。让我们只考虑社会，不讨论经济。想像一个画面，2 000 万个家庭散住在像法国那么大的一个曾经无人居住的地方。假定一开始，他们没有构成社会，也称不上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孤立的实体，并且假定某个家庭对其他家庭开战。那么，他们是怎样形成社会的呢？是实践将他们协调起来的。这些实践包括：为安全和合作产生的互相交换，为获得食物和必需品如工具而产生的彼此之间的交换。

如果你愿意和我一同共进午餐，那么我们便实现了一次小小的协调。一个政党是一个大一些的协调，和平相处的 8 000 万人则是更大一点的协调。一些习以为常的协调，可能并不被看做是协调，比如父母对孩子的呵护。在另一端，协调被看成需要一整套明确的社会机制，比如立法者、教师和记录员的活动。

协调的范围很广，从独裁到民主都需要协调。我的看法是，一个协调得好或组织得好的社会，必定拥有一个权威的精英，比如柏拉图的哲学王国或者贵族政府。你们的看法可能是平均主义制度，与我不一样，但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协调具有两大功能。其一是治疗创伤，社会协调的这一功能表明，对每个人的行为是需要进行约束的，目的是防止暴力、偷盗和干涉，在此，我们可以把这一功能称为维护社会安定其二是对赠予和领受的帮助进行安排，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不可能不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同样我们也会给其他人以帮助，对此我们称协调的这一功能为合作。

这两类协调，不论是维护安定，还是建立合作，单靠自觉性和主动性是不可靠的。相反，协调如果要获得成功，其条件是所有的人必须服从于控制。法律当然是一个主要的协调手段，尤其是它可以保护我们的隐私不受侵犯。风俗习惯也是一个重要的协调器，例如，它给人们带来了共同的语言，由此许多协作成为可能。但导致行为协调的控制，与法律和风俗习惯大不相同，前者远远超过后者。

从实际出发，有时候我们要把协调分解成精神追求而不是行为需要。然而，社会协调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从事实看，没有哪一样东西比协调还显而易见，无论是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协调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果没有成年人矢志不渝的呵护，婴儿不可能长大成人，最起码在他的生命早期是这样的。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哪怕是一条最简易的路，也无法修建起来。只有协作和相互帮助，我们才能医治流行病、发展科学、享受友谊和游戏所带来的快乐。立法、司法和警察之间的关系，就是确定和提供治理伤害行为的协调。

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对协调的界定比较狭隘，因而没有能充分地把握协调的意义。我们通常构想的是，协调就是 A 帮助 B, B

帮助 A 在这一过程中,AB 双方彼此相互了解且各取所需举个例子,你和我一起搬一件笨重的东西,这时我们就需要协调依据这样的局限性很大的概念,我们可能会错误地忽视一些更重要的协调,须知它们才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帮助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向他人提供了帮助,另外,我们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他人的帮助,当你自觉地将一堆不雅观的瓦砾从自己房子旁边移走的时候,你就避免了我叫警察来强迫你做这件事,因此也许你永远也不知道,你的自觉行为让我受到了益处。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并繁衍不息,正是由于这后一种协调,它才是社会生活的基石和市场体制的核心。

尽管我们常常将协调和一致性联系起来,但协调比一致性要广泛得多,因为对无时不在的合作者,我们既无须同他们交流,也无须相互认识和了解。或许合作者彼此相互憎恶,但这丝毫不影响协调,好比两个有政治野心的内阁部长,如果他们想保住他们的职位,那他们就必须进行合作,但作为竞争对手,他们可能充满故意地注视着对方。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通常不取决于是否要亲自出马,也不取决于距离的远近,这就如同世界范围内的气象学家研究气象的合作一样,每个人的工作对所有其他的人来说,可能是陌生的,但正是这些互不见面的工作,才改善了气象预报的准确性。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也并不总是无私无利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但为了使自己的目的能够更好地得到实现,需要相互提供服务。有时为了共同的目的,还必须强迫进行合作。合作并不总是高度有心的,相反,合作经常会在无意识中发生,尽管我们进行了合作,或者正在从事着合作,但是我们可能并没有感觉到。当我把一只空瓶子送到当地的废品回收站时,其他人可能会用车把它运到加工场,等等。想都来不及想,我已把我自己放到了合作的链条中去了。

为了认识协调更广泛的含义,我们现在来计算一下,为使一个

学生从中学毕业究竟有多少人在进行着合作。首先，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给予的必要的教育，这还不包括他们的父母及家庭成员又受到上一代家庭成员的教育。其次，是课堂教师，包括从幼儿园的老师，一直到高中的老师，以及培养他的其他老师。再次，是同学，即同学之间的互相学习最后，还应算上建设学校和维护学校的工人。总之，要想把人数算准确，那么应该包括从祖先到飞机驾驶员在内的无数人，这份长长的名单可能成百上千，或者最好说是成千上万。

表面上看，人类的冲突似乎多于合作，例如在公共教育、外交政策、税收上的争吵然而，每一种冲突，都是合作的反证。我们之所以在教育 and 税收问题上发生争吵，是因为我们想要通过合作以便更好地维护教育体系。冲突是要解决谁对合作负责，应该怎样进行合作，哪一方要为合作给予补偿，谁是受益者等问题。对利益分享的争吵，可能很尖锐，持续的时间长，并且经常也是很痛苦的。

我个人估计，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不赞成社会协调的作用。这些人认为，协调不可能将数百万人充分地协调起来以彼此和平相处，合作也不一定就能让人类创造出许多追求得到满足的新的手段。对此，我想要说的是，我们的注意力被过多地吸引到了协调的破坏面上，既包括范围也包括相互伤害行为的严重程度。总体上，无效合作的病根在于愚昧、贫困和营养不足，不是我们不想去减少恶意的协调，而是因为它不仅无效果，而且还是一个长期策略，因此，直接考虑社会协调是件困难的事。

一、没有协调者的协

市场体制是一种社会协调方式，它通过市场体制参与者之间

的相互调整实现协调，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不起协调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去认识没有协调者的协调的可能性。通过相互调整实现协调的意识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比较新奇，然而，我们却一直就在进行着这样的协调。

夫妻间的协调是比较典型的，彼此间通过相互调整，共同完成一些事情，协调就实现了。每一方都尽力适应对方的癖好，想方设法去影响对方，那么无须请求婆婆或岳母的调解就能实现他们的协调。公务员经常通过平等交换意见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协调问题，其他的诸如科学家、学校的老师、政治家和运动场上玩耍的孩子也是如此。

许多人将协调界定为协调者的行为或技能，这样的定义泯没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调整的合作。与此同时，也会带来一个类似的误解，即用协调来定义协调者。公开的协调者并不必然会导致协调，相反，有时候他们会把事情弄得很糟糕。事实表明，许多中央协调者最终埋葬的是他们自己。

中央协调与相互间调整式的协调之间的区别可看作是单方面和多方面控制的区别。谁实行控制，是中央调节者还是许多相互作用的参与者？协调的这两个体系，一般都使用着相同的控制工具 例如商量、相互吹捧奉迎、给以想要的好处、颁布命令等。很明显，中央统治者有权发布命令，并且也能迫使人们进行相互调整。此外，这两个协调体系也利用着吸引力稍差的控制方法，比如恐吓：“好好做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它们的差别 只有通过单方面和多方面的对照，才能反映出来。

假如有一组人在轮船干着提供午餐的活儿，对此你可以进行单边的控制，并使其中的五个人协调起来。即使干这活的还有另外六个人 你不进行控制 他们通过互相监督、响应和影响 也能得到很好的协调。可是，假如有两队步行的游客，分别相向经过马

路的转弯处，那么他们怎样协调才能避免互相冲撞呢？对于一个站在路边的中央协调者来说，他可能会大声发出指令，要求怎么走，什么时候走。由于无法忍受的缓慢和笨拙，哪个人会耐着性子听他的指挥呢？想都不会想，各个人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并快速及时地协调起来。每队都会注意对方，当越走越近的时候，他们会移动身子，要不了几秒钟，这些人都会平安地通过马路。所有这些协调，要么受到习惯或规则的制约，要么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一切都会“保持得井井有条”。

相互调整并不总是只在小范围内发生的，语言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它可以帮助人们在更多的范围内实现多方面的协调。比如，3 000 万人用西班牙语进行读、写、说，表明这么多人对发音和字母达成了一致，这是协调的巨大功绩，实际上合作也是如此。没有哪一个中央权威机构，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个委员会，能设计出西班牙语、马来语或其他种类的语言。语言是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在使用共同的发音和字母的基础上，经过相互调整而逐渐形成的。当然，语言会受到中央机构施加的控制的影响，比如法国科学院就曾试图保持法语的纯正性。

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通过相互调整，道德得到了协调。由于道德准则，人类在某些行为方面取得了世界性的协调，比如通过道德约束，许多人基本上避免了对他人身体上的侵害。道德准则不是哪个中央机构设计出来和强加的，而是在相互调整中形成的。有没有更大范围的相互调整呢？生物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的 DNA 是由 500 亿个微量元素组成的，人的身体是由 100 亿亿个细胞组织起来的。显然，中央协调难以奏效，一切都得通过相互之间的调整。

过去 50 年来的国际政治秩序，是相互调整的另一明显的例证。在这一期间，正是因为相互调整才避免了核战争，才避免了像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动不动就采取的毁灭性破坏。可能有人要辩解，联合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是在实行中央协调吗？可是我们也要了解，它们没有必需的单方面的权威，因为成员国谁也不愿意对它们做出承诺。它们所能做到的，只是提供了国与国之间相互调整的条件

因特网是多边世界联络急剧扩张的重要技术，它提供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多边调整的可能性。

当然，相互调整的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能力，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在一个拥挤的十字路口，由于身高、体重、相貌、步伐等不同，行人的相互影响是存在差别的。一个国家的总理或一个企业的总经理，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对他的同僚实行单边控制，那么即使他拿着一把枪进行威吓，也是徒劳无益、无济于事的。

我们都知道，社会总是在审慎地设计着一些相互调节的正规结构，比如联合国、一国中的三方工资委员会。可是，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即使没有精心的组织，相互调整也会潜移默化地产生出来。交换双方的当事人，经常无意而不是有心地便把他们的影响施予了对方，他们无需去了解在一个广泛的协调中他们所处的位置。用一个新的词汇“在线”来说，他们的动机取决于他们自己认为的方便，根本不会想到要承担什么责任。

面对面的交往、声对声的交流，不是相互调整的必要条件，尽管通常是这样的。世界范围的道德规则就是在人与人之间潜移默化的认同中产生的，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可能从来也未见过面。相邻社区的协调，经常是由于官员们彼此考虑对方的动机而获得的，根本不是通过谈判行事的。

当然，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协调系统都是混合物，中央调节和相互调节彼此相互依赖着，否则哪一个也不可能存在。美国政界不同寻常的相互调节，是受美国宪法驱使着的，宪法大会起着中央调

节的作用。在拥挤的马路上，川流不息的交通既受到中央调节制定的规则的制约，同时也是无数个相互调节的结果。

二、牵强附会的认识

如同所有形式的协调，相互调整并非天生就是完美的。我认为我们一直受到某种不安的心理驱使着，尽管西方政治哲学崇高的荣誉感低估了它。在思想史中，似乎贯穿着一种压倒一切的关注，它就是社会怎样才能保持秩序。显然，只有通过控制才能引导人的行为的规范。哲学家就是通过对秩序著书论说谋生的，他们认为掌握在社会精英手中的控制是秩序的必备条件。哲学家们可能万万没有想到，除了单边和等级制度以外，在其他的模式中也使用了控制。若非他们令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否则他们也不会就此而看重控制。据此，我推测关于秩序或协调的研究，大体上转化成了精英分子怎样单方面地将大众纳入控制的研究，以及怎样调整他们这种做法的研究。以早期政治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例，尽管它有不朽的功绩，但它仍留下一个疑问，即等级制度的单边精英统治是不是正义的？亚里士多德关于秩序的意见，就带有等级观念的成分。

技术哲学是怎样严重误解了秩序或协调问题，这在无秩序的历史中已被反映出来了。导致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并不总是农民，尽管他们时常想造反，而是单边权威的拥有者或者自称为中央协调者的那些人，其中包括抢劫成性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穷兵黩武贪心不足的成吉思汗，野心勃勃的拿破仑和丧心病狂的希特勒。

思想史上的一些人物，已经为相互调整奠定了显著的地位。无须感到惊奇，关于社会怎样才能进行理性的活动，这些人确实给

出了许多的看法。公元前 2 世纪 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声称 古罗马制度的价值，不能归结为上层社会的图谋，而应归因于长期对一整套政治干涉的不断摸索。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一书中，我们能够发现他对尽管仍处于胎儿状态的相互调整的鉴赏。在将近 2 000 多年的岁月中，因这两个人特别突出，其他具有同样想法的人可能就淹没在哲学史中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哪一个人花力气去发现他们。

有些人曾写过思想简史，将相互调整放到了前台。牛顿就是这样的人 他著有《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1687）一书“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牛顿把物质世界解释成天体间相互作用的机制，他没有把事情归结为中央协调、归结为中央权威至高无上的精神。总之，他认为上帝除了使天体在运动中相互作用以外，别的什么也没做。接下来的人就是达尔文，1859 年他写成了《物种起源》一书。达尔文解释了物种的多样性，以及变化和进化的模式，认为生命就是这样开始的，像牛顿一样，他发现了生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尔文的里程碑式的进化理论，就像北冰洋水域中的破冰器，打开了赞赏相互调节的思想通道。达尔文没有发现一个中央组织精神存在的位置，如果说上帝是中央主义拥护者那倒也罢了，因为上帝是无须解释的。

此后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1776）一书中，将社会协调解释为相互调节的实现，而不是国王或财政部长的中央权限。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没有超出商品生活，将他的关于社会秩序的解释推向一般化。最后我们要提到的是弗洛伊德，现在他的思想不再流行了，也难以同以上的人物相比，不过他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人物。通过对人的精神和行为的观察，弗洛伊德公开地表明每个人本质上都是相互作用的竞技场。我们是由冲突、感觉和意志组成的，我们不会受到一个统一的至高无上的神的

控制。

三、相互调节的价值

很显然，每一个社会既需要中央调节，也需要相互调整的协调，这样它才能长治久安。由于协调自身具有很多的优点，因此相互调整是必不可少的。下面，我来说几个相互调整的不太明显的优点。

在一定的条件下，对于限制性伤害，规则和当权机构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因为它们只要颁布公文，写明“不可杀人”即可。可是，合作却需要将一揽子协调任务进行分派。一个社会不可能通过向参与者发出命令以构建一个医疗保障和衣食保障体系。为了获取建设性的合作，社会需要以某种方式明确每一个应执行的任务，同时也要明确每一个任务执行的环境以及应由谁来完成。建立一个医疗保障体系，不仅需要一整套的禁令，而且也需要制订复杂的程序，以决定应该怎样培养医生，怎样使医生具备执业资格，以及责任、工作条件和报酬等。另外，分派将不得不面对着无休止的改进。分派决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不断修改以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的需要。拿医疗保障来说，这些因素就有：对照顾者的培训、照顾者的经验和年龄等。另外，假如正在合作的人想去检查一下他们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参与自由选择的程序，那么合作将变得更加复杂，并且会远远超出规则和当权机构所能控制的范围。

规则和当权机构常常是笨拙的，它们仅能适应于十分静态的范畴。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可以想像一个足球队为了赢得比赛胜利的合作，如果该足球队队员一味遵守赛前制订的规则，并且随时随地等待来自场边教练的指令，你想一想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在比赛的具体过程中，运动员通过跑动和喊叫彼此发出信号，

实现着动态的合作，可以想像得出，他们的信号规则比当权者的指令似乎更为准确，变化更为迅速。政府官员之间的合作，即使部分地受到规则和当权机构的指令的约束，但也需要单方或多方的信号、动机甚至威吓的互相交换，就同在一个多党制的社会里通过谈判组建内阁一样。

从家庭生活到政治活动，对于绝大多数社会合作来说，社会必然合乎逻辑地采用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而不是什么规则和当权机构的指令。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规则和当权机构是很笨重的，并且经常还是带有强制性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比规则和当权机构能更好地利用信息和理智。在适当的场合，相互调整在协调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扩散了将远见、信息和革新导入社会的可能性，允许信息和思想在一切方面渗透到体制中去，不信的话，可以看看因特网、计算机交换通讯等。在一个等级社会里，当权的中央权威者能否决逐级上报来的思想，因为这是中央权威者的职责，他有权决定对或错。在相互调整中，不存在中央主义者的守门人。

相互调整协调的范围和效率被低估了，考虑一下那些表面上是协调的非协调的可能性，配偶之间、驾驶员之间、杂技演员之间或工资谈判者之间的协调是不是协调。与中央协调一样，尽管时常也会失败，但从社会整体上看，它是社会协调忍辱负重的东西。

四、协调与稀缺性

不久前，大量的游客涌进意大利，意大利人没有花多大力气，便给这些想看一看西斯廷教堂米开朗基罗壁画的人提供了食宿。现在看来，这些协调需要以规定的时间、票价和排队来保证。尽管文明更需要协调，但当没有足够的好处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时候，协

调不管是合作还是维护安定，将变得很困难，“不充分”的意思是，一些游客空手而归，并且几乎没有哪一个游客能得到完全的满足。这就是说，一批游客能通过梵蒂冈的教堂，而后边还有大队的游客焦急地等待进入。从社会协调的角度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当好处不够分配时，协调就要采取强行剥夺，随之就必须处理由此而来的磨擦、大规模的冲突乃至暴乱。

对于人们趋之若鹜的大多数目标和心灵感受，不管是无形的东西比如像获得观光罗马的机会还是有形的东西比如面包总是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难道没有足够的面包提供吗？是的，没有足够的面包。短缺常常被掩盖了，因为使用某种东西总需要有支付能力，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需要该种东西的人数。如果没有这样的限制，那么短缺将显而易见。要是没有法律规则，那么裁决或多或少的短缺将暴露无遗了。某些短缺能够看得到，但大多数短缺由于需要或需求受到约束而被掩盖了。合适的规则比如大学入学考试，都是常见的约束形式。人与人之间的以物易物的交换，是一种更广泛的约束。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约束，以至于熟视无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多半是由于短缺，当没有足够的东西可供分配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把它当做不是必需的。

事实上，资源不够分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即使最富裕的社会也是如此。如果某人拥有了一切，那他多半也意识到，他能够为他的孩子争取到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但可供选择的好学校不多，他能够获得更多的医疗服务，然而社会的供给能力有限，更不用说家庭成员的个人护理、有执照的或私人的飞机、生活空间等。考虑到世界上千千万万运气不佳的人，那么短缺就更是目共睹。世界远没有这个能力，能将这千千万万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西欧劳动者的平均标准。

为说明资源不够分配的情况，用约束一词是可以的，但更为常

用的一个词是稀缺。稀缺是一个比较好的称谓，不过在使用它的时候需要注意，稀缺并不意味着某些东西的数量少或只有几件东西，它应该包含另外一层意思，最起码不能认为它表明的只是一种吝啬或自然界的不慷慨。稀缺的意思是欲望及其可行性之间的关系。地球表面有几百万平方千米的肥沃土地，尽管如此，但它仍然是稀缺的，是不够分配的，因为许许多多的人都想去耕种它。通常上门服务的福音传教士不多，但它并不稀缺，因为没有多少家庭对他们的服务感兴趣。参观西斯廷穹顶的机会不稀缺，只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想进去。

最后，即使每一位社会成员尽力克制更深层次的欲望，那么为了维持他们对稀缺东西的应得份额也需要协调。如果没有过去长期积累下来的维护协调的模式，社会不可避免地会走向衰败，人们将不得不在破败的屋檐下过着极其简陋的生活，没有清洁用水，没有学校教育，以及其他更多的东西。从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合作，我们已经得到了许多的实惠，因此为了继续得到更多的好处，我们必须不断地进行合作。

1 对于社会秩序是怎样获得的，可参见 P·S·科恩的著作《现代社会研究》。在书中，作者对有关问题的阐述令人耳目一新。对此有兴趣的读者，特别要好好读一读这本书中的第二章。

2 关于生物世界的相互调整，可参阅 R·道金斯的《盲人制表匠》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关于政治中的相互调解，请参阅 C·林德布鲁姆的著作《民主的智慧 基于相互协调的决策》。

3 在本章中，参考了波利比奥斯的名著《通史》中的第六章第十节。该书的英译稿是 W·R·帕顿完成的。

第三章 市场体制协调

市场体制是相互调整的最大协调者，特别是面对稀缺性的协调发生困难时更是如此。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也包括一些经济学家，都相信市场体制协调着经济行为，并且相信只能协调经济行为。尽管存在着其他的一些行为领域，但通常人们认为，只有那些能称之为经济行为的，市场体制才能发挥协调的作用。我认为，这个看法到了应该被放弃的时候了。事实告诉我们，市场协调的行为范围相当广阔，即使那些我们现在仍不知道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它都可以进行协调。在这里，再一次指出，让我们考虑社会，不要仅从经济方面着眼。

尽管克罗马努人可能用贝壳充当货币进行交换，但从史前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我们已经发现对大多数人来说，买卖活动仅是社会协调的从属方式。在古代，尽管贸易之路得到了发展，可是风俗习惯和政治机构仍然承担着社会协调的重任，只是在最近三个世纪里，这个重担的许多部分才被转嫁到市场体制身上。为什么市场体制能成为一个最大的协调者，原因在于原先社会里那种卖身为奴的现象最终被通过劳动获取工资的方式所战胜，将劳动者牢牢控制在土地上面的静态的封建关系，最终被劳动和财产的市场交换所取代，城市里的行会控制，最终屈服于更为自由的买卖。

一、合作

首先，我们来讨论市场体制是怎样获得合作的，然后，我们再考察它是怎样维护安定的。对此，我们既不需要用理论支撑也不需要进行分析，只要举一两个普通的例子就可以了，因为随着稀缺性的逐渐暴露，只有市场才能通过相互调整实现合作。并不是每一个生活在市场体制下的人，都能知道市场合作这个基本的事实，可是通过这些事例，能够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某些习以为常的方面，须知它们的意义经常被疏忽掉了。在这里，我本人的意图，不在于要为市场体制创立一个论据，只是想把它显著特征与市场体制下的合作联系起来。

一清早，许多人陆续走进米兰的咖啡馆喝咖啡，他们一点都不怀疑他们是否能得到咖啡。是什么使得这些人如此自信呢？是大量的合作，尤其是任务在许多人之间的分派，使他们能合作起来共同完成这个仅凭个人的能力无法做到的技艺。通过各自的市场交换，许多人被联结在一起，他们的行为被联系起来了。农民们合作起来种植咖啡树和收获咖啡豆，汽车驾驶员和火车司机将咖啡豆运往海港，在海港，码头工人和船员将货物搬到船上，船到了热那亚港之后，由码头工人把货从船上卸下来放到仓库中，最后再由卡车、火车运往米兰。到了米兰，紧接着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链式合作，一些人烘焙咖啡豆，其他的人纺织麻袋以便包装烘焙熟了的咖啡豆等。在这一过程中，参与的合作者还包括：码头、公路的修建工人、保险公司、检验检疫员、批发商、零售商、咖啡烘焙器的设计师、制造工人、安装工人等等。无论离米兰是远还是近，无数的人在这一合作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要是我们时常能停下来想一想诸如此类的活动链和活动网

络，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忽略市场合作的每一个细节。让我们来考察其中一个市场合作的小片段吧，比如米兰进口局的会计员使用的带香味的铅笔，就是许许多多的人共同劳动的结果：一些人直接从事了铅笔的生产，一些人专门制造橡皮，生产铅笔的厂房是建筑工人建造的，用的电能是由电力厂的工人生产和提供的，输电用的电线是工人们生产出来的，另外，还有许多人从事着挖掘、提炼、熔炼和运输矿物的工作。如此追踪下去，实际上是没有终结的，也许铅笔制造工人还可能是到米兰咖啡馆喝咖啡的人。合作不是线性关系，而是多边关系。

不论是在哥伦比亚还是在米兰，活动环节或网络中的任何一个，我们都不能随意地疏忽掉。合作表明了一种高度的可预见性。咖啡种植者根本不需要站在咖啡园的路边焦急地等待买主来购买咖啡豆，就像等待他的一位有钱的叔父一样，即使每一个种植人都依赖于一位买主，他们也不会经常感到失望。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制造鞋子的合作问题。一位韩国人在印度尼西亚开办了一家生产鞋子的工厂，但设计和原料却来自俄勒冈一个指定的工厂，而装饰却在台湾的一家工厂进行。在得克萨斯养牛、屠宰和剥皮，然后将生皮提供给下一级用户。生皮通过铁路由得克萨斯运到了洛杉矶，再经海运或空运送往韩国釜山鞣制成革，之后经航空运往印度尼西亚。鞋子的中底是由石油化学品制造出来的，而这些化学品是以从沙特阿拉伯运到韩国炼油厂的石油经过蒸馏和“裂化”得到的。在台湾加工的合成橡胶是用做鞋子外底的材料，加工过程中使用的电能来自于台湾的核能发电厂。日本生产的机器将公司的商标缝制在鞋子上，塞在鞋窝中的纸是用种植在苏门答腊的树制造的，包装鞋子用的纸盒来自于新墨西哥州的造纸厂。最后，包装好的鞋子由超级集装箱运输船横跨太平洋运到美国的市场上销售。这些开展合作的每一个企业，又同

它们身边的成百上千的有着合作关系的供应商保持着联系等等。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求正确评价合作的范围和每一个细节，那是不现实的。就制鞋而言，人们常常听到的一个抱怨是，在制鞋工厂就业的海外劳动力的工资待遇过低，与他们的付出根本不相称。

即使这些加工过程和目的似乎在当地也能满足，但长长的合作链仍然是必要的。假如你叫一个木工更换腐烂的篱笆桩，他虽然能够独自地完成这项活计，但他使用的铁锹和锤子是其他人制造的，而生产铁锹和锤子的人他们使用的材料——铁又是炼铁工人生产出来的。

总之 我们需要注意，一杯咖啡、一双鞋子或新的篱笆桩 包含了合作的巨大意义。开矿、船运、工厂、铁路和电力 所有这些都是合作的组成部分。仅有土地和劳动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再加上资本，人类社会才能摆脱几千年来没有消除的贫困。资本这个词是大家所共知的，它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资源。为了成功地实现资本的创造，有两个特别需要注意的社会协调任务。其一是从最终产品的生产到中间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与自然资源大量分配的各种转移活动。比如说，从生产小麦到生产拖拉机。其二是高度专业化的参与者的出现和扩散。比如，在印刷术发明以前，誊写员只需要一枝笔就可以行事了，可是现在印刷机和复印机大行其道。复制的过程能够实现，需要制造印刷机的工人，零部件供应商、设备维修技工、运输服务及培训，这是由一个具有一长串名单的专业化协作者所共同完成的。

所有这一切的意义表明了，我们不能只看到咖啡豆或一双鞋这些有形的东西，而要把它们看成是人类行为编织成的网状物，是人们的共同努力所编制成的。市场体制是人类合作行为的一个模式，绝对不是正在运行中的一袋咖啡豆。为了认识市场合作，我们

必须周密考察人的行为，而不是只注意到像鞋子或几杯咖啡之类的东西。尽管行为的最终结果总是凝结在某个物体上，但与此同时，它们也经常不是这样。例如，内科医生、园艺工人、教师，这些人在合作链条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直接向其他人提供服务来实现的，而不是对向他们寻求帮助的人提供物质产品。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人几乎不到总人口的一半，大多数人都从事服务业营生。当市场活动没有产生物质产品的时候，那么实现这一结果的就是人的行为表现。

顺便说一句，市场这个名称不太好，常常会遭到误解。市场体制中的市场不是指某个场所，而是网状组织，它不是一个方位而是一系列协调行为的集合。在一个市场体制中，一部分人在一个确定的场所彼此发生着交易，比如农贸市场、股票交易所等，它们都可被称作市场。这一类的市场既有交易关系又有确定的场所，然而，许许多多的市场是没有场所的，在这类市场中，交易活动的参与者是相当分散的，主要通过电话或因特网进行着联系。

市场体制组织了合作，但我依然不认为这是市场体制的本质目的。市场体制不是为合作而存在的，也不是为其他目的而存在的。市场体制也不是为稀缺或欲望的满足，为资本积累的满足，为精英阶层对广大群众的剥削而存在的，它有三个与此不同的真正的意图。即使不从社会进程来说，人追求的目的与某些动物或组织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然而，市场体制却根本不是这回事了，尽管市场中的参与者是这样一些人。正是因为市场体制的无心和无意图，才能保证它能担负实现社会合作的巨大任务。再者，市场体制组织起合作，但它又服务于个体的各种各样的目的，而没有被限于推进经济目的的范畴。

市场体制有利于社会合作的命题，对大多数人来说确实是难以接受的，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市场与竞争等同起来，甚至

认为市场就是狗咬狗的斗争，它充满着残酷性。是啊，市场体制确实包含着许多竞争的场面，但是话说回来，市场体制的每一个参与者通过合作而与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发生了联系，这其中竞争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的。在咖啡的例子中，托运人因合作的需要与其他无以计数的市场体制的参与者浑为一体，托运人之间的竞争相对而言少之又少。托运人可能在招聘雇员的时候与其他雇主有竞争，与茶叶的托运人有竞争，因为消费者可能选择喝茶而不喝咖啡，尽管如此，他们需要合作的范围仍然是竞争的范围所无可比拟和望尘莫及的。

事实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在当今这个时代，市场体制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协调器 或者说 至少有 30 亿人参加到了这一合作的行列之中。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来说，没有哪一个社会合作方式能与市场体制相媲美。我们时常把政府当作头号的合作的组织者，但是政府从来就没有把如此众多的人组织起来过，也无法组织起来，因为它交待不清每个人活动任务的详情细节，从而不能对合作中的角色给出明确的分工。姑且不论其他，我们应该看到，全球性的市场体制是有目共睹的，但到哪里去找一个世界性的政府呢？即使在一国之内，市场体制将合作的细枝末节都组织起来了，将成千上万的任务准确地传达到每一个具体的角色，可是如果要让政府来做这些事，它永远也完成不了，更何况它还不想这样自找麻烦呢。

市场体制拥有最长的手臂和最灵巧的手指，对此，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首屈一指的、无与伦比的东西，它应该单独放在一层，它是世界上最广泛、最面面俱到的社会合作的组织者。不论是承认市场体制是人类的最大施主，还是怀疑市场体制的长臂和灵巧的手指是令人生厌的怪物，它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作为合作的非凡组织者的地位却牢不可撼。

在这儿，我需要申明，我不认为市场体制在市场互相调节中就一定能实现最优结果或均衡。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人们在他们愿意称呼的协调模式中的意见并不一致，你可能向往一个高度公平的结果，我则不这样看。或者，你可能认为某些价值，比如资源保护，由于要获得协调而被疏忽掉了，然而我却认为，无论什么人他总不能一概否定——将咖啡运到米兰咖啡馆或者将生产好的鞋子运到世界各地，由协调而带来的在无以计数的当事人中明确的分工。至于协调的质量问题，先让我们耐心地等待一会儿。

所有被提到的合作，都需要有大量的来自政府的帮助。政府建立起了自由权、财产权和契约的义务，没有这些，人们就不能进行买卖。尽管并不总是完全成功，但政府在整治抢劫、盗窃方面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政府建起了码头、运河、公路和铁道，维护着货币体制，因此而管理着银行及债权的发行。为了鼓励企业勇于面对风险以增强活力，政府通常承诺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损失分担。政府派军队去国外用武力开辟市场。它还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进行合作 加入像 WTO 这样的国际组织，共同建立和管理国际贸易的规则。销售前景一向被看成是增强市场活力的动因，因此，没有政府的支持，市场体制难以为继。政府的支持不仅保持了市场体制的存活，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增长。假如市场体制是一出舞剧，那么政府则提供了演出舞台和乐队。

政府是市场体制永恒的护理者，正如我们看到的，每当一国要处理变化不定的经济问题时，政府便粉墨登场了。比如，处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风暴，台湾的通货浮动，以及对台湾的企业获取外汇施加的约束。再如，敦促金融企业运用基金支持股票市场，提供货币以便于房产的购买，对银行施加压力以扩大对企业的贷款。当然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政府也会采取大量的措施以提高银行的收益率，减少股票市场交易税，对高新技术产业采用

税收激励措施等。日积月累，政府始终保持着对市场体制的监控，并采取不断变化的应对措施

二、维护和平

市场对和平秩序的贡献也就是医治创伤，这是否比得上它所带来的合作呢？这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原因在于许多人发现这个问题的本身就令人费解。他们或许会说，市场体制只有在秩序良好的社会里才会呈现出典型的繁荣。结果是，市场体制没有维护和平的任务，即使它可能具备如此功能的潜质。这是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论点，除非有人要问这些和平的市场社会究竟是怎样达到和平的。

简单的事实是，一部分人可能简单地通过促进社会进程以和平地解答谁获得了什么（包括土地、奴隶、职位、赏识或别的什么）这些问题，从而避免就这些问题展开激烈的冲突。确实如此，当我们观察到一个社会内部是和平的，但我们不能就凭此就去推断其成员缺乏导致他们进入冲突的精神。相反地，我们应该这样来认识，合适的社会进程已经解决了他们之间的许多冲突。这些进程之一，就是社会市场体制，它不仅在和平的社会里达到繁荣，同时它也有助于这些社会实现和平。大约在三个世纪以前，孟德斯鸠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这里重申一下：市场体制造成了社会的和平，但这并非是有有效的、公平的或具有人情味的和平。

对市场体制是和平的维护者的观点，人们可能会提出反驳，即：当人们一旦不满足他们生活中的机会时，他们就会相互争斗。然而，高收入尤其是收入的不断增长，将会减少磨擦、冲突及其可能产生的相互伤害，从而使和平稳定的政治秩序变成可能。市场体制能够带来高收入和高增长，这一点只要看一看西欧、北美和新

近发展起来的引人注目的亚洲就可以知道。总之，市场体制有利于社会和平。

上述主张或许是正确的，但它缺少对市场体制本身能提供减少相互伤害的社会机制的断言，相反它却认为，公民将被强迫去保持和平，因为在市场社会里他们并非十分富裕，从而愿意遵守由政府为控制相互伤害制定的法律。政府也是和平的维护者。

从本质上说，市场体制创造了行为的模式，它能够使人们的行为方式减少相互伤害，并且维护着社会的和平，另外它还引导人们服从法律。不避转弯抹角之嫌，我们能看得更清晰。一旦出现了相互伤害和社会混乱，就需要保护每个人、每个家庭免遭他人的侵犯。为了社会和平，每个人或每个家庭需要一个受保护的自治岛。假如一切都是这样，那么由习惯和法律建立起来的保护，或许就足够维护和平。通过这些保护，公民就能确立为每个人都感到满意的权利，而不受到其他人的干涉。这样讲来，似乎没有给市场体制充当和平维护者留下作用的空间了。确实，在这些条件下，市场是社会和平贡献者的思想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以为然或者异乎寻常。

然而，人们为了防止侵犯，更多地希望得到固定的保护，至少他们会适当地提出要求得到各种各样新的满足。为了获得更多的保护，他们互相之间勾心斗角，争斗造成更多的紧张，因为没有更多的保护能够确保分配均匀。他们想去扩大他们的权利，特别是分配因合作而带来好处的权利。争斗各方中一方赢得的多出来的份额，实际上就是其他方的损失或支出。要是没有和平的维护机制，冲突将会导致彼此之间许许多多的伤害。和平维护机制不仅必须处理对已确立的职位的固定保护，而且也要处理错综复杂的事物，以及人们在面对稀缺时为了获取更大的份额而造成的冲突和伤害不断变化的情况。

在争斗中，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历程中的野心经常发生着改变。比如，在刚刚进入成年的时候，希望居有定所，拥有配偶以及一大帮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可能要求有更好一点的居住场所、更大的社交圈子。步入老龄之后，他可能更关心社会是怎样老有所养、老有所终的。一月一月，一周一周，人的追求总是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今天某人需要得到食物供应，可是一周之后他可能不再有这样的需求。保不准哪一天生了病，此时又需要未曾料及的医疗保障体系。因此，为了维护和平，每一个社会都需要对无止境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处理，某人应做什么事，谁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应该准备多少食物，怎样在人与人之间或家庭与家庭之间进行分配。是每天或者每周一次，还是每月一次分发一只羔羊腿？分发给哪些人？一件新夹克衫是怎样到达想要它的人的手中的？是什么样的夹克？市场体制正是这样的一个和平维护机制。

我们倾向于承认这一点，觉得没有必要考虑在争斗潜在的充满冲突的要求时发生暴力的可能性，没有必要考虑市场体制以和平交换取代更具暴力的分配的意义，因为一切都十分自然，根本不必杞人忧天。

保守的经济学的观察视野与此不同，它揭示了稀缺性将导致效率问题的产生。假如没有足够的东西可供分配，那么社会必须寻求某种办法权衡各种选择。如果只要从其他生产线上拿来劳动和原材料，比如厨房用具，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汽车生产出来，此时不管是贫民还是官员都将面对是否值得减少厨房用具的供给而生产更多的汽车这样的决定。

这种比较保守的分析路径是对的，在后面我们将用事实来说明，市场体制是获得有效选择的方法。但在这儿，我们来观察由于稀缺而引起的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即可能的暴力冲突。稀缺性带来的首要的满足不是有效的选择，而是一种在具有冲突要求之

间进行分配的方法，以便人们能满足各自的需要，从而避免人们在追求需要的时候自相践踏和残杀。毫无疑问，市场体制就是这样的方法。

把市场体制看作是一个政治进程似乎是非常有用的，没有政府就没有基本的政治，那么没有稀缺性因而也不会有市场体制。社会之所以一次次被推向混乱的边缘，主要是因为不断改变的对无数稀有的目标和表现机会的带有冲突性的追求。对这个易发作的事态，市场体制提供了解决方法。它通过人向市场提供有价值的东西而可能获得的货币总和，从而限制每个人的要求限度。这是一个规则，不妨姑且把它看成是一个政治规则，它是等价交换的规则。一旦达到了货币总和的上限，每个人只好各自确定自己具体的需要 比如到底是一双鞋 还是一次旅行、声誉 这就要看他所挣的钱是否有足够的支付水平了。因此，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可能会发生的战争，将转化为一个和平的过程，即非凡的平静和富有效率的政治实现。

这个体制，既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也得到大众的默认，即使可能有一部分人反对它不够公平，但大多数人对此泰然处之，基本上依此而安静地过着生活。他们不会在等价交换的规则之外提出个人非分的要求，因此就避免了激烈争斗可能造成的伤害。

自从市场体制确立以来，它在维护和平方面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学家 B·摩尔认为，具有傲慢野心的人总是会通过暴力来追逐财富和权力 比如亚力山大、凯撒、阿提拉 以及西欧和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军阀。只是到了近代，野心勃勃的人才转而通过市场获取个人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比如福格斯家庭、罗思柴尔德以及美国的橡胶大王等。人类学家 L·波斯匹斯尔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在新几内亚的巴布亚人，通常通过两个策略来获得东西，居住在高地上的人互相抢劫，而居住在低地上的人却相互贸

易有时，选择是如此表现出来的，即要么硬从他人那里夺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要么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取得前者是暴力的惯用伎俩，后者则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的。

在我们的心目中，等价交换可能被当作是压倒一切的主流规则，乃至于是理所当然的、习以为常的，根本无需思考，根本不必担心确立起来的规则在每一次交易活动时还会出现可能不正当的企图。

有些冲突很显然可以通过市场体制得到解决，当然也可以借助政府政策，比如税收、养老金和赞助性活动来处理。可是，问题又产生了，如果人们反对或违反等价交换规则，把买卖行为转化成偷拿，比如公开在大街上抢劫、挪用公款以及诈骗，对此，市场体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在别处，市场体制也不能很好地处理阶级冲突不可扑灭的潜伏之火。市场解决冲突性要求，是同财产权的不公平的分配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同人与人之间技能的差异有关。这两个关系，必然会产生相当不平等的结果。不过，市场构筑了一个奇异的维护社会和平的机制。

当然，市场体制不是维护社会和平的惟一手段，冲突性的要求可以运用法律、行政以及其他办法来解决。即使是在市场体制取得主导地位的社会，像离婚夫妻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政治候选人之间竞争等问题的解决，同样离不开各种辅助手段。很明显，就政府拥有的全部权力来说，共产主义制度也可能不得利用消费者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解决诸如目标、机会和职业之中的冲突性要求。规则和政府权威，远远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三、一切为了合作和维护和平

市场体制协调的某些特征，比如合作和维护和平，是特别值得

注意的。

（一）参与和控制的扩散。市场体制是不寻常的东西，或者说是无与伦比的东西。我私下揣测，人们可能会这样谈论，这主要表现在它的无出其右的参与和控制的扩散。如果几百万人由市场体制实现协调，那么所有的人都能分享对它的控制。企业家是市场参与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人，但是他们决不是实施控制的惟一人选，你、我，包括每个购买者也都在实施着控制，就是那些提供表演获取工资或小费的人也是如此。每个人手中掌握的“货币选票”怎样支配，将因此而产生巨大的控制影响。市场“选举”拥有相当多的参与者，是民主选举难望其项背的。在协调的过程中，没有哪一个人不积极，没有哪一个人是被动的参与者，没有任何不投票者。

（二）率真的决策。企业中的问题，特别是对大公司来说，可能从表面上看是令人沮丧的，但与中央计划者面对的有效选择问题相比，它们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市场交易通过收入分配、投资效率和劳动力分配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没有哪一个决策者必须直视这些问题。公司执行官根本不必决定怎样为社会对钢材进行最好的分配，而只要决定企业是否应该购买、是否出售抑或加以使用就可以了。为了在有利的价格水平下处理这些选择，执行官需要进行测算、估计和获得反馈的信息。

（三）偏好冲突的协调。在解决两个经常存在的协调模式之间的巨大分歧时，市场体制的协调功能尤为引人注目。让我们设想一个社会，它的统治者或表决人希望有 40% 的劳动力进入重工业，如钢铁工业和汽车制造业，可是只有不足一半的人响应，对此，应怎样将双方协调起来呢？是征集必要的劳动力，还是缩减重工业计划呢？市场体系能够静悄悄地实现协调，甚至我们都感觉不到问题的存在及其解决方法。

假如人们想得到比正在得到的更多的重工业产品，那么他们

就必须买得更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减少对其他产品的购买。这个转变将开辟重工业领域新的就业机会，从而减少其他部门的就业。与此同时，对重工业产品增加的需求，有可能会提升它们的卖价，由此又会减少生产和雇员向重工业领域的必要转移，最终恰好双方达成彼此相互满足的均衡。尽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工人就是按这样的方式流动的，但我们不是常常停下来评价他们的流动，尤其是把它与购买转移联系在一起。

一些人的个人状况和条件，迫使他们只能停留在既有的职位上，这部分人是不能流动的。要想激起人员从一个产业到另一个产业更大规模的流动，根本不需要有吸引所有雇员的新的职位，只要有充足的人数能够完成协调便可以了。

（四）适应性。姑且不论几百万个角色安排的详细情节或精确程度，也暂且不谈市场协调的要求和权利，角色和权利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却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如果喝咖啡变成了大众的习惯，那么通过将合作参与者联结起来的系统调节便随之而形成供需平衡：扩大咖啡豆的种植、准备更多的运输船只、增加咖啡的海运能力，甚至还要多生产钢笔。过去的 30 年里，我们已经看到了生产能力的迅猛变化和计算机的使用。市场协调变化的速度，摆脱了许多其他社会模式的刚性和僵化。

（五）黑色市场与灰色市场。为了说不出道不明的理由，人们或他们的统治者常常会禁止某些种类的公开交易，比如婴儿买卖、人体器官买卖、倒买倒卖音乐会的入场券等有些交易经常会被课以重税或附加的限制性条款，比如对汽车进口征收高额关税等。在合法市场和黑色市场交织的市场中，参与者有可能会滑向非法的交易。无论什么人，如果他骗取了返还的个人所得税，就有可能成为非法市场的参与者

在目前的计划经济社会里，非法交易是司空见惯的。由于在

合法建立起来的渠道中得不到想要得到的东西，因此消费者可能秘而不宣地建立起互惠互利的交易网络。当企业的管理人员一旦发现，计划体制不能帮助他们获得必需的投入要素，此时他们便会想方设法地与其他企业暗中勾结，进行非法的交易。计划者们其实心里也明白，要想保持体制的运转，非法交易是必需的，因此总是顾左右而言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这些交易虽不能说是黑色的，但依其交易性质可称为灰色的。从范围来说，黑色市场和灰色市场是市场活力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它们的交易量究竟有多少难以估计。这些市场不仅在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中存在着，就是在市场体制的国家中也屡见不鲜，有时候，它们是协调的障碍，但另一些时候却有助于协调的实现。

关于市场体制协调及其发展史，不妨参阅 F·布罗代尔的《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这是一本由 S·瑞罗尔德编译的书，原书是用法文撰写的。

第四章 肉中的骨头

市场体制不是一个场所，也不是指某个东西或者这类东西的集合，相反却是指由若干个不同行为方式形成的组合。为了建立市场体制，一定的习惯和规则是必需的，市场体制究竟是否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判定标准就是要看这些习惯和规则。因此，我认为习惯和规则是市场体制结构中的骨架。一旦识别了这些习惯和规则，我们对市场体制的认识便更加明朗了。个中奥妙在于，规则和习惯能告诉我们，市场体制是怎样实现的，为什么市场体制中的参与者能够有条不紊地各行其是。与此同时，它们也告诉我们市场体制与自由、产权之间的密切关系与货币、企业家精神千丝万缕的联系。

下面，我们从最基本的着眼点入手，然后一步步地勾勒出市场体制的骨架。

1. 习惯与规则能够确保对市场体制参与者的时间和能力的广泛的控制，换句话说，这就是合法的自由，只要人们追求的精神或要求是法律所允许的，都是可以的并受到保护。

按照上面的说法，可能不包括合作以及担心可能的相互伤害而产生的对和平维护的需要的含义，另外，它也没有包含市场相互作用的意思。因此，广泛的人身自由（其范围和限制我们将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进行讨论），是市场体制的基本骨架或基础材料。没有它，市场体制就不可能实现

2. 广泛的权利能够保证人们的时间和能力的使用，其中最重要的是财产权。如今，财产权人所共知，它也是受到习惯和规则保证对其进行使用、提供 对其他人的侵占说“不”的权利。比如 你现在正在建造一所住房，那么你必须有一块土地、建筑材料、锤子和锯子，在具体建造的过程中，你实际上就在实施着对它们的控制。

需要的权利并不必然就一定是在现实的市场体制中能以私人财产相称的一系列权利，尤其当这些权利可能会溢出对财产权巨大的不平等性的时候更是这样。“私人财产”这个词，会提升人们对其保卫或攻击的热度。然而，存在的财产权是否受到赞成或是强烈的反对，对此，一系列广泛的对有用东西的控制就是必须的了。同自由权一样，当人们行使自由、支配财产去追求个人的抱负时，财产权能够实施相互调节的作用。

自由和财产这两种权利，看起来好像是社会广泛协调体系纠错的基础，因为除了明确禁止的行为之外，它们保证了社会成员能做他们想做的事。然而，协调似乎也是需要的，因为人们决不是仅仅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就可以了；相反，他们还倾向于对合作和维护和平的需要。让人更感兴趣的是上述两种权利能够支撑起合作与和平的维护。

3. 市场体制需要的第三个习惯和规则是等价交换。撇开游说 不谈，从他人那里获取想要的机会或物品，惟一可行的途径就是也要给对方以相等的好处。这一规则即刻揭示了合作的可能性，而且还是那种和平的合作。哪一个人也不能采用恫吓、偷窃或者要求政府通过权力帮他夺得他想要的东西，一切交换只能采取等价交换的方式进行。在建造房屋的例子中，你可能会获得邻居们的帮助，或者邀请他们帮你的忙，但是你必须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好处。

上述三个习惯和规则，创造了广阔的相互协调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每个参与者探讨了既为自己也为他人获得利益的无数的可能性，以及无数的合作和减少冲突的机会。你能够通过给予报酬或帮助而招徕他人教你的孩子，给你送来食物和娱乐，你可以凭借你的给予和付出而四下寻找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有一条似乎需要注意，没有任何可供选择的规定名单，也没有任何规定的渠道，只要你愿意投入精力，你可以在任何方向上寻找你的追求和需要。

然而，在追求目的和需要的时候，是存在机会约束的。在规则适应的范围之内，必须进行物物交换，你必须去寻找那些能提供你想要的东西的人。假如你想要按摩，那么能找到具备这项技能的人吗？对此，就需要一个协调。即使你找到了这样的人，按摩也不会马上就能进行，还要看你能否给按摩工人提供他想要的东西。按摩工人将接受你菜园里的蔬菜吗？这需要另外一种形式的协调

即使如此，同早期社会那种松散的共有协调相比，物物交换有着明显的优势，因为接受一方决定着怎样和什么时候去交换，那么这样的不同于物物交换的相互交换，就没有更多的机会在交换中获得具体的好处。解决双重协调对协调的障碍的第一步，就是下面所说的第四个规则或习惯。

4. 每个人都同意某种等价物，交换才能进行。无论是贝壳、黄金还是纸币，都有可能是货币。有了货币，对一致性的需要便从两个降到了一个，也就是说，第二个一致性无需存在了。尽管你可能还要寻找提供你想要的东西的人，但是现在你不必再去寻找想要你提供东西的人，即使你没有一个具体的物品或能提供一个具体的服务，只要你拥有大家都愿意接受的货币便可以了。在建造房屋的例子中，如果你想招个木工和五金工，你大可不必只寻找那

些也想得到你的物品或服务的人，因为任何一个木工，任何一个五金工，他们都想得到货币，只要你有货币支付能力，随你招多少人，随你叫他们干什么都可以。

5. 通过货币的作用，从家庭日常用品到等待销售的其他物品和服务的转换都能实现。现在，参与者不必坚持传统的家庭努力，以进行表面上的物物交换和剩余产品的销售，可以让销售机会决定他们所做的一切，你可能不再决定建造房屋了，转而去寻找能够增加你的货币收入的工作，然后，你可以用你挣来的货币收入购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买一套住房。

为销售而进行生产的转换，至此也消除了第一个协调的必要性，即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些拥有自己要买的东西的人。问题是，大家能不能找到这些人呢？现在由于皆瞄准着销售，因而整个社会成员都参与其中，并且能提供他人想买的东西。假如人们交换剩余产品只是偶然的事情，那么市场毫无疑问是一个可怜的、无能为力的协调者市场体制决不是巨大的、持续不断的跳蚤市场，如果把它看成是交换机制也有失公允。市场关系并不始于交换，它是该生产什么、拿什么去交换的决定者。

6. 寻找销售机会导致了中介机构的产生。自愿的卖者，不仅向那些需要他的产品或服务的人出售产品和服务，同时也向那些从事着贩卖活动的人出售产品和服务，结果人人皆发现，向那些厨具生产商出售卡车是有可能的，要么他们向厨具生产商出售配件，要么为生产配件的人提供零件，要么向制造商提供电力，要么是财务和金融服务。正是由于这些中介机构构筑的链条和组成的网络，才使得咖啡种植者和咖啡馆经营者，能够合作起来向消费者提供咖啡。中介机构提供了船运、仓储、加工以及在咖啡种植者和咖啡馆经营者之间的其他一系列活动。

7. 一些参与者逐渐专门承担起中介的作用，尤其是在创造新

型的中介联系和劳动力、土地、资本的组织方面更是如此。这样说也许不够准确，但大家可能更为熟悉，一些参与者创办了企业，这些人常被称作企业家。企业家利用了循环的可能性，他们不仅为用户提供五金用品 并且还建造了厂房、办公大楼、机器设备、零部件以及生产五金用品的其他中间产品。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了巨大的生产性资本。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生产性资本对不断增长的产出的作用越发强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积累是市场体制的核心过程，资本主义正因此而得名。

制造五金用品的企业家在建造厂房和配置必需的机器时需要依赖其他企业家。反过来，这些企业家也会依赖五金制造企业。企业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导致了长长的合作链条和巨大的经营网络的诞生，它们之间的协调因而变得更加密切，范围也更加广泛。

不仅仅是普通百姓，就是企业家也是市场体制最频繁的参与者 企业家是将劳动和其他投入转化为物品和服务的职业活动者 在市场体制中 他们充满着活力 是市场体制中活的灵魂 他们要频繁地作出决策，并且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8. 企业家总是想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并以此来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他们创立了企业集团，期望做成单个企业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在组建企业集团的过程中，形成了集权制的共同惯例。这就是说，通过借用利息和红利的形式，将企业联合起来。集团是最大的协调者，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更好的结果。因此，在建造房子的时候，需要的电力、原材料，某一个企业集团就可以全部供应，像摩根建材集团的供应能力，恐怕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企业 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家比较熟悉的、起主导作用的、法定的企业集团的形式就是所谓的公司 过去 它被叫做合伙制企业。

总之 市场体制的骨骼就是 自由、财产权、等价交换、货币、为销售之目的活动、中介、企业家及企业集团如果把市场比作一

场舞会，那么政府提供了舞台和乐队。哪怕是一个普通的市场参与者，当他走在去超市购物的路上时，也需要政府提供的社会治安保障，企业对政府援助的依赖可能更是极度渴望的。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常常使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损失风险。如果没有政府的一系列援助，那么他们可能会变得畏首畏尾，甚至根本不敢干大事。

最后来谈谈市场的“混乱”问题。

当我们正在思考从哥伦比亚到米兰成千上万的人合作起来提供一杯饮用咖啡的时候，当我们正在考虑没有哪一项制度更不要说政府能比得上市场组织合作的能力的时候，对不时听到“市场混乱”的议论或许会感到奇怪。市场决不会产生混乱，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诘难呢？对一些人来说，这仅意味着市场从表面上看来是混乱不堪的。早晨的批发产品市场是乱糟糟的，在许多股票交易所进行交易时的大喊大叫，似乎更像是游行示威而不像是一个组织化的交易活动。我承认在一些市场活动中表面上的确是无秩序的，尽管如此，嘈杂和挤来挤去依然是精确的、快速协作的一部分。比如对城市时鲜产品的供应，就是协作的巨大贡献，不过它的完成却是在世界上所有的水果和蔬菜早市交易中。

另外一些市场从表面上看可能更加混乱，通过历史记录和人们的记忆 我们不止一次地想起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在这次大萧条中，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由于失去了工作而被逐出了市场体系，在一些国家，生活下降波及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有些人可能担心，大萧条会不会再次发生。从理论上讲是有可能的，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如此的大灾难确实没有再现。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通过政府支出和对货币、信用供给的管理，已经成功地使市场体制趋于稳定。

当然，市场体制的正常运行不应该让我们听不进别人的议论。每隔几年市场便会进入不正常的状态，即所谓的衰退。这种衰退

同 30 年代的大萧条相比是无过之而有不及，但不管怎样说，只要是衰退总会产生一些破坏。近年来，经济时常出现衰退，以至于人们习惯了这种不正常。各种程度不同的衰退，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苦难，然而，无论是衰退还是市场体制的其他缺陷，都不能使我们漫不经心地断言，市场体制会制造混乱。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体制的无组织化得不偿失的最大恐慌，可能起因于不顾后果的银行业，以及政府对金融市场无能的管制。如果任其发展和蔓延，混乱就会从一个国家波及到另一个国家，就像 1997 年印度尼西亚的金融风暴波及到亚洲其他国家、巴西和俄罗斯一样。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应看到，“混乱”的说法毕竟显得夸张了一点。

1. 市场体制的撰稿人对市场体制究竟是什么大体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可是读者们却时常能发现到彼此差别很大的各种报道。在此，我希望读者能把我在本书有关章节中所做的说明同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市场体制的综合性观点进行对照。可供比较的专著有：J·奥尼尔的《市场、伦理、知识与政治》，J·K·加尔布雷思早年写的《新工业化国家》。其中，J·奥尼尔的著作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给出了关于市场体制的“伦理、知识与政治”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文献目录。

2. 即使人人似乎都知道，进行选择是法律所赋予的自由，是市场体制运行的必要条件，但在产权上漫长的争论历史却留下了混乱不堪的遗迹须知，产权常常被攻击成具有剥削性质的资本主义的一个致命的特征。为了进行市场选择，消费者应该拥有货币形式的财产权，同时也应该拥有对他们购买来的物品的产权。对产权的抨击，区别了生产性财产的产权、“生产方式”的产权与那些个人的产权一种观点认为，生产方式不应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不论生产方式掌握在私人手中还是掌握在公众手中，市场体制中的生产组织要求某些人和某些机构，包括政府官员、公司和个体企业家，应该有法定权利使用、出售、购买或出租生产性财产。这些法律上的权利，必然与现存的私人财产权十分相像

持不同立场的人对产权提出了异议，他们辩解道，他们反对的不是产权本身，而是现存的市场体制中对产权总体上的不平等分配，不平等在未来的市场体制中可能会大大地缩小

3. 关于产权问题 可参阅 P·贝塞尔的著作《最辉煌的胜利：产权时代的繁荣》，G·S·亚历山大的著作《商品与所有权》

第五章 企业与公司

市场体制的协调过程，需要人人参与进去，不存在被动的参与者。然而 就像我在前面曾指出的，只有企业家和企业才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市场参与者的权利是什么？他们是怎样被控制的，对于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摒弃流行的议论，即当今公司统治着世界，企业受到那些不负责任的、贪得无厌的董事们的控制，公司已经使市场体制发生了变化 等等

对于应该寻求什么样的合作，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进行合作，企业家和法人可以说是直接的或者是接近于此的决策者在将原材料比如钢材加工成市场需求的成品（比如文件柜）时，这种直接的决策必须制定出来。在时间紧迫的条件下，让为数众多的人参与根本不可能及时地作出决策。当然，话分两头说，企业家在作这样的决策的时候，他们也会考虑到许许多多人的反应，如果消费者不买他们的产品，企业就根本无法生存下来。至于杀虫剂是否有效，生产出来的搅拌机噪声是否更小，这就不是直接决策人的职责了。至于这一点，只要考察一下相互影响的长长的合作链条便可略知一二，一端是投入，另一端是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比如从咖啡种植者到咖啡馆，你我在这个链条的这一端被动地等待着，没有参与到其中，但是由各个企业构筑起来的链条最终会延伸到你我这儿。

在市场体制中，撇开某些国家的政府不谈，企业是最为频繁的参与者，同时它们也是最大的参与者。在许许多多的交易过程中，

单个人站在一方，在他的对面却是若干企业。就像哪位律师说过的那样，“这是大象在一群小鸡中起舞”。在雀巢公司和联合利华公司之间，对它们产生的影响几乎没有什么相似性，但是如果考虑到它们的雇员或用户则是另一回事了。根据几项指标，通用汽车公司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它拥有将近 70 万雇员，它对雇员只支付工资，雇员必须服从公司的安排，就这一点而言，是根本不同于乡村铁匠与他的帮工之间的交易。大公司的规模往往相当于一个国家，而不再是简单的个人公司。如果用销售收入来衡量，世界上的大公司所创造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比好几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在世界 100 个最大的组织化的实体中，只有一半是国家的，另一半则是公司的。

本质上看，单个的企业本身往往就是进入许许多多市场的企业的集合。总部在德国的贝塔斯曼公司，在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共拥有 375 家分公司，经营的范围包括图书出版、书店、无线电台和电视台、印刷、音像制品、杂志出版发行杂志多达一百多种以及造纸业。在日本，一些法律上相互独立的企业共同构成了网络，特别典型的的就是人们常说的六大财团，这六大财团实际上都是混合体，每一个都相互持有对方的股份。在所有的市场体制中，企业间松散的联合体依赖于“互惠、利他、友谊、声誉和符合管理方法原则的合作关系”。

公司不仅直接控制一个社会的商品流和服务流，而且也控制着能够生产出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巨大的资源存量，比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习惯法允许公司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大笔基金，以购买或租用生产要素。通过银行贷款、发行股票或债券，以及其他信用方式，公司控制着资本市场。

政府时常会进行干涉，以控制公司的市场权力。另一个值得提醒的是，市场体制下的交易同其他社会制度和社会过程混合在

一起。在我们这个时代，市场体制受到粗暴的、不断的控制。政府是否会控制公司的市场权力，某种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实行的政治体制。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中，公司是个稳定的、颇具影响力的参与者。在许多情况下，结果的产生是政府支持而不是控制公司的市场权力所造成的，比如政府对进口施加条件以保护国内公司的垄断权力。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知的那样，不管是不是这样理解的，企业家和企业，尤其是公司，它们行使的政治权力远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比得上的。它们在政府中的权力，不仅对民主有广泛的破坏性，而且还能确保它们能从政府那里获取各种各样的好处。比如：保护总经理、股票持有者、借贷者和债权人免遭由于管理不善而造成损失的各种财政援助，显然这种获取方式是以他人巨大的成本付出为代价的。诸如此类的获取方式在全球范围来看都是比较普遍的，但他们不可能得到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储贷银行那种庞大的财政援助，据估计因此而花费了纳税人二千多亿美元的收入。然而，在本书第十七章以前，我一直撇开了企业的政治权力，在这里仅打算考察一下市场权力以及它在政治上的决定因素。

除规模较小的企业，作为直接的决策人，几乎所有的执行经理构成了市场社会里的煽动者和混合者的主要群体。他们给社会提供的服务是显著的、巨大的，并且也是必不可少的，可是由于拥有巨大的权力，也会制造不断的麻烦。从这些方面来看，经理们就好像是政府官员。根据他们发挥的作用不同，有两个平起平坐但不相同的集团。这两个集团分担了在社会协调过程中最重大任务的直接决策的责任，正是市场社会的这一特征，从而使这些任务反过来又对市场执行者实行了直接的控制。

在市场社会里，一些重要的决策，比如税收或者是否扔炸弹，一般在政府官员的直接掌握之中，而市场执行者手中所掌握的只

是那些不怎么重要的决策，如劳动力如何在社会各行业中进行配置，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产业，收入应该怎样进行分配等。在民主社会里，这两个集团在如何被控制的方面是有差异的，政府集团主要通过选票和政治鼓动，而市场集团则是通过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但是，它们并不存在着什么根本的不同，尤其是在面临任务重大的时候当一些重大的任务需要进行分派时，这两类集团都是必不可少的。

一、精英与百姓

按照受到一致肯定的惯例，我将比照其他类别的人称呼这两类精英集团的成员，其他类别的人主要是指大众或百姓。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喜欢忽略用词上的细微差别。特别当“精英”意味着贵族阶层或老谋深算的时候。精英并不必然是指阴谋集团和剥削集团，尽管它时常包含这样的含义，百姓也并不必然是愚昧无知的和不好管教的，即使他们经常如此。

怎样让百姓维持对精英的控制，这是一个古老的社会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的社会课题。用民主的标准来衡量，百姓实施的政治控制，主要是投票权，但总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对市场精英控制的失败，大体上与对政府精英控制的失败相同。这实际上表明，所谓控制也是被控制着的。如此说法告诉我们，市场精英总是会使用许多家喻户晓的方法，设法去回避或者尽力来削弱大众对他们控制。显然，进行广告宣传是其中的方法之一，包括产品的歪曲说明。引诱竞争对手上当是另一种办法。通过专利，政府让市场精英获得了垄断经营的权利，政府还运用进口配额、关税、许可证以及其他对竞争范围的限制，从而实现它的援助计划，所有这一系列的情况，皆限制了消费者的权利。

从政治角度看，百姓对精英的控制，是实现民主的一般条件，可以说没有群众的监督也就没有民主。当然，无论如何，民主时不时也需要例外。某些条件下的某些问题，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最好还是让政府精英来收拾同样，垄断也能发挥作用。建立在专利基础上的垄断价格，能够为研究和发明提供基金可是专利是否能提供更多的保护和收入，还是相当有争议的。

就平民百姓对市场精英实施控制的主要障碍来说，垄断这个词并不足以说明一切情况经常是这样，对人类福利最危险的却是平民或消费者在其他方面控制的失败。在市场体制中，买方仅控制着由市场精英提供的产品的最显著的特征。你和我一样，都会挑选那些造型和柔软度比较合意的床垫，但除了偶然的抵制之外，我们对市场精英在床垫许多特征的决策上（比如床垫的防火性能），却是无能为力的，或者说根本无法进行市场控制。消费者实施控制的一个更大的缺陷在于，买方对出厂地、生产条件、材料潜在的危险的化学成分等一无所知。在我们这个时代，像日立和得克萨斯石油这样的公司渐渐在全球范围内延伸，它们破坏性地改变了土壤、空气、水资源和人类的栖息地。相对而言，由市场体制实现消费者控制肯定行不通，尽管群众无法控制政府精英的作为，但社会后果还只能由政府来进行管制。

我注意到，许许多多的人根本不关心这些社会后果，轻率地把它们看成是垄断的孪生物。他们认为，市场体制的社会后果仅仅是局部的并且是微小的，他们宣称这是弱化的消费者控制补偿的优点，即允许企业更广泛的自治，以激励企业的远大抱负。他们可能会说，保持公司的独立性，允许公司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是市场体制取得高产出原因所在。问题究竟怎样，我们将在第十一章里进行讨论，但有一条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百姓对市场精英控制的缺点，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再次强调 不仅仅是市场体制 在所有的社会经济体制中 精英们大多都能避开百姓的控制，这个命题得到政治分析家们的认可，一百多年以前 米切尔就认为这是一个“铁的法则”。不论是市场精英 还是民主政府的精英 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过 他们太傲慢了 太有权势了 以至于不能成为服务者，根本不可能以服务者的身份调整自己的操行。他们可能会关注总体选择权的变化 比如选举时的民意、销售效果和业绩 但是他们决不可能对我们每个人的意见都有反应。即使对总体偏好，他们也会想方设法操纵或施加影响，而不是简单加以接受。他们之间可能会相互听取对方的意见 但对平民百姓就完全相反了 可能是听的少而说的多。对平民百姓来说，要想诱导精英们按照他们的意图行事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相反 识相一点可能更好 百姓们最好的计策还是耐心等待精英们的决策，只能如此啊。如果了解到决策但并不喜欢，有些时候可以通过拒绝重新选举或拒绝购买而否定这些决策。蹬自行车的人可能不会劝说英国的摩托车生产商安装自动启动器，但是他们有可能并且确实会转而购买日本生产的自行车 这样一来 英国的生产商便最终会走向毁灭。

能否总结性地刻画出市场精英权力和百姓对精英控制权力的特征呢 我的一些美国同行告诉我 他们生活在民主社会里 但另一些人却根本不这样认为。这两类人的说法都是正确的，原因在于前者所持的民主标准在美国的制度下能得到满足，可是后者的要求可能超出了这个范围。市场体制能不能提供百姓对市场精英控制的容忍度或者不接受的程度呢？这完全取决于判断的标准，没有一成不变的结论。

二、政府精英与市场精英的比较

除了对政府精英权力和市场精英权力作进一步的比较之外，我认为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作出总结性的评述。十分明显，这两类精英对百姓的控制都充满着敌意。他们时常自以为是，认为他们比平民百姓知道得更多。非但如此，这两类精英享有特殊的权力、机会、财富、崇高的地位和尊重。长期以来，百姓们一直呼吁要慢慢地削弱对精英们的迷信，但是精英们却在大大加阻止。难道他们没有这样做过吗？

精英们总是一概否定他们对百姓控制的敌意，事实上他们总是不肯承认的。16世纪西欧的封建主和主教认为，他们对农民的控制不是剥削，而是给他们带来了好处。尽管在对农民野蛮剥夺和他们拥有的财富与特权形成鲜明对照的事实面前，他们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18、19世纪英格兰上层社会反对宪章运动和其他拥护民主的运动，把不平等和贫困当作是英国社会的必要条件而加以维护。狄更斯在小说中描绘的巧取豪夺和苦难，丝毫没有动摇这些人的观念。当代的精英们尽管没有为这些早期的阶级进行辩护，但是，现在他们时常被指责不人道，因为他们仍然竭力维护着今天精英们的地位，包括反对工会、捍卫财富的不平等性、攻击福利国家。他们公开打着为大家谋利益而不是宣扬精英优越的旗号，竭力维护他们的社会地位。

然而，市场精英对大众的敌意，不是针对消费者的，而是直接指向雇员历史资料表明，为了反对雇员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禁止管理人员的独断专行的呼声，市场精英们进行过顽固的、残酷的和血腥的镇压。当雇员以工厂外面的民主实践为理由，也要在工厂内部实行民主时，市场精英们的所作所为是很容易受

到质疑的。

然而，在市场体制中，雇主对工资的控制是十分有限的。无论是通过工会就业还是不通过工会的就业，每当有新的获取利润的机会，尤其是这些机会是由资本积累和新技术带来的，从而使雇员对企业更有价值的时候，那么竞争将导致工资毫不留情的上涨，即使那些充满敌意的企业家也不得不屈服于竞争的压力。尽管缓慢、不规则，有时甚至还会出现反复，就像 20 世纪 90 年代一度出现的情况一样，但在市场体制下，工资始终是上涨的，同他们的祖辈相比，现在的工人已经比较有钱了。

对许多雇员来说，光有钱是不够的。为了获得对市场精英更多的控制，工人们进行了没完没了的斗争，这也是市场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雇主和雇员的冷战中，双方互不相让，甚至时不时地在暗地使用着暴力。

市场精英与消费者的关系不同于市场精英与雇员的关系，和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显著不同的。从历史上看，政府精英阻止民众对选举的控制总会获得成功，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至今没能建立起民主政府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即使在那些已经存在民主政府的地方，政治精英们也会有意无意地肆意加以扭曲，直至削弱。比如，买官，基民盟的头领科尔就是这样干的，任人惟亲，J·肯尼迪就曾帮助他的儿子赢得了美国的大选。对比起来，市场精英很难找到充足的理由，让顾客马上买他的产品而不买别人的产品。因为市场精英要想从市场体制中获取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取决于他能不能提供消费者想要购买的产品，显然逆市场而行注定是要自取灭亡的。

对上述温和的命题，存在着不少重要的例外。“我没有欠公众任何东西”，如果没有弄错的话，这可能是伟大的金融家摩根说的，它表明了市场精英对平民百姓长久以来的敌意。一旦企业能够建

立起对市场某种程度的垄断，它们便摩拳擦掌准备提价了。企业的收益增加了，老百姓的口袋却瘪了下去。以牺牲顾客为代价，企业，特别是那些大型官僚企业，常常为它的经理们打开各种各样的快速致富的途径。比如贪污、动用秘密的金融手段将企业基金转移到私人的钱袋里，美国储贷业的垮台，可以说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

从表面上看，广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证据，它表明市场精英渴望驾驭平民百姓，而不是简单地根据销售信号去适应老百姓的偏好。对此，有些人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企业不去生产人们想要的东西呢，相反却不惜花费巨额代价而去影响他们的偏好。促进销售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就是，为了提供人们想要的产品，投资和从开发到生产的漫长时间，可能是必要的条件。一旦企业决定去满足潜在顾客的要求，它们便会倾向于相信它们不可能改变顾客的内心想法，就像早期的摄影师的做法一样。那时候摄影师都将照相人的头用一个铁夹子固定一下，这倒并不是想要增加什么艺术效果，而是防止移动时会损害画面。比如，从道理上讲，勒雷克 (Norelco) 公司的经理们是有能力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需要的，然而，由于按照人们要求的式样生产剃刀和其他用具，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更新设备，所以他们总是引导消费者去购买他们已经生产好的东西。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在进行投资之前，市场精英们通常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进行市场调查，以了解消费者的购买倾向。

我曾经做过考察，在市场体制中，许多市场精英在进行决策时比如工厂的选址、工作条件、使用的化学材料、对废弃物的处理，大多总是回避购买者的控制。现在，我们可以将观察结果推而广之。你支付了货币，当然你能明确购买到你想要的东西，比如蜂窝式电话，但是你不可能有任何权力要检查一下该产品的生产过

程。对于企业关于产品应在什么地方生产、怎样生产，消费者的控制几乎是不存在的。

与此相比，政治上的选举活动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人们往往是为某一个进程或某一个意图而投票的，不是为了一件产品。立法机关或议会中的投票人和代表，对政府官员关于减少通货膨胀、治理犯罪的提议进行表决，不管结果是否存在着争议。现实中，有为实现希望的改变投票，为竞逐某一职位的候选人投票，为某个政党的承诺投票，但不会为某个产品的制造投票。

对结果控制和对过程控制的差别，将来或许会变得温和一些。因特网事业的发展，为联合抵制购买和购买者的集体活动提供了新的可能，从而使他们获得更多的过程利益。当购买者利用新型的传媒手段反对或赞成产品和服务的设计或质量的时候，当他们四方打听购买信息的时候，信息高速公路也会增强购买者对结果的控制。

对货币选票和选票作更进一步的比较时，我们不得不小心行事。它们只是一个初步的对比，好比对铁锹和犁耙的比较一样。这两种工具都可以翻地，也正因为这一点，所以能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但是它们的功能是不同的，一锹下去可能会挖得很深，犁耙只能翻起表面的土壤。类似地，政治选票和市场选票都是广大消费者对精英们进行控制的形式，然而，政治投票的作用在于解决冲突，更确切地说，就是决定谁将赢得选举谁将遭到失败，这种投票的结果，会对那些赢得较多选票的一方招致一定的损失。但是，当你花钱购买蜂窝式电话的时候，谁也没有失去什么。对在社会合作中每个人应得到什么样的份额，常常会争吵不休，但你来到市场投上你的货币选票购一台电话机时，你能享有的份额，已经完全由你的工资、你对利息和红利的期望决定了，你的货币选票仅仅表示，你对某种产品比如电话的样式的选择，实现着你已经决定要的

那一份。

政治投票和市场投票之间的差别是明摆着的。在市场体制中，消费者的选票给市场精英们以相当精确的引导，比如人们想要 23 英寸、21 速的山地自行车。政治投票人不可能有如此的确切性，即使他们能投票选举某一候选人或政党。政治选举很难有准确性可言，原因之一就是选举人必须要选出一位候选人或政党，以使他或它有机会去处理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只有一部分是选举人倾向认可的。赢得选举的政党或个人根本不知道是否赢得了某位选举人的票。

市场选举的另一精确性在于，只要你支付货币选票，立马就能得到回报你手中握有的货币选票，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你的欲望的强烈程度，在设法满足你的欲望之前，你已经考虑了代价。可是，在政治选举中，你不可能做到如此的理性。政治上的投票活动，或许是相当笨拙和拖拖拉拉的。你根本不知道，你的选票将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代价，一部分人将不得不支付税金，但是向谁、什么时候、支付多少是不可能知道的，也不可能在你的选票中精确无误地写明。

另外，在市场体制中，投票人不但给精英们发出信号或信息，而且还给他们施加了压力。任何一个企业，如果它的经理们不在乎消费者的反映，注定要走向灭亡。与此相反，政治选票是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的，它决不可能对政治精英们构成威胁。赢得选举的候选人或政党，在了解民众的反映上似乎有某种困难，更不会花力气去探讨什么样的投票模式能解决一切问题。因此，这便在本质上否定了政治选票的任何强制力。即使精英们清楚地知道选民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要求，但勉强作出的回应也是虚假的，甚至常常是不了了之。我的选举人不是清晰地告诉我要削减税收吗？是的，但是在下一次选举之前，他们或许把这个问题忘得一干二净

了。即使我在削减税收的问题上让选民们感到失望，但只要我在其他问题上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或许还会投我一票。当然，我也可以很轻松地摆出赞成削减税收的姿态，但却以要解决其他更为紧迫的问题故意搪塞过去。

按民主主义理论，值得骄傲的一点是，每一个成年人都有权利参加政治选举，决不像市场投票那样总体上充满着不平等。可是，这点骄傲寄托错了，尽管要求是正确的，但总会被误解。为了对选举施加影响，很明显你的投入可能会倍增你那张选票的力量，这大概如同每场竞选运动的有功者至少能实现自己一半的目标一样。市场不平等是有目共睹的并在不断加剧着，它最终会转化成群众对政府控制的不平等

经济学家熊彼特（也包括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人）曾雄辩地指出，五十多年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政治投票，要求投票的人越多越好。由于这个需要，他写道，许多想法和信息远不是投票人所能掌握的，政治上的投票不可能有效地达到对政府政策的控制。政治上的选举人常常会碰到一些相当复杂的问题，比如种族冲突，对于这样的问题，可能永远也没有答案。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即使是对寿命保险单这样一个复杂的选择，也比确定减缓种族冲突的政策来得容易。

上述对比是很重要的，就像熊彼特所看到的那样，它也指出了另一个事实。假如公众不在已有的政策中进行选择，而是能自主地提出一些政策，那么从某些方面来看，公众对政府精英的控制是能够改善的。应该让精英们决定政策，让公众来罢免那些不称职的政府精英。实际上，选举人总是会放弃具体的控制方法，因为他们缺少控制能力，转而追求某种松散的控制，这似乎适合他们的能力。

对购买者来说，采用这样的策略选择是不可能的。在市场体

制中，通过购买行为投出市场选票，在这两者之间没有可能的回旋余地。人们总是经常地、无止境地投出货币选票，如果你不投票，你就得不到任何东西

毫无疑问，在市场体制中，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是颇具影响力的参与者，这数以千计的企业家或企业，他们中每一位如果同普通的参与者相比，便显得相形见绌了作为不相称的强大的和直接的重要的决策参与者，企业家们和他们的孪生兄弟政府精英有着相似的一面好像是花钱进行投票，大众对企业家的控制、给市场精英们的权力，施加了强有力的有时候甚至是压倒性的约束。但是，这些约束如果用于其他方面，整体上是不合适的。在某些方面，大众对市场精英的控制强于对政府精英的控制，尽管后者本身远远谈不上完美。

三、市场之海中的岛

撇开精英权力和大众权力不说，市场体系中的集体企业尤其是大公司的位置，并不总是讨人喜欢的。正是这一点，使得我们更有兴趣作进一步的考察通常，人们的理解是，企业尤其是公司式的企业，是市场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习以为常地加以默许了然而，当人们对这一解释毫无诘难时，我却要指出，它从内部来讲是非市场的，甚至是反市场的机构，尽管它深深嵌入到了市场体制之中它通过管理命令对一些活动进行协调，而不是通过市场交换。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公司协调是市场体制协调的工具 而不是它的对手。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个制衣企业，它需要各种花色的布匹。现在有两种办法，一是设法从各供应商那里买到已漂染过的布。二是只买回布匹，然后寻找漂染商让其按要求进行着色 当然，如果企

业能够自己动手自行印染，它有可能挑选一个便宜的、快速的、更容易控制的加工过程。假如该企业决定自己动手印染，那么它便取代了印染过程中市场体系协调的职责，从而在它自身的权力管辖范围之内开辟了一个小型的协调舞台，创造了一个权力岛。或者是市场体系大海中的中央计划形式。

显然，每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都在它的命令范围之内协调着它的一些投入和参与者，最起码它管理着自己的雇员。比如，基于市场交换，印度斯坦摩托公司在全印度乃至全球范围内对它的装配线上的劳动力、设备和各种各样的投入实施着协调。但是，在一个企业内部，协调的任务不可能完成，直到所有的投入被进一步协调生产出既定目的的产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深入的协调通过市场交换，可以在企业内部实现。印度斯坦摩托公司按件付给工人们工资，负责给工人们提供设备和其他加工条件，至于在什么地方和怎样生产则是工人们自己的事。但也有为数不多的例外，只要雇员接受管理的代理权，企业也会支付工资。作为雇员，他应该认识到，市场协调的步伐在企业的大门口停止了，在企业大门之内，代之而起的是管理命令。市场交易可以将雇员带到企业，此后，命令便接管了一切。

在任何社会协调中，首先需要大规模的协调，以使企业能够招集到工人和投入要素，然后企业内部实现小规模协调。在市场体制里，市场交换基本上实现了第一重需要，随后，中央计划大体上取代了市场机制而实现着第二重要求。

最近几年，企业内部的高度集权似乎走向衰落，而相互调整的创新形式不断涌现。比如：由工作小组的决策取代了工头，水平式的交流取代了旧的垂直交互模式。这些变革反映了管理走向非集权化，但在企业内部并不意味着由管理协调到市场体系协调的变迁。

许多公司蠢蠢欲动，试图进行这样的变迁。这就是说，不论是非集权化还是其他的形式，都在收缩它们发号施令的舞台，更多地企业内部实行市场体制。像大多数公司一样，汉莎航空公司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它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更好地协调它的各个分公司。由于不满足通过命令在公司内部实行协调，1995年，汉莎航空公司调整了好几个分公司，包括货物、维修和数据处理，让它们独立出来成立分公司，通过母公司和其他子部门的销售和购买进行公司间的协调。然而，在某些领域，由行政命令进行协调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等待做手术的病人身边的医疗小组，它的每个成员之间的协调，不可能由市场交换来实现。为了保证手术的顺利完成，需要有一个外科医生领头，大家都要讲究奉献，而不能让市场规律来调节人们的行为。即使像给货车装货、开动一个生产线这样普通的活计，也需要管理协调，市场交换根本不合适完成这样的任务。

当某个企业没法求助于市场体制，试图减少内部行政命令的协调任务时，它可能会将这些任务转移到其他企业。如果企业总是面临高成本和劳动力管理中的各种困难，那么它便会与许多小企业签订合同，让这些小企业来完成一部分工序。意大利的贝纳通成衣公司可以说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该公司把它的拷边、熨烫等活儿发包给小企业，这种做法，大大缩减了贝纳通公司内部的行政命令体系，但决不会减少制衣公司和辅助企业行政命令的重要性。仍拿贝纳通公司的例子来说，该公司只是把它管理劳动力的任务转给了它的合同商，现在管理劳动力的任务转由合同企业来承担，与奔力顿公司无关。

运用这些办法，市场体制中的集合式企业便在市场调节的汪洋大海中创造了命令协调的岛屿。每一个集合式企业的结构，都是企业对岛的规模和形状决策的结果。假如大众汽车公司从其他

企业买进汽车挡风玻璃和轮胎，那么它将变成一个很小的企业。集合式企业或公司之所以能存在，说明企业家对一些范围内的活动，更倾向于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体制。因此，工厂及其他集合式企业，是市场不适应和似是而非矛盾的制造者公司管理的协调越多，市场体制就越没有市场在市场体制下、公司的确是可以替代的

为什么企业家要在市场之海中创造公司之岛，以上_的解释还不完全。企业家也追寻着政府给予公司投资者的特殊利益。根据法律规定，投资者不承担因公司经营而引起的债务赔偿，即使公司垮掉了，他们持有的股票一文不值，但责任是有限的，政府已经承诺了这样和那样的优惠，如联络管理委员会以一定的方式改善公司的经营前景。政府为什么会提供帮助，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满足政府官员掠夺成性的欲望、中饱私囊、促进想要的投资以实现政治上的阴谋等。不管怎样，是他们造就了对投资者和企业家有吸引力的巨型企业。公司历史研究者们，在解释大公司数量不断增加的有关重要原因时，出现了极大的分化，彼此之间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一部分人持效率优势的观点，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不断增加的垄断和公司受到的政治影响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想的，有一条可以肯定，企业确实在成长，但从内部来看，它们需要市场体制之外的管理。有的人可能认为，公司的世界化其实就是计划体制，但我要辩解的是，公司之间的协调，只能通过市场体制而不是计划。

四、所有制的形式问题

一百多年来，是用私有制的办法还是用公有制的办法管理企业，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者相信公有制，因此，

我们使用这个信仰来解释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也希望政府所有的企业能摆脱市场体制，在政治等级控制下来运行当然，民主社会主义者也持类似的想法，明确认为要用民主的方式进行控制。大部分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观点是，市场控制根本不是控制，让自私自利主宰一切必然会导致混乱和无秩序。后来，他们逐渐认识到，市场是一种控制手段，在一些方面还具有很大的作用，他们也认识到私人企业让政府接管并不总是能够获得效率的于是，他们对政府所有制和经营的热情便下降了。即使政府企业有可能会比私人企业做得更好，社会主义者仍开始相信它不可能有优越性一个更好的制度应该往另一个方向寻找，即建立福利政府，减少财富和收入上的过度不平等，提供公平的受教育社会地位变迁的机会。结果，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收归国有的行业中，重新实行了私有化他们不再诉诸口头上的大讨论，而是转向实施一揽子方案，比如对所有的大公司实行国家化（或私有化）去讨论单个产业或企业的具体建议

与此同时，在关于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嘈杂的争论中，市场社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发展了所有制和企业的一系列形式。其一就是由企业自己的雇员拥有和经营企业。这类企业常常不属于工业领域，多半是一些服务业，如律师、会计、医疗服务、货车运输、出租车服务等。在瑞典，工人合作社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出租车业务，在以色列，一半以上的货车运输就采用了这样的经营形式。所有制的另一种形式，是对其成员生产的产品进行买卖和市场销售的农业合作社，这样的合作社有时也会从事一些加工业务，比如牛奶合作社就生产奶酪。在西欧的一些国家，合作社占到农产品销售 50% 左右的份额。由消费者控制零售企业是十分平常的，但数量和规模一般都是微不足道的，在英国只占零售业不足 5% 的比重，德国还要低，美国甚至不到 1%，在企业相互之间有业务往来时，这些

企业经常也会采用联合共管的形式。在美国的五金制品市场上，估计这类所有制形式占有 8%。农业企业普遍建立了这样的联合共管形式，以便得到种子、化肥和设备。

从世界范围来看，非赢利性企业并不很多，这些企业既不为投资者也不为消费者和雇员所有，从法律的角度看，它被一个授权的管理委员会管理着。在美国，它占到了像人类关怀——如医疗保障和高等教育等一半的比例，有时甚至超过 50%。

私有制及其带来的不平等分配，一直是经常讨论的痛苦的话题。除了少数不同意见者，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私有产权如同你对你的衣服的权利一样是没有多少争议的，可是，一旦说到企业那情况确实有所变化，并会引起争议。问题不在于私人产权，而在于生产资料的控制，即土地、建筑物、机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收益处理的控制权。公司组织的一般形式，常常是将资产所有权和财产的实际控制权分离出来。拥有股票证书形式上的所有制，使得绝大部分股票持有者处于被动和无权力的境地。传统的公司其财产的控制权，掌握在由事实上永久存在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或由董事会挑选出来的少数几个执行董事手中。这些有控制权的人一般拥有公司的股份，股份的多少常常取决于他们的经营业绩。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所有权是因此而起的，而不是先于企业控制的假设，更不是以它为前提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形式上的所有权和实际控制权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了。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什么人事实上行使着公司的控制权，是它的董事会还是它的股东？答案可能有很多，但似乎都有各自的理由。在德国，行使公司控制权的既不是董事会也不是股东，而是给公司提供信用支持的大银行，它们对公司的管理活动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如果公司不答应，它们便不能获得贷款。在美国，大型投资基金的管理人，要求拥有对其所投资的公司

一部分的控制权力

我对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的各种联系和非联系的陈述，并不是表示对它们的悲伤，也不是对绝大部分股东或所有者的无权无势表示遗憾，相反，我要表达这样的看法，即：谁在形式上拥有公司，公司经理们是怎样运转企业的，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社会能设计出一揽子控制方案，并且每一类企业都互不相同，那么这样的社会既不能被认为是单纯的，也不能再认为它还是“私人企业制度”。

然而，在两种类型的公司之间或许会存在着基本的、耐人寻味的区别。某些公司出现困难时，很容易得到政府基金的援助，但另外一些公司却不会如此幸运。许多国有企业，或者更确切地说，大部分国有企业可能属于前者，一些传统的公司也是如此。这些企业恶名远扬，动不动就要求公共基金救助它们，拒不承担属于它们自身经营失误的后果。中国就深受这些病态企业之困，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避免造成失业，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在其他类别的企业中，根本不必去寻找从未得到过救助的产业，因为根本不存在。但是，要说许多企业都能得到也不常见，甚至极少，救助也是不确定的。一些国有公司和许多传统公司便属于这一类。前面第一个类别企业的重要意义在这儿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第一个类别中私人企业的存在和生存削弱了市场导向型企业与中央计划型企业之间一般区别的基础。

1. 关于公司的规模和结构，参见：① B·哈里逊的著作《倾向于中庸 柔性时代公司权力变化的前景》；② S·R·鲍曼的著作《现代公司与美国的政治思

潮 法律、权利及意识形态》。

2. 《谁来告知黎民 美国民主的背叛》这本书是 W·格雷德撰写的 他在书中讲述了信贷崩溃的令人瞩目的真相。有兴趣地读者，可参阅其中的第二章。

3. 关于对市场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公共控制问题，参见熊彼特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在这本书中 熊彼特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其中第二十一章特别值得一读。

4. 关于政府对企业调节的种类及范围 可参见 J·弗兰西斯的著作《关于调节政治的比较研究》。

5. 关于协调行动和内部垂直控制的方法 参见 T·佩特兹格的著作《时代的先锋：改变着工厂与市场的男人和女人们》。

6. 公司成长究竟是因为它们具有效率，还是由于垄断和政府资助的优势 对此 不妨参阅 A·D·钱德勒的著作《看得见的手 美国的管理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在这本书当中，钱德勒对效率进行了阐述。与钱德勒的观点不同 W·C·罗伊给出了相反的解释 其著作作为《社会化的资本 美国大型产业公司的崛起》。

7. 关于企业所有制比较常见的形式，参见 H·汉思曼的著作《企业的所有制问题》。

8. 关于私有化 可参考 J·维克斯和 V·赖特的著作《西欧的私有化政治学》。

9. 对于公司是个麻烦的问题 参阅 D·C·科顿的著作《当公司统治世界之时》。

第六章 最大范围

市场体制的最大领域或范围是什么呢？一旦发展到了最大范围，那么社会的哪些任务和进程可以通过市场来进行协调呢？在现阶段，形形色色的建议要求应通过市场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可是在早期，这些活动中的一部分被认为是超出市场范围的，监狱管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究竟是扩展还是限制市场体制，这取决于对市场体制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认识。比如，市场体制能否组织起集体活动，还是只能组织起个人的努力呢？

很明显，只要允许进行市场交易，那么就有可能像处理小母牛那样来协调弃婴和孤儿的安置。然而，在大多数社会里，人们不会选择这样的做法，不让市场体制发挥自身的一切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在最大的市场范围和有选择的范围之间作出识别。本章，首先来探讨一下市场的最大范围，至于有选择的范围，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生活在市场体制中的人形成了一个现实的、粗糙的对市场体制最大范围的估计，然而相互抵触的想像给他们的估计带来了麻烦。一方面，他们常常把市场体制当成渗透到生活中一切方面的东西，就像最近一本书的题目一样：“一切都是为了买卖”包括选票、法定利益、爱情、忠诚、健康等。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市场体制看成是社会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他的组成要素是：政治、宗教、家庭等。这些观点不会被混淆，确实颇有见地。市场体制的

确渗透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比如：集会要雇用牧师和建造场地，艺术家要买乐器然后才能进行演出。尽管这是现实，但是我们能够对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区分。个人、家庭、教会和政府都在市场体制下参与买卖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是市场体制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把市场体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区别开来并没有太大的困难

一、被错误理解的领域

范围的边界是难以捉摸的。即使我们能在市场体制和教会、市场体制和政府之间作出区分，但我们仍然发现存在着困难，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可能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活动应该包括在市场体制的范围内，什么样的活动不应该包括在市场体制范围内。有个一般的命题，就是市场体制能够协调经济活动，但决不是社会的全部。这是一个错误，分析市场体制范围的最好方法，应该去考察一下讨论这一问题的原因。

人们通过市场行为究竟要得到什么东西呢？食物和住所理所当然地包括在其中，但像娱乐、新奇的饰品、权力、声誉、爱情、隐私、交际和友情等，似乎也应在其列。确实，从表面上看，所有的人的追求都是在市场活动的内交外织中进行的。不存在与经济无关的目的，人们在市场中寻找目的的特征，与市场体系的范围毫无关联。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得到了一个的暗示，即：市场体系的范围比人们通常说的要广阔得多。

为了了解市场体系的范围，需要抛弃我们思想中对人的活动业已存在的观点，不要动不动言必称经济，但也不要对市场体系加以限制。市场体系适用的范围远远超过我们观念中的看法，原因何在呢？我们在第二章中已作了交待，在此，我想再一次提示一

下：我们考虑的是社会，而不是经济。

有人认为，要了解一般的差别，需要把经济与政体进行比较，要把经济、政体与社会作对比。我发现在这三者之间作比较，可能更为有碍而不是更有用，因为政体即政治制度是市场体制的主要参与者，它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价格的制定者。无论“经济”指的是什么，政体和经济制度总是融合在一起的。至于经济体制和社会的区别，后者是由许多进程组成的，通过这些进程，使得社会这个由人组成的综合体被协调起来，从而使人们相互牵制以治理相互之间的伤害和进行合作。不论是从一国的范围，还是从全球的范围来看，这正是市场体制所能实现的，包括社会和平的协调和合作。因此，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根本不需要在这三者之间作出区分。另外，就像在前面曾提到过的，市场体制的范围肯定比人们通常所说的来得广泛。

我们必须摒弃关于范围的深层次的误解。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即市场体制的范围，存在于对社会物质或物质主义追逐的组织或协调之中。据此，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对实物的追求是有价值的。然而，市场领域比这要广阔得多。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商品同服务相比只占到不到一半的市场份额。

即使在人们购买物质商品的时候，他们似乎也在寻求着非物质化的结果和目标。种种理由表明，购买一件衣服，主要是为了和社会的环境相适应。同样也有理由说明，购买食品是为了尝尝味道。不论怎样看，结果和目的的意义总是意味着一种无形的东西。

然而，可能有人认为，要实现与社会一致或美味之类的非物质目标，必须首先获得物质的东西，比如衬衫或龙虾。是的，不论有市场还是没有市场，我们做任何事情，达到任何目的，都需要物质条件，如工具、原材料等。然而，市场生活是与此有别的。即使是一个祈祷集会，也总是需要座椅和圣歌的，当然有可能还需要蜡

烛。游戏就需要玩具嘛。

我们不能漫不经心地就说，制造物品或东西是市场的全部活动尽管制造产品是市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创作、戏剧表演、对公司进行重组和改造，同样也应该成为市场活动。把哥伦比亚的咖啡运到意大利米兰的咖啡馆，没有一系列的市场活动根本实现不了，这一长长的合作链条，远远超过了咖啡生产和制造活动。

对许多人来说，“物质”和“唯物主义”与结果或目的无关，但不能同实体产品相脱离。根据这样的理解，购买一张音乐会的门票，肯定追求的是这张票而不是音乐享受。如果这种认识真的是正确的话，那么，印度人花钱请来宗教法师做涅槃，将变成一种物质的追求了。尽管“物质”一词的表面含义发生了古怪的背离，但这样的解释对我们决没有什么帮助，它仅仅表明市场活动，无论它是什么样子的，都可以用物质来进行定义。这个解释，对什么活动能够或不能够用市场体制来组织，没给我们留下线索。

我们也应该抛弃其他的误解。市场体制是否协调着财富的追求？问这样的问题未免显得太狭隘了，因为市场体制也协调着对行为的追求那么，我们这样来提出问题，市场体制至少也包括着对财富追求的协调是否更好些呢？我的回答是，如此思考常常会出问题。根据定义，财富是指那些能引起占有欲和在市场上出售的东西。无论多么有价值的东西，如果它不能在市场上出售，都不能称作财富。壁炉能给房间供暖，这一点几乎与太阳的功能无太大区别，但壁炉能够被占有，而太阳却不能。壁炉是财富，太阳就不是了。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和物品能被占有和能被出售，虽然无法知道，但是只要能带进市场的东西，无论它是什么，我们都可以称之为财富。如此说法，似乎故意在兜圈子。最好不要说，市场体系协调着对财富的追求（当然也包括表演），而应该说，

如果它能协调对某一对象的追求，我们就可能称那个对象为财富。

我们可能会试图去考虑市场是怎样组织工作的，这些工作不仅包括游戏、祈祷、科学探索、阅读、散步、唱歌、空想或发明。市场体系本来就是一个工作的世界。就某些用意而言，这样的解释是说得过去的，然而对大部分目的来说，显得太松散了。摩西的工作就是带领他的人民到希望之乡去，达·芬奇的工作就是画蒙娜丽莎，爱因斯坦的工作就是创立相对论。然而，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或许会认为，把他们的工作也归结在市场活动的范围内似乎有点委屈他们了，也可能根本就是错误的这些人应该称为政治家、艺术家和科学家才对那么，我在自家的花园中干活呢？抚养自己的孩子呢 教皇的工作呢 是的 是的 是的 但是 这些工作没有哪一样能被当成是市场活动。

另外一个带有循环性质解释的是，市场活动是由与商品和服务有关的活动组成的。确实如此，不过，如此陈述显得比较空洞，同时又显得重复累赘什么是商品？就是能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东西或物品，与不用于买卖的其他物品不同。一个祖上传下来的茶壶不是商品，但是如果把它拿到市场上出售，它便成为商品了。我的肾脏器官不是商品，可是我要把它作价卖给一位病人，那它就是商品。什么是服务呢？凡是能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行为就是服务。同样的行为活动，如果不是为了买卖就不是服务商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常常把商品和服务并列在一起使用。你对朋友的一句有益的忠告不是商品，但如果要求付费那就是商品了。即使如此 我们仍然需要知道 什么样的物品、什么样的行为 可能和不能由市场进行协调所有这样那样的解释都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样的物品和行为，只要它进入市场体系，都将被认为是商品和服务

二、最大范围

对于范围问题，我在前面的三章中已经给出了我认为是满意的回答，现在仅需要把它解释清楚。我们再一次撇开经济概念，暂且把它看作是不必要的东西，否则它会限制我们对范围的讨论。我们从这个认识开始，凡是能够进行买卖的物品和行为，都可以让市场体制来协调。在这个范畴之下，不需要再作任何其他的划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阐明，为什么某些物品和行为有可能被买卖，而其他物品和行为却不行。

显然，合适的物品和行为构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范畴，它包括观念、发明、艺术、承诺、协商和各种能量，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以及你能想像得出来的每一个物品的生产企业。比如：铸造物品、手工制品、一块土地、工具、建筑物、矿石、机器设备。另外，它还包括生活追求、帮助人自杀等。

尽管出售旧家具和旧汽车都属于商品与服务之列，但是买卖的特征及其最具意义的却是企业购买原材料、出售为销售之目的的产品。不过，无论如何，企业的交易活动不是市场体系领域的全部。

再次强调一下，市场领域不能用参与者目标的特征来定义。当然，它也不能用交易的伦理价值来解释。市场体系不仅为十分传统的企业及交易留下了空间，同时也为像俄罗斯新犯罪集团那样的组织提供了场所，需知，这些俄罗斯新犯罪集团简直就是 19 世纪的强盗团伙。

任何抱负和目的，从财富到虔诚的行为，只要需要用到买卖，都可以从市场体系中追寻得到。

究竟什么样的物品和行为能被买卖呢？凡是符合下列条件

的，都可以作为商品和服务，都可以进行买卖。这些条件分别是：

1. 服从于人的意志，能自由加以控制。
2. 具有稀缺性。
3. 非强制性获得的，并且能为自愿交换的双方带来好处。

下面，我们来逐一加以考察：

1. 自由控制。人总不能拿太阳去出售，因为它作为天体根本无法控制。但是城市中的阳光在某些社会是可以出售的。为了能提供一种行为或一件物品，很明显需要人类能够从物质上提供或否定它。这样的控制应该像一个阀门，它必须足够精确，以便行为或物品能在自由意志下，在确定的价格上出售给对方。举一个相反的例子，这样的例子简直罕见，就是用于出售的真诚而浓厚的感情。尽管人类能够生成感情，但是他们不能对它进行足够的控制，不得不依赖于它，以引致一个出售的价格。因此，市场体制不经营虚无的感情，它由双方自由意志的反映提供。人们可以花费一大笔钱获得感情的认证，但决不是感情的本身，同样，对于名声的证明或标识 比如名誉学位、名誉奖章等 大多也是如此。

2. 稀缺性。如果拿去出售的行为和物品不属稀缺，而想获得相互的利益 是没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 不稀缺的行为和物品 根本不值得去出售，它也不会具有市场价值。应该记住“稀缺”不是指数量很少的意思，而是指同欲望相比，不能保证足够的分配，除非对欲望施加某种程度的约束。如果不稀缺的行为和物品，你硬要把它拿去出售，肯定不会有人问津。航空运输和眼镜商的技术具有稀缺性，某些权力、名声、正直的声誉也是如此。如果可不受限制地得到一切，也就是说，人人都能拥有他想要的东西，那么谁都拿不出什么来销售，也不要指望有人会购买。

稀缺性不是上帝带来的。在狩猎和群居的时代，土地并不稀缺。可是，随着社会成员的不断增加以及入侵者的到来，如欧洲人

侵入印第安人的地盘，由于对土地强行施加了排他权力，从而导致土地变得稀缺了。

什么样的物品和行为不稀缺呢？可以说数也数不清，例如：绝大部分过去写的诗歌，无以数计的发明，撒哈拉沙漠中的沙子（沙箱中的沙子除外）降水 废弃的计算机 招摇撞骗无甚能力的大学教授。这些东西只有有朝一日也具有稀缺性时，它们才会进入市场体系整合的范围。这里要提醒，有些虽然普遍受到惋惜的行为，比如替人放火，也不排除在市场体系之外。你我可能不需要纵火犯，但不排除有这种需要的人。因为纵火犯不多，大多数人不愿意干，所以那些想雇用他们干坏事的人不得不花钱买他们的行为了。

3. 自由意志主义。由于市场协调需要通过自愿提供好处进行下去，所以如果协调需要系统的强制，那么市场就不能用于这样的协调。这是市场活动范围划分的一个重要的约束因素。协调常常需要对人进行强迫，因为单纯给予好处不是总能充分地调动人的主动性。国家为了吸引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参军，不带有一点强制性可能行不通，但如果许诺高工资和补贴，哪有那么多的经费呢。修建一条高速公路，开设一条商业步行街，所在区域的土地拥有者必须要让出他们的土地。为了给众多的公共工程募集资金，比如建造一座监狱、创建一个新的教育体制，需要进行强制性的征税。当然，实施收入和财富再分配方案，也需要改变税收办法，或通过其他强制性措施。你为此而付出了一些收入和财富，但你不能据此而要求给予补偿。

市场体系不会彻底排斥强迫，其中一些是垄断形式的强制，就像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那样。然而，让市场体系引起反应的与众不同的方法是，它首先许诺好处，然后换取人们的回报。

强制的大量存在，限制了市场活动的范围，但它始终是透明的。市场活动以习惯和法律为基础，这一点我们很清楚，可是市场

活动本身却不会提供它们。市场活动至少需要对资产的所有权和自由权进行强制性保护，没有这些，谁也拿不出东西去交换。与此类似，从习惯和法律派生出来的其他规则，比如合同法、公平交易法，只有加上一点强制性要求，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进行国际贸易同样需要以国与国之间达成协议为基础的特殊法律来支持，这些协定包括从 1944 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一直到不断出现的有关资本流动的国际规则。另外，政府本身不可能由市场关系创造出来，我们不可能借助花钱的办法成立一个政府。所有这一切表明“同意被管制”从来不具有普遍性，必须来点强制。

三、关于集体追求

有了关闭的控制按钮、稀缺性和自由意志主义，我们还需要对市场体系范围增加第四个解释性因素。这第四个因素是，市场体系是否仅仅组织了个人的冒险事业？持批评意见的人认为，市场体系只允许个体参与者寻找最终结果，不是集体计划。我们每个人都会从自利自私的角度，为自己的孩子寻求更宽敞的住所和最新的衣饰，可是一旦上升到减少社会犯罪、加强环境保护等社会共同问题时，我们就变得漠不关心。因为人们总是认为，市场无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惟独政府才能利用权力强制推行合作。

关于集体计划的不少观点是正确的，假设正在进行一项水利灌溉工程建设，那么干涉这项及时合适的一致意见的工程，一定是那些反对该工程和不愿意为此支付费用的人。由于这个项目需要政府的强制，不同意见者将被迫纳税。

不是所有的集体活动都需要进行强制，因此，市场决不仅限于个体目标的实现。在一个社会里，有许多共同的目标得到追求，如经济增长、提高识字率，它们都可以通过市场体制而得以完成。但

是，它们的实现是参与者追求个人目标的副产品，这一点是单个参与者自身意识不到的。近年来，提升职业能力，一直被宣称是一国寻求国际竞争力的当务之急。然而，无论是金属片制造工人还是计算机程序语言编写员，他们能力的提高，主要不是通过市场体系，尤其是边干边学的培训，而是得自于政府计划的推动。西方国家一些重大成就的取得就是如此，特别是较高的生活水平。甚至连自由这样一个重大的集体目标，也不是市场交换自然而然的結果，不是蓄意的图谋。

社会范围的许多集体计划并不是都可以用市场体系来协调，当然这样的计划只能在志同道合的集团中进行。哥伦比亚的咖啡种植者为了建立学校，他们创设了国家咖啡基金会。屋主组织有时候会购买土地、篱笆以控制外人进入，会雇请私人警察把守在大门口。通过这样的买卖活动，他们便把一些本由政府当局协调的任务，转移到他们自己的集体市场行为中。

然而，臭名昭著的抢帽子交易者便来了。有一部分人希望从市场提供的货物和服务中获得好处，而不想碰到任何障碍。产生障碍的根源在于，有些类别的行为或目的不限于供那些支付费用的人享受，没有支付费用的人也能坐享其成。即使一个城市中某一城区的几乎所有居民都同意为一个绿化方案出钱，但该方案的实施很有可能化为泡影，因为总有一些人知道即使他们不出钱也能享受到绿化的好处，所以他们会拒绝承担一份费用。因此，费用分担必须带有一点强制性，就像税收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市场体制便发挥不了作用了。

总而言之，市场体系能不能实现一个集体计划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它是否具有了集体的性质，而在于它到底需不需要强制。

我们面对能够进入市场体系的物品和行为的三个条件，即：它必须是具有开关性质的控制，必须是稀缺的，必须自愿对利益提供

作出反应。在这些限制中，市场体制的范围仍然十分巨大。再一次强调，如果以经济为假定条件，用它来解释市场体制的范围，那么我们将无法进入对市场体制范围的考察。

漂浮在天空中的云朵不会进入市场体制，但是如果利用它来形成降雨，假如越来越多的农民盼望雨水但又不能进行人工调节，假如飞行机械师愿意根据给定的好处去生成云朵，那么生成云朵的活动就是市场体制的一部分。堆积如山的废弃的矿石不能带进市场体制，如果把它带入市场体制，除非发现了它的一种新的用途，并且还要保证这种用途具有稀缺性。即使如此，它也不可能会变成出售的商品，除非人们发现有人不受指令而愿意支付货币来提炼和运送这批矿石。在一分钟内，在一个小时内，在更多的时间里，把你能想到的物品都列出来，然后进行逐一的检查，看看有多少可以拿到市场上进行买卖，你将会看到，市场的范围是极其广阔的，市场体制渗透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活动之中

最后，我们用假设的例子来表达一个术语问题，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市场体系的范围。设想一个政府，它不是通过强制性命令，要求居民为政府建造一条新的高速公路提供货物和服务，而是通过购买、雇佣甚至租用自愿的居民去生产并提供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肯定会说，市场体制能协调冒险事业吗？研究纯粹市场体制理论模型的一些经济学家可能会说，市场体制按其定义只会对个人关于货物和服务的选择作出反应。他们会说，政府购买（或租赁、或雇佣）超出了市场体系，应该被看成是政府和市场体系的混合形式

术语问题不太重要，可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两条路线的区别却是非常重要的。在现实世界中，政府经常是一个购买者，并不是动不动就发号施令，政府活动的很大部分就是市场行为。假如仅仅是个体的买卖活动，那么由买和卖完成的社会协调的巨大功绩就

不可能被实现。从这个视角来看，政府非但不是市场体系的竞争者，相反却是市场范围的巨大拓展者。

参见 R·库特勒《一切为了销售 市场的功效及其局限》。

第七章 选择的范围

不管是明智的还是愚笨的，社会一般都不会全力利用市场体系，它们会选择其他的协调方式，或者把市场体制与其他协调方式结合起来。在大多数社会里，对教师可以通过市场体制的规则进行招聘，但是公共教育不是按市场的要求组织的。许多社会经常不通过市场体制，竭力维持童工制度。为什么一个社会要控制对市场体制的利用呢？对此，我们不难找到好的解释，另外，牵强附会的解释就更多了

理由之一，就是意识形态或世界观上的敌意。然而，在意识形态的背后便是对市场体制一整套公开的反抗，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反抗大多数都是有效的。可是，我不愿评价它们，我只想摆列出对市场体制各种各样的反抗，它们会缩小市场体制应有的范围。

许多人时常认为，市场过程本身不是人们希望得到的，它甚至是不道德的。在许多人眼里，供血者应该献血，而不能把血液当作商品来进行买卖。许多人害怕同朋友或家庭成员进行金融交易。有一部分人担心，买卖活动会削弱社会的凝聚力。至少对一小撮行为古怪的人，不能让他们购买保险，不能对他们实施保护，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使他们对上帝的教义和关怀缺少诚信。即使许多人都喜欢买东西，但是总有一部分人十分讨厌它，以至于从来不买市场上销售的货物和服务。一些人，或许我们身边的绝大部分人，都会喜欢免费提供的行为和物品，但是如果推荐给他们购买，

他们便没有多少兴致了。我们喜欢“自由”地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有研究报告表明，本来是自觉自愿的活动，但如果给予报酬，人们反而感觉不到乐趣。历史上一个著名的限制买卖过程的例子就是 1562 年特伦特议会颁布的不允许延期付款的禁令。当今，社会仍然在为卖淫和毒品的合法化而斗争。现在许多人已从罪恶的奴隶贸易中发现了市场观念。出于类似的理由，一些社会很早以前就决定禁止在矿山和工厂中雇佣童工。

许多人怀疑个体选择的能力和动机，希望建立一个能审时度势的集体权威以从事决策，例如，死人的器官能否被买卖，还是由集体当局按需进行分配。对这样的问题，一直就争论不休。对于环境保护，许多社会倾向于让政府来决策，而不是个人或公司的市场决策，它们希望政府而不是公司来控制工业废物的释放。无须讲什么理由，人们就是怀疑卖方在他们产品上的诚信度，赞成政府对食物和药品的规定。

对许多人而言，市场带来的不平等是不能接受的。许多社会能给孩子们提供初等教育，至于他们的父母是否有能力支付教育费用则是另一回事，因此，需要征税和推行义务教育，这些都不能依赖市场去解决。医疗服务，特别是减少流行病，应该由政府来负责，如果用市场手段来解决，其普及性就不高了。对于战时稀缺物品的处理，许多社会实行的是基本商品配额制度，而不是把低收入家庭逼上绝境。

对许多人来说，市场显得太杂乱，他们希望对雇主解雇工人的权力进行限制，他们只希望政府在企业快要倒闭的时候给予援助。企业内的补偿性质的岗位，如果没有补贴的资助，是维持不下去的。这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在意大利、印度和中国这样的情况都比较突出。

可能在大多数社会里，“上层阶级”认为应该开展慈善事业和

政府补贴 以增加美术作品的给养 否则‘下层阶级’更愿意拿到市场上出售。如果艺术完全让市场左右，那么管弦乐和经典的歌剧音乐就可能会从音乐厅的节目单中消失殆尽。

所有的社会都禁止某些市场交易，以此来确立对一些人的不允许的控制。例如，除非在重大的约束之下，否则不能让个人利用市场方式招募、装备和组织私人军队。小型的私人保安队是个例外，企业常利用它们来保护房产，社区也有保安队，企业有时会运用私人“部队”打击罢工。在一些社会里，爆破工具的买卖是受到禁止的。

许多社会对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通讯也加以限制，它们也希望政府官员同市场力量保持一定的距离。假如诉讼当事人能花钱买到法官的有利判决，在司法腐败的社会这一点很容易做到，那么，社会建立司法制度的目的便受到干扰了。有时候，社会有可能会缩小市场体制的领域，这不仅是因为强制的必要性，最主要的是它来得更划算。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数百万个家庭，每个要给他们的邻居一点钱，让他们把不雅观不卫生的垃圾运走，那么还不如让政府颁布条例，强制要求都这样做。同样，富有的人可能会花钱买隐私 如建造安全的住房、构筑栅栏、雇佣保安人员 可是他们常常不愿意这样做，而是利用法律捍卫自己的隐私权，因为它似乎来得更便宜。

社会希望禁止和加以限制的市场协调，主要是产生明显溢出效果的交易活动。例如，商业企业的市场交易会污染空气和水源，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政府进行干预，采取严厉的措施修正市场协调。

在集权体制中，对市场体制激烈的与众不同的反对，受到政治精英们的庇护。政治精英们担心市场体制与公民政治权力联手，因为一旦这样会使他们看到，市场体制会扩散对社会的控制权力。

这些人宁愿自己实施控制，也不愿意通过市场分散控制权力，以免公开表白自己的意图。在民主社会，统治者为了各种理由，或许就是为中饱私囊，有时会倾向于对新产业的投资数量和结构加以控制，而不想把它完全交由企业来处理。

最后，无论怎样叫嚷他们为市场体制承担了义务，企业家为了他们自身的市场，总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去寻求政府各种各样的保护。这些保护有时会加强市场体制，而不是带来了限制。比如，意大利这么多年来一直维持着复杂的许可和调节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保护着它的小企业尤其是家庭企业免遭市场的残酷竞争。为了创立企业，使每一种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能卖出去，许可制是必需的。工作时间、中午下班时间及节假日的安排，也是由政府管制的。市场体制中最明显不过的保护壁垒就是关税以及其他对进口的限制办法，另外还包括对石化、矿业、农业等数十个产业的直接补贴。它们几乎削弱了对生产的一般市场导向，为企业家的创新提供了法律依据，或者说并不是由于它们的影响而加强了企业家的创新能力。总之，它们常可用来解释中央计划的泛滥，传统的市场体制为什么在有些领域被搁置一旁，它们无论对买方还是对卖方来说，都缩小了市场选择的范围。

所有遏制市场的理由，从原则上看几乎都能站得住脚。但是，它们没有给出在市场体制及其他模式之间明确的选择，它们只是提醒我们要慎重思考选择的条件，比如：血液或身体器官是否能买卖的问题，并没有正确的答案，合适的回答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对风险的态度、对他们相信和知道的情况的可信度，同时，也取决于替代的协调过程是否合适。

让我们来谈谈抉择问题。

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注意，政府是市场体制最重要的参与者，它是公共建筑物、桥梁和武器的买主。这样的购买清单，如果一项

一项地列出来，那是很长的。除了购买许许多多的物品，政府还要雇佣士兵、宇航员、护士、警察、园林工人等。当然，参与市场体制的还有公司和家庭。

作为市场机制的参与者，这三个机构是明摆着的，它们每一方都可以对市场体制进行取舍。政府可以雇佣一支军队，也可以不利用劳动力市场而是通过颁布命令要求年轻人应征入伍。公司既可以购买电力，也可以自己发电。一个家庭其成员可以光顾理发店，也可以绕过市场体制自己在家里相互理发。除了这三个机构，我再增加一个为人们所不太熟悉的第四个抉择，这就是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这个概念乍看起来好像是不可名状的。社会对市场体制的选择范围，取决于对上述四者每一方能力的估计。

政府倾向于掩盖其他三个选择，因为市场体制对社会秩序强制性条件不能提供有效的管理，政府，只有政府，才能做到这一点。市场体制不能靠自身来形成，而政府通过对自由和财产的立法，从而帮助市场体制的建立。可以确信，习惯也时常能服务于这一目的，只不过并不充分而已。

家庭是从属于市场协调的非市场化协调者。在一个核心的家庭中，尽管我们知道，丈夫会对妻子做出的丰盛晚餐给点小费，但这更像是对妻子辛勤操劳的肯定而决不是补偿，因此，家庭成员之间一般是不存在相互买卖的行为的对孩子们所干的家务事，父母可能会象征性地给点报酬。当然，在一些社会，也有父母把他们的孩子出租出去。总起来看，孩子们是由父母的权威协调着，决不是由市场机制来协调配偶之间责任和义务的分担，不是按市场交易行事的，而是通过在道德准则框架之内相互忍让的方式进行的。

不为鲜见，市场体制的观察家贬低家庭社会协调者的作用。确实，家庭是不能够实现如同市场所做到的一国或全球范围内的

协调。在许多社会，妇女是不能从事市场化劳动的，也不允许她们这样做。妇女和儿童的非市场化劳动，以及男性配偶在家庭中的业余工作，增加了市场体制协调的劳动总量，是市场化劳动的补充。在现代社会里，家庭依然是大量家务活的协调者，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整合者。尽管有人喋喋不休地谈论没有家庭的社会的可能性，甚至有的人还用行动进行了探索，例如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可是在目前，家庭在社会协调中的作用仍然不可动摇，它仍然是市场体制范围的巨大的约束者。

市场体制最好应被看成是称作家庭的那样的协调者，而不是一个个体协调者，它应被看成是一个具有集体性质的代理机构，其中，工资赚取者进入市场以赚取收入，然后在家庭成员之间进行分配，部分家庭成员到市场上买回货物和服务，然后让所有的家庭成员共同分享。

集体性质的企业，尤其是大公司，是市场体制的第三个选择。当企业在几个方向上拓展了市场体制领域的时候，它们便限制了市场体制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就像我们已经讲到过的那样，企业在市场环境下，构筑了非市场之岛，在那里，管理协调是非市场机制的。通过与供应商和顾客的市场交换，规模较小的企业已经组成的许多市场活动，或许会被那些取代了市场交换的单个公司纳入行政命令的轨道。

为了获取社会协调，政府是主要的强制工具，但是，企业和家庭同样也具有这方面的功能。别的不说，通过许诺给以报酬，企业能引导工人去接受雇主的强制措施。企业的强制是有限度的，很显然，一名雇员离开某个企业，要比居民和纳税人的迁移容易得多。家庭的强制更是众所周知的了。

社会协调任务的重要和可能还在增加的份额，是由第四个选择承担的，即民间社会所承担的部分。对那些使用这样一个术语

的人来说，它表明了协调的集体性，而不是企业和政府组织。这些集体在结构和目标方面可能十分不同，但它们似乎都反对人们把它们当成是非营利单位。这些集体单位包括：政党、院外活动组织、慈善机构、俱乐部、专业实验室以及博物馆等。

这些实体单位基本上在市场体制之外运转着，比如，读书俱乐部的成员每个月聚会一次讨论心得。另一方面，它们之中尤其是规模比较大的，可能会利用市场招募服务人员，到市场上购买必要的活动设施。对此，政党就比较有代表性。许多民间社会组织利用市场体制购进劳动力和其他物品，但它们从来不在市场上出售任何东西，即使拿了东西去卖，也并不追求等价交换的原则，常常是干着吃亏的买卖。一些传统企业往往借机浑水摸鱼，把自己也装扮成慈善机构。一些摩托车爱好者俱乐部，会提供地图、旅行信息、保险以及其他类似的服务。

对一些人来说，民间社会不过是一个组织，它的各项活动包含着友谊、同情和喜爱，以及其他不受政府和买卖组织所强迫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形式。须知，这些活动是普遍现象，对社会协调和人际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一些研究民间社会的人把这个重要的意义同那些交换关系联系起来，认为通过这些交换，我们每个人都组织起来了，并且不断地思考着我们的价值观、生活的目的和政见，即使从眼前来看，也是休闲和交流对时事的看法的交往。人就是由这些交往创造出来的，除了最先由父母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之外，此后我们就是在不断与人打交道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

在如同家庭生活那样的各种各样非正式、小范围的相互影响中，人们控制着相互之间的伤害，彼此提供着相互之间的帮助，这可能出自于一种关爱，或者是有益的推动和习惯。他们相互照看自己的小孩，获得友谊的帮助，进行气氛融洽的交换活动。在小范围的交换中，人们经常会寻找社会交换的领域，在这样的领域中，

等价交换的市场规则是被禁用的。

在这些人际关系中 和平与合作既不需要强迫 也不需要像在市场上做买卖那样的明确的等价交换。尽管在这些交换中，人们追求的抱负大多相同 如同他们在市场中的活动一样 然而 市场不再是必要条件 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 它会妨碍人们的追求。例如，假定我现在想得到一种真诚的友谊，可是如果我花钱去购买它 那么友谊这种纯洁的关系便被破坏掉了。在这些关系中 当事双方常常都会得到回报 但决不是明确的有条件的等价交换 从民间社会活动中 包括娱乐和探险 人能够及时获得满足。这一点不同于利用资源获取满足的手段与目的的模式，因为它没给生活赋予市场体制的特征。当然，我们时常利用市场体制来获得必要的设施 从而使我们能够享受游戏和探险的快乐 可是一旦设施和场地都具备了，我们可能不再进行买卖了。

下面，我们来对市场体制的范围或领域作两点总结性的述评。其一，社会交换和惯例难以进行明确的划分，它们总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地相互交织着。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一帮人在建一座教堂 我们可能很快就能识别出哪些活动属于市场体制的范围 比如购买来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但他们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修建教堂 供做礼拜用 此后教堂中的各种活动 就属于宗教活动的范围了。总之，我们不可能将社会生活区分成根本不相关的各个方面。其二 认为只有市场体制才是社会协调者的观点 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可能得到多少拥护。相信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认识到了政府、家庭、企业及民间社会的各种管理作用。可是 确实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社会 美国是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它们认为 最好的政府就是什么也不管的政府，由此衍生出一个未公开说明的命题，即市场体制是最好的协调者，它能把一切协调得很好。可

是，如果都让市场体制来决定，那么大多数人会认为是不人道的。“小”政府好是好，但由此也会带来街道上垃圾成堆、可怕的流行病的蔓延。市场的范围、边界究竟应划在哪里，政府、家庭、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认为这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严肃的问题，绝对不能让行政命令的教条主宰一切。

1. 关于市场体制选择范围的不不断变化、争论不休的边界问题，参阅 R·库特勒的著作《一切为了销售：市场的功效及其局限》。

2. 关于市场体制允许和不允许的各种论点的剖析，特别是对于特殊商品如学业、器官以及咨询类的特殊服务，可参阅 M·J·雷丁的著作《备受争议的商品》。

第二部分

市场体制的利用

第八章 等价交换

市场体制的良好运行，吸引了许多社会不断地利用它，从东方到西方，从北半球到南半球，市场体制的巨大成就，使得许多对其持狂热态度的人，忽视了市场体制在其批评者看来是很明显的阴暗面。不过谁能对大多数实行市场体制的国家中大量的人口处于贫困的境地加以否定呢？市场体制是否摧残了我们的生活？它是否毁坏了我们的家园？

在本部分的有关章节中，我特别打算对与人们评价有关的市场体制的特征进行考察，它们包括：市场体制是否具有效率？它对人身自由是否有帮助？市场生活是否会导致文化和人性的堕落？对于这些问题，没有什么人能给出结论性的意见。但是，我们能够找到市场体制的经验性特征，它们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产生积极的影响。

根据上面的说明，我首先挑选出可能被认为是市场核心特征的等价交换。对市场体制的所有评价，都与等价交换有关。等价交换是根据习惯和法律确定的，它是市场体制的基本运行规则。所谓等价交换是指，你付出多少就能拿回多少，两者在价值上是相等的。

如果你是在市场社会长大的，你可能会这样的感受，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等价交换的原则，那么这样的社会将会寸步难行。我就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让我们花点功夫对这一原则作些考察，尽

管某些人可能已经认识到，市场社会的习惯信仰不是由其决定的。

设想一位星际访问者，在到达地球的几天前，他可能已把所有的问题罗列出来了，并希望得到简短的回答。他了解的是事实，不是理论说辞。关于物质世界，不论是自然界的物质还是人工制造出来的物质，他在地球上看到的与他在自己的星球上看到的应该比较相像，无非是草原、森林和各种各样的建筑。可是，对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社会管理，他可能会感到比较陌生。

随着一些标记在他的眼前晃过，他会问我们的房子是谁建造的。我们这样给他解释，几乎没有什么人自己动手盖房子，绝大多数人拥有的建筑物是他人建造的。“人人是否都能得到住所？”不是的，我们可以回答，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有无家可归的人，听到这样的话，外星人似乎大吃一惊。

“食物呢？”外星人问道，“地球上的人是否自己种植他们需要的东西？”不是的，我们可能会这样给出回答。地球上的人首先赚取货币，然后用货币购买食品、住房或其他想要的东西。外星人问：“是否每个人都可得到食物的供应？”不是的，一些人得不到食物。“那么他们怎样活命呢？”我们解释道：有时候，有些人和慈善组织同情他们，施舍一点食物，有时候，政府会提供一些帮助，否则只好饿死。

很明显，这个外星人根本不喜欢他所听到的。他会说“你们穿的都不错”，可是你们能为孩子提供学校吗？我有点怀疑。在我的周围，我看到了很多汽车，可是有没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消遣呢？是的，我们会使他相信，这些我们都拥有了。“你们中的所有人都能得到它们吗？”我们解释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那么你们觉不觉得有这种义务，至少要满足每个人的最低要求呢？”不，这样的义务我们不管，应该由政府负责。“你们的政府认识到了这种义务吗？”不，如果说有认识那也是有限的，并且还充满着争议。尽

管政府常常对贫困者给予救助，但它不会那么慷慨，绝大多数人认为，在这些条件下获得政府的援助，是令人感到悲哀的。

“那么，你们当中的哪些人对自己的每一种需要都得到了满足，哪些人却没有？为什么不是你们全部？哪些需要被满足了，哪些却没有？”对此，我们再一次做出了解释假如你动手做了，你仍不能获得你想要的东西，那么你就要寻找他人的帮助，提供他人想从你这儿得到的东西，比如劳动力、货币或其他资产，以吸引他人帮助你。这样一来，来自外星球的访问者便会默默地思考着我们解释的一切。“假如你们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出去销售呢？”那就太糟糕了，他们太不幸了，只好去寻求慈善组织来拯救他们。

外星人发现这太难相信了，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理解错了。“你们必须作出安排，以确保人人都能拿出东西去销售，让人人都能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的？”对此 我们可能哑然失语 说不出所以然。我们告诉他，每个人的自由受到法律的保护，至少每个人都可以凭自己的劳动力换取货币工资。“但是，如果某人不能赚取足够的工资 满足其家庭的需要呢？”于是 这又引起了一些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特别是存在那些非熟练工人。“你们的不熟练劳动者是否能得到培训？”这恐怕要通过他们的劳动来争取。外星人听到这样的回答 可能会厉声说“循环解答了 是不是？”然后 他会恢复矜持并表示道歉。

我们可以向这位外星人解释，人能提供的不仅是劳动，人还能拿其他东西去销售 比如土地、建筑物、设备等 我们的社会承认对它们的占有、控制和使用权，这一系列权利统称为私有产权。“你们的解释听上去蛮好的”外星人说“可是 你们对财产的分配有没有安排，以保证每个人都有足够的份额，通过出租、转让或出售就能满足他们的家庭需要？”没有 我承认 我们做不到这一点。许多人只拥有食物和衣饰那样的财产，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财产可用

来赚取货币。“一个人怎样才能获得这样的财产？”我们只好一声不吭地思考着……有的人通过提供劳动获取财产，有的人利用手中已有的财产，然后通过交换获取更多的财产。外星人听到这儿，脸色开始阴沉下来了：“你怎么能那样说呢，不是在蒙骗我吧？”话音刚落，他就走开了。

不过，他的好奇心战胜了他的恼怒，他又走回来问了另一个问题，“除了通过劳动换取工资和占有与使用财产的权利外，你能不能告诉我，在你们的社会，有没有谁能对其他人、政府、社会提出要求呢？是否仅因为每个人都是你们人类一分子和社会成员，即使不怎么过分的要求也没有被承认呢？所有的要求和权利该不是出自于同情和怜悯吧？所有的要求该不是出自于减轻苦难的欲望吧？你们，你们似乎拥有了你们想要的东西，你们能接受没有人情味的要求吗？你们还能把你们自己叫做人类吗？”这一次，他没有等待我们回答便昂首走开了。尽管是这样，他总算还是平静地离开了，因为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发现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另一个习惯和规则，否则他会更加气愤的。人们常常不能确立有效的要求，即使人们为其他人提供了巨大的好处或服务，只有当这些好处和服务能够作价处理时要求才会变得有效。比如，比尔·盖茨的母亲对社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点似乎是不可否定的，因为她养育了一个杰出的儿子，可是盖茨的母亲不能就此而提出要求，市场也不会给她任何回报。为回报我们获得的利益，我们会给那些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人冠以好邻居、积极的公民、乐于助人的朋友、甘于奉献和开明的父母这样的称号，但是，市场决不会提供相等的报酬。

第二天，我又遇见了那位外星人，他告诉我，在他们的社会里经历过断断续续的混乱，可以说每隔十年便发作一次，有的持续几个月，有的甚至持续几年，混乱的出现既减少了产量也减少了就

业。我告诉他，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可是接下来我才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问题与我们的问题是有差别的，他是向我们学习来了，他说在他们的社会里，不工作还能得到收入，但要看工作是怎样丢失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向他解释，在我们的社会，根本不管原因和过程，我们奉行的规则就是，不工作便没有收入。我这一席话，显然干扰了外星人的思绪，他说：“假如是社会制度方面出了毛病，不是当事人本人的缺陷，那么你就不能剥夺他们的收入。”很好，是的，我们确实应该这样来解释，至少我认为应该如此。

在这个寓言里，我难以公正地描述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社会，因为没有说出养老金、家庭补贴、失业补贴等福利制度。在任何社会，要想确立诸如此类的权利，必须采用另外的措施，不能完全取决于市场体制。市场体制本身就像外星访问者发现到的那样，是相当粗糙和残酷的，如果我们不能拿东西去出售，那么就不要再指望能从市场上得到什么东西。

一、捍卫等价交换的原则

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愿意维护等价交换的原则，除非这个原则有其他规则和程序来补充，就像福利国家的那些。一些人对养老金和失业补贴比较感兴趣，它们自身不需要附加条件。尽管有人捍卫，但是养老金、失业补贴等福利制度是有缺陷的，它表明了人们对市场体制的错误认识，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是富有效率的，你投入进去多少，你只能索回相应的份额，这样一来将会激起你更加发奋努力，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听起来是很公道的，它可以防备索取得太多。等价交换决不是对所有的贡献都进行鼓励，也就是说，许多的贡献按等价交

换原则是得不到回报的，它只是对市场贡献部分做出回报，比如：父母对抚育子女的贡献，重大的政治领导活动等。作为一种激励机制，等价交换是不完善的，它适应的范围比较狭窄。另外，按等价交换的原则，一些活动能获得相应的报酬，而另一些活动却不能够，因此，等价交换也会扭曲一些激励。

至于市场贡献部分，等价交换原则可能有促进作用，但也可能有阻碍作用，这取决于条件的变化。由于等价交换原则会引起一些人病态的偏见和对贫困的非道德化，市场贡献的激励经常是迟钝的甚至是不起作用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福利国家的出现，虽然弱化了等价交换关系，但没有减少工作的努力，事实上可能还提高了，因为普遍的社会福利，有助于人口的身体健康和享受更好的教育。有关研究表明，高税收国家，减少了纳税人的收入，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基金，由此会减轻等价交换的严格性，但不会导致生产率的下降和资本增长的放慢。因此，严格的等价交换和高产出之间是不存在相关关系的。尽管激励需要兼顾贡献和报酬之间的联系，但没有哪一个能找到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贡献和报酬结合得越紧密，激励就越强烈。

假如一个社会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对社会合作生产的产品分配追加的权利，那么激励是极有可能得到加强的。由于每个人都是人，都有资格作为社会的一员，使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同等的权利，从而可能会保证人们对收入最低限度的要求。长期以来，福利国家一直走着这样的路：通过公共选择实现最低利益，然后由市场决定附加的利益。

根据道德而不是效率来判断等价交换的好坏，有下面几点理由：

1. 等价交换原则是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你在社会合作中应该取回的份额，由你投入了多少来决定。可是，这个要求常常会发

生偏离。在市场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往往缺乏能力去认识，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言自明的。历史上，许多国家事实上承认等价交换之外的各种要求 比如 基于出身和家世的良好品行的 这样或那样杰出才能的，甚至是社会集团中的一员，或是对人的普遍状况的承认等。总之，等价交换原则不是不言自明的，它不具有普遍性。事实是，每一代人都在使用和处理着遗留下来的无数生产性资本设备，比如改造过的土壤、建筑物、机器及其他由前代人生产出来的资本货物。这些遗产应该在当代人之间怎样进行分配和使用，或者说，谁应该拥有法律上的权益，这些都是难题，没有明确的答案。那么“按投入的多少提取份额”的规则将行不通了，因为遗产的主要部分是上代人劳动创造的。怎样分离出上代人投入的部分，不能由作为道德前提的等价交换规则来确定。

等价交换的原则不是与生俱来的，在早期社会里，还有许多其他的规则发挥着作用，它们与等价交换一样，都不是天生的。即使它们是天生的，它们也是令人痛恨的、充满血腥味和残酷的。所有这些现在都被禁止了，因为它们不道德。

2. 如同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除非能够提供在市场上出售的物品和行为，否则即使对社会有功劳和贡献，也得不到市场等价交换原则的认可。等价交换原则可能会承认心理医生的工作，但如果这位医生私下里给他的朋友提供同样的帮助却不会得到认可。操持家务的配偶，其所做的工作也不会被承认。据我所知，没有任何道德原则会维护仅仅将社会生活利益分配到市场贡献上，而不顾其他贡献的做法。

3. 即使市场贡献可用以判断社会合作利益中应要求的份额，然而判给的好处同它在市场上出售的价值相比，从道德上讲是耐人寻味的，市场贡献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出售的价值。我们来考虑这样的问题：假如你提供内部装修服务，每小时 35 英镑，可是在

10年前，你对同样的人提供同样的服务，即使把通货膨胀的因素也考虑进来，服务的价格也是很低的。既然你得到的报偿比以前多，那我们能否说你对市场合作的贡献已经提高了呢？不是的，尽管你做了同样的贡献，可是现在人们对这个贡献比以前评价高了。不过，也不尽然，所有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因为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其结果是，以前对你的服务的评价不低于现在的评价的人，他们现在能够花更多的钱买你的服务，从而导致了你的要价的提高。推而广之，这个结论表明，由于市场给人的报偿依赖于现在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因此，我们不能仅根据你得到的回报而评价市场贡献。

下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它们的差别。为了获得社会收入和财富中更大的份额，洛克菲勒需要石油市场、需要石油采掘和提炼技术、需要铁路系统及资本市场；盖茨需要计算机软件市场、受教育的人口、电话系统、资本市场等。如果把上述中的任何一个元素排除出去，那么，就不会有全面的成功。单个的人在市场合作中所能实现的，取决于个人的技术、能力、其他人的安插，以及整个系统组织化的程度和质量。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的市场贡献按其可能出售的来计算，无论如何是相当有争议的。

另外还有原因，人的市场贡献同他出售或从市场中赚取的存在着背离。一套公寓房确实给社会提供了利益，可是它的所有人做了什么贡献呢？假如法律能把它的所有权从我这儿转移到你那里，那么根据传统的思想方法，作为该套寓所的新主人，你就是贡献者。然而，除了收取租金的权利发生转移外，其他的一切都没有改变。从这类例子中可以看出，某人对财产是否有贡献，并不取决于他的实际贡献，而是取决于他对该财产的所有权。因此，伦理学观点认为，市场按市场贡献分配权利，是站不住脚的。

二、等价交换的后果

假如市场等价交换原则的一般道德评价不成功，并且也没有用非市场规划和方法进行修正，那么等价交换原则一些明确的经验结果将威胁着可能建立的道德维护。

首先，要是没有慈善事业和像福利国家那样的非市场化措施，等价交换的实际应用将会使地球上数百万人处于极端的贫困。如果这个原则被应用到婴儿身上，那么几乎没有一个婴儿能活到成年，世界也将因此而灭绝一代人。然而，我们不会把这个原则应用到婴儿身上，也不会把它应用到还没有能力做出足够贡献的孩子身上，因为他们还没有继承可拿去交换的任何财产。另外，他们也没有经过充分的培训。可是，同样的情况却折磨着成千上万的成年人，这些人主要是：脑力和体力不健全者，没有适当的财产或根本没有财产，没有得到充分的训练，但等价交换的原则没有对他们作出让步。

其次，在将每个人的要求与他能拿去出售的东西联系起来的时候，所有的权利都与出生和成长经历的偶然性有关。在很大程度上，遗产决定着你能向市场提供什么，这些遗产包括：（1）认识能力和强壮的身体等生物学遗产；（2）早年的教育和上辈的财产等社会遗产；（3）社会地位遗产。如果没有继承能力，早年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继承到多少财产，那么这一切将注定你在市场合作的利益中只能获得非常可怜的一份。

第三，市场等价交换的规则带来了收入和处境的不安全感，即使这些风险可以通过保险而化解一部分。今天被雇用了，明天有可能失去工作，随之储蓄用光了，家庭失去了，甚至连社区中的地位也丧失殆尽。商业波动、萧条和衰退，导致人们失去上作，削减

了他们对劳动收入的权利。疾病和短暂的劳动力丧失，剥夺了人的市场要求，对于老年人，所有的市场权利几乎被终止了。有些人可以动用基金去购买保险，以补偿一部分损失。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状况是难以忍受的。因此，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的产业界就开始限制使用等价交换原则，通过诸如养老金、失业补贴、工人救济和疾病补贴等措施，以确保非市场化权益。甚至更早，如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等地，就开始了一连串的救济活动。尽管没有对等价交换的后果进行成功的反击，但是已经认识到等价交换的后果是不可接受的。

第四，等价交换原则公开地、不平等地分配着收入和财富。在美国，1% 的人拥有将近 1/3 的国民财富。在拉丁美洲，10% 的高收入阶层占有 40% 的国民收入，而 30% 的低收入者只占国民收入的 8%。对一些观察家来说，仅仅这样的事实，便导致了他们对市场体制相反的判断。而另外一些人承认这个缺陷，但指望通过像养老金等非市场方案，把不平等降低到人们能接受的程度。除了以上两部分人之外，还有一部分人竭力维护市场现存的不平等。这些人承认贫困是个问题，因为它反映了极端的不平等，但是他们不认为，对不造成贫困的不平等仍然还是一个问题。

在一些国家里，摆脱严重的旧式不平等的缓慢的历史变动，似乎为了回应两个交织在一起的根源，其一是道德传统，在西方社会就是东正教—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其二是民主政治。当然，这样的运动常常会遭到顽强的抵制，阻力主要来自于那些担心会失去既得利益的人。

人们可以根据非市场体制暴露出来的更大的不平等，或者根据计划制度继续实行的严重的不平等，而不承认市场体制下的不平等。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否定市场巨大的不平等问题。完全平等是不可能的，因此决不能依之来判断现在的由等价交换原则导

致的不平等。

1. 关于自动调节的市场体系中，土地、劳动和货币转化为商品的历史过程的原因及其不可接受的结果的分析，参阅 K·波兰尼的代表性著作《伟大的转变》。我认为，我对等价交换的分析，虽然大体上是重述性质的，但是我采用的措辞和表述比波兰尼遇到的麻烦更少。

2. 关于严格的等价交换和高产出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的分析，参见 T·B·埃兹尔的研究《新的不平等政治学》

3. 关于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问题，参阅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的文件《人类发展报告》(1997)。

第九章 寻求什么样的效率

尽管我们对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了评头论足，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市场体制模式获得成功，似乎是一目了然的。尽管在一些实行市场体制的社会里，巴拉圭可能是一个典型，许多平民百姓仍然处于贫困的境地，然而最高的生活水平却也诞生在这些国家。对亚当·斯密来说，市场体制可以用来解释‘国民财富’的原因。斯密的学说曾被一些圈子里的人冷嘲热讽，但随着计划制度的垮台，他的思想已经得到了印证。在实行中央指令的国家，由于没有市场体制，其产出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在第三世界国家，走市场道路的国家比那些不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更快速。中国走向市场体制，从而创造出世界纪录的增长速度。无论是采用人均产出指标，还是使用生活水平测度，市场体制在这些方面取得的业绩是极其令人难忘的。说是人类创造的成果也罢，说是无意恰巧碰到的也好，如果考虑到市场体制是包罗万象的最准确的无数大型合作的制度，那么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难道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效率吗？不，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市场体制仅仅堆积着产出吗？或者说，它能在可能的产出中进行有效的选择吗？除了一些容易处理的问题之外，还存在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比如耗竭了地球上的资源，以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生产，能不能被认为是有效率的呢？更为困难的问题还有市场体制

的效率是不是使人民感到幸福的效率？或者说，是精英剥削人民的不正当效率？

下面，我们先来从普通的或传统意义上的效率概念入手展开讨论。传统意义的效率，主要是生产货物和提供服务的效率。

一、核心效率问题

除非你知道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将会遇到严寒，并且随着高度的上升空气中的氧气会越来越稀薄，否则你是不能正确评价是否能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与此相似，如果不首先认识市场体制的障碍，就不可能了解到对效率有影响的的市场体制的与众不同的特征。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热动力学定律，投入与产出总是相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物理变化都会产生同等的效率，都是 100%。工厂使用的电力，其结果不仅是满意的产品，同时还包括释放到空气中热量以及没有什么用途的废料。然而，与效率有关的概念，主要是指有价值的产出与有价值的投入之比。不可计较投入与产出 100% 的效率，相对效率表明有用的投入与有用的产出之间较高的比率。

一吨的投入只产生一磅的产出，这并不一定就是没有效率，它取决于怎样对这一吨的东西和一磅的东西进行评价。货物和服务的物理特性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效率，这就是说，单从货物和服务的物理特性出发，我们无法推断有效的选择。无论什么样的选择也不能主观地认为是正确的、对的或有效的，要参考它们是怎样被评价。

假定一个社会通过市场或通过中央命令，将有价值的要素如劳动力、零部件、机器等分配去生产胶靴，如果工人们不努力干活，

他们没有被组织好，那么生产将是无效率的。可是，一旦激励措施得当，组织工作井然有序，产出便会随之提高，我们立马能看到获得的效率。对于这样的效率，可称为技术效率。

社会也可能正在生产着不恰当的产品，即产出没有价值或没有更大的价值，比如，消费者宁愿要电动头发干燥器，而不想要靴子，如果这时候仍然生产靴子就是不恰当的了。或者，若生产园艺工具能带来更多的价值产出，那么，社会将会采用中央计划体制或市场体制，而把劳动力、机器或零部件分配给相应的工厂。对任何社会来说，想要在有效投入和产出之间作出选择，的确是十分困难的，它需要在处于连接投入链条中的每一个企业的产出和投入之间进行合适的选择，另外，它需要对企业进行有效的选择。诸如这样的效率，可称之为分配效率。

基于市场选择，一些富裕社会已经实现了由农业、重工业到旅游业、保险和金融服务业的转移。尽管如此，仍然不断有新的变化。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贫穷的人们将他们收入中的一部分拿去买自行车，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增加，他们可能会重新分配开支，比如不买自行车而去买摩托车。正缘于此，所以企业家要在劳动和机器之间进行无休止的选择，到处转移资本投资。分配过程永远不会停止，然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几乎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分配过程都有可能搞得很糟糕。不良选择非但无效率可言，更有可能伤害人们的感情，像行贿受贿、技术效率失灵就是如此。不适合的产品，不恰当的投资，以及维护和技术革新的不恰当的选择，所有这些不良的分配方式，最终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终结，也促使了毛泽东之后中国社会的改革。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西方社会的大萧条，是分配选择过程失败的另一种形式。这次大萧条，根本无法把可用的人力完全分配到各项活动中去，简而言之，人都被解雇了。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分

配过程，不仅是为了提高收入，更重要的是要去保护过去的收益，不让衰退造成更大的损失否则，生活在由过去的成功所带来的财富下的每一代人，很有可能会遭到侵蚀。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复杂的问题。假定产出的是钢材，从事计划工作的官员对它的估价较高，而社会居民作为旁观者却没有给出那样的估价，或者，我们正面对着钢材的分配问题，想购买钢材的人对其给出拔高的估价，但受聘于政府负责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发展经济学学家可能不会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分配是否具有效率，这要看做评价的是什么样的人，哪些人的评价是算数的。因此，任何分配都不能单纯说是有效的或无效的，一切都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前提

效率的评价尽管存在差别，但效率问题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某个人或某类人来说有效率，可是另一个人或另一类人可能会抱怨无效率。

无论谁来评判，无论哪个人的评价是算数的，分配效率要求把参与者详细地分配到无数的职业和工作当中去。追随亚当·斯密和涂尔干的社会科学家们发现，角色专门化，也即所谓的劳动分工，是效率的基本源泉。然而，他们有时候忘记去说，或许在他们看来是极其明显的，只要适合人的欲望，并且对每个人都适应，那么，专业化就是有效率的。不过也需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劳动分工都有效率。

二、负担

从给定的投入中获得更多产出的技术效率，或许也可称为“无中生有”。在额外红利的机会之外，精神追求需要通过稀缺性分配来进行。为了生产更多的有价值的行为或物品，那就必须忍受其

他东西的减少。要想得到更多的医疗保障，必须减少律师。假如工业部门需要更多的劳动力，那么在农业部门就不可能有更多的劳动力。

为了获得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必须放弃另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所以，稀缺性货物和服务的每一项分配都是负担。在各个社会，从居民个人到总经理几乎人人都会碰到层出不穷的令人犯难的选择。兼职姑且不说，人们一旦确定做某项工作，则会排除另一项工作的利益，原因是，我们的收入是有限的，在某一类消费品上开支，便排除了对其他物品的享受。拿企业家来说，如果他选择某项投入，那么尽管其他的投入也是有用的，但他没有能力再做选择了公共选择同样是负担重重。中央当局在决定是出版更多的图书还是打一场战争时，需要征集稀缺性资源，如果这些资源被用于上述目的，它们便不能再被用于其他有价值的项目。据此，分配效率要求，选择和决定应根据负担的信息作出，没有这个信息，决策决不可能具有效应，而且也是不合理性的。

重申一下，你和我对负担的评价不会相同，居民的评价与官员的评价可能也有差异，可是，关于效率的每一个判断，需要对比接受的是什么和放弃的什么。

应放弃什么，取决于哪些选择是不受限制的。比如，我现在正考虑是否要找一个专职的佣人，他对我来说是否有效用，这要看他表现如何。假如政府部门指派一位佣人给我，那么这项费用不用我负担。假如我要和其他人争夺这位佣人，此时我的负担将更重。假如我能通过市场雇到这位佣人，显然负担与上述二者又有所不同。再举一例，设若官员们正在评估安排劳动力修建堤坝的效率问题，其负担要依赖于对劳动力如果不被安排去修建堤坝而用来生产别的什么的评价，究竟生产什么要看他们作了怎样的选择。他们能否强制命令没被雇佣的人去修建堤坝呢？如果能这样，那

么负担将不及他们去雇佣劳动力。

在这儿，我关于负担的这些说法，是指费用，包括选择的费用、结果费用和昂贵的选择。具有负担的选择，将会引起费用开支。控制通货膨胀的负担或费用，就是不愿看到的失业水平。公路上车辆行使的速度，承担着死亡的负担或费用。生产厨房用品的负担和费用，是由放弃其他有价值产出而构成的，如果资源没被用去生产锅碗瓢盆，它们本可以用来生产其他产品的。

费用不仅仅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技术性范畴，它也并不总是指货币某些负担，即费用可以用货币来表示，可是大量的例子表明，费用可能不能用货币来衡量。尤为重要的是，除了表述所放弃的行为和物品之外，货币费用没有任何意义。比如，你读到这样的一句话：在丹麦上大学，每年需要支付 20 万克朗的学费。这句话的意义是，如果有人愿意去丹麦上大学，那么他就必须放弃 20 万克朗所能购买到的其他好处。

对分配效率来讲，其主要要求是衡量什么样的价值应该采纳和什么样的价值应该放弃。显然，如果被接受的价值多于被放弃的价值，那么这样的选择就是有效率的。虽然这个命题极其普通，但它却是最有用的，我们就是这样来安排日常生活的。效率的要求体现在：在给定的费用条件下获得价值最大化，或者以最小的费用实现既定的价值目标。总之，效率意味着成本最小化决策。

假如对全社会都是有效率的，那么每个人在利益和负担上必须多加掂量。当好处的享用者和费用的承担者不一致时，费用与好处的比较是十分困难的。例如，汽车所带来的广泛的好处，必须同在交通事故中失去的生命的价值做比较。谁获得好处谁就应承担损失，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存在着广泛的差异，并时常伴随着争议。然而，对效率的要求是不可避免的，即接受的价值和好处必须同负担、费用或放弃的价值进行对比。

在费用不清楚的情况下作决策，这样的决策即使制定出来了也是极不合理的。如果你不知道被要求放弃什么，那么你就不能贸然地购买蜂窝电话。对企业家来说，如果他不了解需要放弃的信息，他便不能决定应该招聘多少劳动力。中央计划主义者同样会遇到与上述类似的问题，并且还要多得多，比如，在事先不了解因为建造铁路而不得不减少许多可能的生产，不了解这些生产的价值时，他们无法合理地决定建造更多的铁路，提供更多的铁路运输计划。

再次重述一下，应该放弃哪些东西，取决于选择是不是不受限制，并且这样的选择能提高效率。一个人、一位官员或整个社会如果决意生产更多的面包，那么关于费用的陈述便不存在正确不正确之分，费用将变成什么，一切取决于生产更多面包的手段。对该官员或某位企业家来说，生产面包的费用将决定于付给面包工人的报酬，而他们个人的偏好与价值评价则与此无关。

形成一个合适的产品组合是有困难的，它需要掌握足够的信息，这对某些人来说是件令人吃惊的事。这些人认为，人需要食物、住所、教育、医疗保障、交通运输和娱乐是自然的，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社会也需要生产这些东西。然而，摆在一个社会面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生产它们，这些东西为社会所需，理所当然地进行生产，而是每一样东西究竟应生产多少，是多生产还是少生产？是把社会的 5% 还是 20%、40% 的能力投入到医疗保障中去？不论怎么思考这些数字，似乎很容易看出需要的东西有很多。因此，要找到和形成一个合适的产品组合，应该说不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问题，相反，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任务。

我们几乎从未把食物和医疗保障或其他任何货物和服务的价值，做过一般的或抽象的比较，我们可能仅比较过货物和服务的增减价值和其他不得不放弃的货物和服务的增减价值。假如我要在

鞋子和夹克衫之间作出选择，尽管这两样东西我都没有，但我不会问自己是否应该穿鞋子而不穿夹克衫，相反，我只会问是否应该添一双新鞋子，或者添一款新夹克衫。计划工作者同样不会问钢铁或电力是否更有价值，但会问是否值得为多生产钢铁而减少供电量。

总而言之，分配性质的选择应该从边际的角度进行，选择者需要将边际效益与边际成本作比较，为了使作出的选择更有效果，能接受的边际价值必须等于付出的边际成本或负担。

假如人的欲望和需要是固定的，那么这对仆人和计划工作者作出选择将是有帮助的，因为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值得生产的。可是，事情却并不是这样的，人的欲望和需要经常会发生变化。生物学从来没有明确指出我需要电视机，即使它有这样的功能，但它也不能告诉人们我需要多大尺寸的电视；它也不能指定我对食物的选择，一个社会同另一个社会不同的烹饪方法就是例证。生物学没有指出，社会是否应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教育中，或者投入到健康照顾之中。

三、衡量成本的价格

正是基于分配效率和成本的范畴，有关效率的两个额外的具体要求出现了。

第一，为了将收益与成本进行比较，不论谁在做这项评估和选择，做公分母成本的测算是必需的。一台计算机对我的成本或许可以这样来表述，“假如我抱一台电脑回去，那么我将无力再购买一套新的组合沙发。你要知道，我一直想买一套组合沙发的呀。”“假如我选择买计算机，那么我将不得不压缩开支，一年都不能在外面吃饭了。不管怎样，这对我来说是值得的。”然而，除了沙发、

外出吃饭，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我也要放弃。我必须把它们统统做一番比较，以便找到费用最小的选择方案。对中央决策者来说，同样会碰到这样的困难。比如，为了安排新的资源，像航空运输，他们需要一个客观的费用报表，以便能把生产摩托车的资源拿出来，他们必须知道去比较获得资源的各种可能的方法，以找出最小费用的替代方案。因此市场体制的参与者和中央计划工作者，一样需要测算费用或放弃的价值的公分母，并且还要把成本与接受的价值进行比较。

对货物和服务进行测量是使用磅还是使用吨作为计量单位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商品是用磅为单位还是用千克作为计量单位都有可能，但没有什么意义。金属铅总比黄金压称，但并不能依此而对它们的价值大小给出说明。服务无法进行称重，那么是否用容积单位来计量呢？一样行不通。对于一个有效的选择，我希望的测度不是货物和服务的物理性质，而是它们的价值。

货币和价格能够提供价值的公分母。对一个消费者和企业的经理来说，一台蜂窝式电话的价格说明了它的成本，有了这个数字，我们可以把它与可能要购买的商品进行对照。通过看看货物和服务项目上的价格，购买者能立即看出到底应该买什么。每一件可供选择的商品的价格，允许人们进行最小成本的决策。价格能够保证消费者对各种可供选择的商品进行边际比较。比如：是购买还是存钱，是买这项服务还是买那项服务，是买这种品牌和式样的商品还是买那种品牌和式样的商品。价格能够帮助企业对各种投入的边际成本一一进行比较，比如生产某个产品究竟是用铅质材料还是用塑料，能够帮助企业分析投入的边际成本和产出的边际价值的大小。

由于在市场体制中我们很容易进行价值评价，我们根本没有认识到在没有价格时将会碰到什么问题。有人或许会认为某些选

择即使没有价格也容易决定，例如，不论什么人几乎都会选择新车而不会选择旧车，然而，事实却是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正好作了相反的选择，因为一辆新汽车对这些人来说，负担太重、费用过高。你可能会说，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选择金子而不是盐巴。可是在撒哈拉地区的盐巴贸易中，盐与金子是被看作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一盎司金子只能换取一盎司盐巴。没有价格，便没有公开的选择，即使有选择，也是非理性的，不计成本的。

第二，价格必须能反映成本。刚才所说的不甚清晰，价格背离价值这顶帽子是行不通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价格必须与价值相符。可是，如果人们不投入价值，那么任何东西皆无价值可言，我们必须搞清楚价格究竟表示的是哪一种价值。

设想我是一位中央计划工作者，自己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钢产量扩张 2% 电的产量就要缩减 3%，这样做是不是值得？由此带来的成本对谁是物有所值？你或许会回答，这样做符合社会的需要，因此对社会而言是值得的；或许认为，它对政府官员来讲是值得的；或许还认为，它对数百万居民是值得的。钢的价值与电的价值是不同的，并且随着你的回答而发生变化。钢产量增加带来的成本和扩张效果，同样也取决于你的回答不存在价值的正确估计，也不存在成本的正确估计，任何人都无法做到最大效率的选择，因为价格本身不一定完全准确，这一切皆取决于以什么人的价值算入。

我不知道如何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价格体系，但我知道计划制定者完全不顾价值的武断行为，这些人只会考虑他们顶头上司的意思，基本上扭曲了价格的反映功能。有人或许会说，正因为计划制定者没有这样的一套价格体系，所以他们一直受到指责然而，构造能反映数百万人的价值的价格体系是有可能的。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价格不可能与价值完全相等，为避免经济学

理论抽象的长篇大论，我准备用简洁的直截了当的见解来说明价格是怎样反映价值的。

四、效率价格

设想你与千把人聚集在一个体育馆中做试验。毫无例外，每个人都分给一件或几件自己不想要的物品，比如：某人分给一块面包，某人分给一块砖头，某人分给一辆汽车，某人分得一份保单。另外，假定聚集在一起的这些人都有各自的专长和技能，有的是律师，有的是普通的劳动者……现在我们来引导这些人按照他们各自的愿望去从事交易活动。每个人都不能直接从他人那里拿自己想要的东西，只能进行交换。砖头对你来说可能没有什么用，所以你要想方设法找到想要砖头的人，以便换回你想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你来说一定是有用的，要么，它能使你得到享受或能派上用场，要么，就是你认为它能帮助你换到你使用 and 享受的另外一件商品。所有的人都不停地进行交换，并且人人都想从交换中获得好处，只有当每个人皆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进一步交换已没有可能时，交换活动才会停下来。在这个虚构的交换活动中，我们假定大家把他们能提供出售的东西和自己需要的东西，通过口头吆喝、广告牌和电子屏幕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们四处走动寻找交换的机会，而时间长短则不受限制。

当所有的交换完成之后，旁观者将会看到，对每一个具体的交换，比如用砖头换面包，其最终的交换关系几乎都是同样的比率，例如，一块砖头能换回二块面包。只要交换的比率不相同，那么交换活动便不会停止。交换结束后，每一种被交换的货物或服务通行的比率，当然也会与其他所有的通行比率联系着。两块面包换一块砖头的 2 比 1 的比率，与一块砖头换一盒粉笔的 1 比 1 的比

率，隐含着两块面包换一盒粉笔的 2 比 1 的比率。所有货物和服务的比率体系，能够用价格体系来表示。在这个例子中，一块砖头的价格与一盒粉笔的价格是相等的，面包的价格只相当于它们的一半。这是一类价格，它反映了边际价值和边际成本，对人们来说，要想提高他的选择效果，只能靠其他人自愿的回应。

我们能想像得出，猜谜语游戏的管理人员也发行一类货币，以供游戏活动时使用。所有到场的人按指令按货币价格表示的比率进行买卖，但不是以物易物。这些人的交换将会产生同样的比率体系，就像我们在上面说的。这一类价格我们称之为效率价格，因为它们相当于价格这样的措词，它们允许充分利用具有优势的自愿交换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得出两点结论：(1) 它们允许所有参与者有权知道他们希望接受的东西的成本，以便能做出有效的选择。(2) 允许游戏中的每一个人既能从中获取利益且又不会把损失强加给其他的人。

对于效率价格，特别要注意的是，某人获得某个东西的成本，就是他为获得这个东西而必须放弃的收益。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要假定，他获得这个东西的惟一途径便是自愿交换。如果他能够有办法偷到这个东西，那么该人的成本可能等于零了。如果他能请求当局强行把这个东西划归给他，此时他的成本也是零，或者说他的成本就是向当局行贿的支出。可是，他不可能做到这些，任何人要想从他人那里获取价值，必须通过交换。因此，在游戏规则下，每个人为了某个物品或服务支付的价格，实际上暗示着该商品或服务的成本。

通过比较，效率价格与专制价格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假定你和我正在进行一项交易，我用两块面包换你的一块砖头，那么，这样的一笔交易对你我两人都会有好处的。然而，如果游戏的管理者进行干涉规定不是 2 比 1 的比率或价格 这样一来 我们两

人都有可能会遭受损失，强加的专制价格毁掉了本可以有效率的交易。假定该游戏中的某位参与者不知怎的对他人发出威胁，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同他进行交易。所有这些情况，都属于垄断，他们会阻碍互惠互利的交易。

现在似乎很清楚，通过交易实际上已经确定下来的通行比率价格，与被交换的服务或货物的物理性质无关，它只反映欲望的频度和密度，只反映其价值。

随着人的价值取向的改变，效率价格也会发生变化。此外，效率价格和效率成本也会受到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比如，当一个社会的财富增长时，可以预料海滨旅游胜地的地产价格将有所提高，因为有钱的人愿意出大价钱去购置。

资本增长和技术变化也会大大改变效率。事实的确如此，变化的速度常常是飞快的，远远快于计划者的计划制定，一周接一周，新的效率价格引导着下一步必要的决策。例如，在 1880 到 1890 年间，处于下降状态的美国钢材价格，使得钢材消耗量大的部门看到了有机可乘，结果导致钢产量从 125 万吨增加到 1 000 万多吨。如此快速的变化是很常见的，尤其在今天的计算机和通讯行业里。

专制价格和效率价格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专制价格经常会产生短缺和排队购物的现象，要么就是供过于求。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前苏联和 1978 年以前的中国便会一清二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维持城市贫民的生活，有意压低农产品价格，这样做的后果是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一方面农民不愿过多种粮，只求自身够吃就行了，另一方面会引起农民把粮食贮藏起来而不愿拿到市场上出售。如果电的价格压得过低，人们就会拼命乱用，最终将不得不遭受灯火管制的不便。如果政府给予补贴，那么灌溉用水将被浪费性使用，由此而带来的后果是入不敷出，其中

还包括纳税人的钱没能用于水利设施的建设之中。如果石油、矿产以及其他基础资源的价格是人为制定的，那么整个系统的增长可能会变缓。如果卡特尔们抬高牛奶的价格，城市中平民百姓家的小孩就会遭殃。如果药业公司对它所开发的药品实行垄断，此时那些正需要该种药品的病人，由于无力承受昂贵的费用将不得不等死了事。效率价格决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们的玩物，也决不是市场体制或有或无的奖品，它是为取得服务和货物生产效率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效率价格既适用于自由民主的社会，同时也能适用于其他社会，只要这些社会中的政府当局愿意实行自觉自愿基础上的社会协调就可以了。

第十章 市场体制的效率

在现实世界中，效率价格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严格地讲，效率价格几乎皆是近似的。那么是怎样近似的呢？通过市场交换，市场参与者们不断地进行着有利于自己的交换。如同第九章中的例子，效率价格交换要求有许多买者和卖者的存在，以限制垄断，并且要求任何人都无权确定价格。换句话说，政府在总体上应停止固定价格的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条件是经常可以遇到的，市场体制产生了效率价格，同时它也在利用着效率价格。

这是市场体制效率的核心要求：效率需要效率价格，而效率价格又是由市场体制决定的，总之，不要破坏这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市场体制的选择过程中，效率价格十分流行，为了进行市场体制的选择，首先需要对效率提出重大的与众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要求，既要有助于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又要有助于企业的选择。比如：应该生产什么，产品的质量应如何定位，使用什么样的投入等。另外，还要有有助于企业进行技术和资本投资的选择。

在市场体制中，资本应该怎样进行积累，新技术应怎样进行引进，卡耐基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告诉我们，一切都要以效率选择为转移。卡耐基认为：“制造业成功的主要源泉之一，就是要引入和严格维护一个完善的核算体系，从而使每个人都知道用钱用物的责任”在 1875 到 1898 年期间，由于卡耐基对效率选择的关注，从而使钢轨的价格从每吨 160 美元

降到每吨 17 美元，它不仅带来了钢铁工业的巨大发展，同时又对以钢铁为原材料的产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不想过高估计和过分吹嘘效率价格会使市场体制更具效率，在现实的市场体制中，价格会因垄断和政府干预而被扭曲。这是一个仅关乎在服务和货物生产中的分配效率的要求，而对其他类别的效率将弃之不顾。不过，基于效率价格的效率要求，仍然是广泛的基本的要求这个要求不可能对不用货币和价格的物质计划体制有帮助，不可能对计划经济制度有什么好处，在奉行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尽管出于某些目的也使用着价格，但它们的价格却是高度随意的。同市场体制中的价格体制完全不一样，在这些国家，生产决策根本不受价格指导。总之，市场体制大体上实行着效率定价，而其他制度，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都不可能这样做

有的人或许会诱导人们相信，效率选择并不重要，企业家只要用尖端的技术生产更多的物质资本就行了。有的人可能认为，基于效率选择和效率价格的市场效率是一幅过于静止的图画，缺乏动态增长过程的色彩和活力。

毫无疑问，资本创造、技术革新和充满活力的企业家，确实是市场体制获得成功的原因，只要看一看增长的事实，这些要素的贡献便一览无余。然而，企业家决不会为了增加产出而引进新的生产方法，也不会不顾人们的要求，不遵守以最低费用的办法创造新的资本。譬如，无论怎样有创造性，企业家们也不会公然漠视销售，而致力于生产堆积如山的空调或机器。由于他们要适应人们的需要，并且还要以最低费用进行生产，所以企业家们的精力、基本建设和创新都是为了追求增长和效率。效率价格能够使企业和消费者进行差别选择，如果没有这种差别化的选择，社会将会浪费它的电力、石油、劳动力等资源 反过来会使增长过程步履维艰

然而，当年的基本建设和技术革新对本年度增长的贡献比对

选择效率改善的贡献更多，这是否就不可靠呢？当然，原因是，它们会受到相对效率选择的引导。相对效率选择之所以有可能，主要是由于效率价格。社会不会在具有基本建设的企业家职权与为了增长的技术创新之间作出选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不会在具有基本建设的企业家职权和效率选择之间作出选择，因为前者的成功多半要受后者的指导。

我们承认市场体制有许多缺陷，也认识到所有的社会制度都受到严重的无效率的困扰，然而，市场体制可以被认为具有效率价格这个重要的与众不同的功绩。只有效率价格，才允许效率选择，它能使成本信息得到普遍的利用，能把成本信息强加给每一位选择者，从而使每一个选择者必须保证选择的效果而进行支付

要是效率首选要求选择者必须清楚成本并把它与接受的价值进行比较，那么这便会促使选择者去搜集成本信息，进而按照成本信息进行活动。由此，可以得出关于市场体制的第二个重要的与众不同的效率要求，即对所有的市场参与者的激励和促动。然而，特别重要的是，它对企业家们非同寻常的促动，企业家们会被激起来，去从事一些巨大的工程，甚至会产生一些完全新型的产业，比如像罗特希尔德银行集团、克虏伯军火业、盖茨软件业等。

根据效率价格提供的信息，参与者会竭尽全力去采取行动，因为这样做能使他们获得意外的、特别的好处。不管它是否具有公平性，也不管它是否严酷，等价交换的原则可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促进者，它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行为，只承认市场行为。如果把等价交换的动力与行政命令的推动力相比，则后者的缺陷更为明显。行政命令时常会引起愤怒，会引起人们的逃避，它不可能像市场体制的推动力那样，能立即激起追求自身利益的动力。

随着我们对市场动力的了解和熟悉，现在我想提醒几点。市场所能做的，绝对不是利他主义或善良的愿望所能做的。为了获

得效率，只是鼓励人们与邻居和平相处、做好事、努力工作远远不够的。对社会合作而言，激励制度应该要人们去承担具体的任务，比如从事焊接、门卫工作。即使是在最有利的环境中，利他主义也不可能推动对需要的各种不同任务的能量的分配。无论什么社会，市场激励能够，也确实能引导人们去从事无以计数的工作。

就人人被分配到每一项任务中所激发的能量来说，市场激励的力量是值得注意的，不过，尚需等待进一步的证实。市场交换为各种行动机会打开了大门，而不像中央计划体制那样把一切都规定在表格中。因此，许许多多的人，把他们最好的精力投入到了他们所担当的角色中去，并且可以相信，总是会以最有效的方式，去实现和接近适合于自身的目标。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逻辑，假如你想要一份好一点的工作，那你就必须好好地干。我个人认为，这还不能算是市场激励效率得到证实的结论，因为许许多多靠工资谋生的人，他们对好一点的工作的期望是如此渺茫，以至于难以推动他们做好现有的一份工作。

工厂的管理当局，甚至还包括权力主义者，常常对雇员专心干活的动机充满着敌意。我觉得，我们不知道雇员在工作中的冷漠、对管理的敌意、疲劳和失望，究竟隐含着多少无效。十分有可能，它是巨大的。然而，如果不存在市场体制，推测起来企业也可能被强制性命令管理着。权威有可能会蔓延到企业间的交换管理，扩展到企业与供应商及管理者的管理，另外也波及到基于市场协调的交换。雇员不能随随便便地离开单位，不像他们在市场体制中经常做的那样，相反却必须忍受强加的管理。确实如此，减少管理权威及其有问题的激励的途径之一，就是要在企业内部引进市场机制。

关于激励问题，民俗中有一些脆弱的教条例如，在某些圈内人士看来，严格的等价交换最能激起工人的生产效率。对此，我们

到底应怎样看待福利国家中松松垮垮的等价交换呢？如同第八章指出的那样，没有什么经验材料能证明这一点。也就是说，似乎应该否定这个看法，而不是去证实。

我们应该知道这样的事实，市场体制促使了成千上万的人成为企业家，它激发人们接受挑战，承担风险，抢夺收益，经受住损失。另外，它还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好处，即企业家精神。举个例子，市场体制会成倍增加和扩展创新的机会，不会像计划体制那样，把机会局限在少数等级组织的表格中。对为数众多的企业家来说，没有受限制的机会名册，没有看门人，没有监督委员会，不用靠他们来施舍机会。并且一旦着手一项风险事业，企业家也无须受到别人或其他企业是否同意和合作的限制，企业家总能找到替代的供给来源。当等级盛行的计划体制能够在各个层次对企业行使可能的否决时，在市场体制中几乎是不存在如此至高无上的权威的。为了实现目标，中央计划体制中的管理人员，按等级组织表给定的路线行走就可以了。可是，在市场体制中，企业家们能探索几十甚至几百条路径，当然，在这样的体制中，企业家也受到因供应商和消费者不满意而产生的令人不愉快的偶然事件的干预。

行动的速度和柔性，机会的广泛扩散，可供探索的多种途径，对颇具影响的企业激励是有所裨益的。这些激励措施，会激起倍增的创新活动，比如新型企业、新货物、新服务以及新技术的出现。说得极端一点，市场项目的操作规则似乎是：“只要有人希望这样做，那就动手干吧！”政府项目的规则是：“假如有人不希望这样做，那就绝不能做！”假如勒雷克（Norelco）公司打算生产一种新型的电动剃须刀，那它根本不必去弄清楚现有的制造商的决策，可是，海军想制定新型的海空防务方案，那么这项建议需要经过空军或国防部的投票表决。

市场体制对相互调节的其他形式能做的同一个理由，会产生

出很有说服力的主旨。比如，许多问题不是正面解决的，而是抨击比较小的、容易的问题的副产品。别看这些小问题、容易的问题，它们更有可能激起个人和集体的行动在市场体制中，收入分配或资本投资的配置，是一个需要经常作出的有分量的决定，但这种配置不会出现在台面上；相反，它是作为个人买卖决策的不经意问题的副产品而被确定下来的。市场体制最大的“决策”决不是决策本身，而是基于成千上万的单个的小型决策所达到的状态。它们不会因这些“决策”的规模和重要性而一再拖延。可是，如果没有市场体制，它们就会被摆上案头等待开会讨论如同相互调节的其他形式一样，市场体制能够以中央协调少见的速度行动着，就像现在通讯变革那样的令人头昏目眩的速度。

正如我观察到的，这些是市场体制获得效率的关键，即：一方面，由于效率价格使得效率选择有了可能，另一方面就是颇有影响的动机。不过，对于效率的叙述还有很多，仍然谈论的可能会导致不同于人们期望那样的结论。

关于卡耐基的材料，参考了 P. 约翰逊的著作《美国人的历史》。

第十一章 无效率

对服务和货物生产的效率要求，表明了市场体制某些性质的重要例外或局限。我不打算给出一个完整的罗列，其中的许多内容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另有一些内容太过于熟悉，没有必要再进行讨论。下面，让我们以一种平静的心情，来考察其中最富有启发性的东西，这便是无效率问题，它能激起强烈的感情和浮夸的过度行为。

一、溢出

或许最能说明问题的市场无效是，尽管效率要求收益和成本不管降临在什么地方都要被权衡，可是参与者们都只是权衡自己的一份。当然，话也要分两头说，大多数个体参与者也会为他们的家庭成员考虑成本和收益。可是，每一个市场参与者，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一般对收益和成本的权衡比较狭隘，追求通常所说的自身利益或个人利润。因此，如果由于建立航空港，使无法忍受的噪声破坏了周边居民的平静生活，我几乎不认为这样的决策具有效率。溢出是市场体制明显的、主要的无效率，以至于人们怀疑它的意义在一些地区究竟是怎样仍然被广泛否定的。

再来考虑一下体育馆中商人的例子。甲和乙都能受益的交流，如果仅从这一点上来讲，这样的交流是有效率的，但是如

果他们的利益损害了在场的其他人的利益，那么这样的交换还不能被认为是有效率的。如果甲和乙不关心他们进一步的交易可能给其他人带来的好处，那么他们之间的交换也不会是有效率的

溢出的无效性是十分巨大的，尤其是企业根据当代技术利用巨大的物质能量的不利效果。当然，溢出并不完全都归因于企业，伊利湖成了死湖，不仅仅是由于工业废物的污染，也是由于当地草场使用的化学肥料污染了水质。但是，受到过去两个多世纪技术变化的驱动，大型企业的不断涌现，确实不是偶然地而是典型地、普遍地造成了大量溢出的负担和成本。。每个工厂必须处理的废弃物给许许多多的人增加了负担，哪怕是那些似乎宽厚的企业也不例外。例如，现在有些企业为了避免溢出，把厂址放在隐蔽的村庄，并建立了门卫制度，这虽然避免了大范围的影响，但对附近的人仍然有危害空气和水质污染所产生的溢出负担，明显是排除不了的

既然燃料消费与其他化学排放物的溢出效果已经达到了临界量，如果没有政府的治理，有可能会导导致地球上人类生命的毁灭。现在，科幻作家和科学家都在考虑这一可能性。世界资源委员会同联合国开发与环境规划署共同研究的结果表明，世界正趋于走向“潜在的人类与环境的大灾难”。英国皇家学会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出警告：“为了维持生命 对地球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

企业施加的溢出负担的种类似乎比经济学用以辨别外部事物的手段更多，比如，对那些遭到顾客唾弃的企业强加了破产的负担，另外，这些负担也会波及到该企业的雇员和供应商。

每个人几乎毫无例外地为自己或为其家庭掂量着收益和成本，反映出市场体制效率讨论的巨大漏洞。考虑到溢出负担的普遍性，除了与更低效的制度相比，多数溢出负担似乎不是为了市场

体制的效率

我们能相信曾一度甚嚣尘上并且现在仍然在某些地区仍然保持着强烈影响的看法吗？这个看法是，溢出是不多见的。我们能否相信，典型的市場交换对人从事交换的影响很小，对集团几乎没有影响呢？我不相信曾有哪一个市場证明有关这些说法一直是正确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重大的能源使用技术通常都会产生广泛的溢出效应。开矿会破坏风景，高楼大厦会遮挡阳光、挡住人们的视线，电动修草机搅乱了宁静，汽车会带来拥挤、紧张甚至死亡。

当然，不喜欢工厂烟囱的烟尘、不喜欢邻居修草机吵闹声的人，可以搬到一个新地方去居住，但他们因此必须要承担搬迁的负担和成本，这还姑且不说他们来到的地方是否还像原来的地方那样受到他们的喜欢。

一些人反对溢出负担的意义，并声称溢出负担仅反映了微不足道的无形资产的损失，根本比不上我们愿意花钱去买的实体价值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由于溢出成本使人们失去的价值，难以同获得的服务和货物的价值相比。如果将开发一块空地带来的该地区的商业化和烟尘增多的损失，同有销路的货物和服务相比，那就显得很不重要了。那么，我为什么会看重并购买往返两地的车票呢？原因是，我住在城郊，能够享受到城里享受不到的空间。为什么我要花钱到干洗店去洗衣服呢？这主要是因为空气中的烟尘弄脏了我的衣服。拥挤和烟尘给我造成的剥夺，我必须花钱去恢复。由此可见，上述溢出的负担完全就是交通和干洗衣服的费用。

有不少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这些溢出就是外部事物，构成了市場体制的无效率。相反，他们认为，这些是证据，表明市場不会一直都能有效地扩大。假如享有清洁透明的空气、阳光和美丽景色

的权利能够进行划分并变成私有财产，那么，它们便能按市场规则来进行作价，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东西将是稀缺的和可以控制的，企业或个人如果干扰了我的视线，污染了我的空气，那就必须对我进行赔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每一个企业或个人将不得不在他们的市场决策中考虑到这些价值，决不会像现在这样对此毫不关心。

就现在市场体制中被疏忽的许多价值而言，类似于上述的“假定”是非常多的，原因是诸如此类的财产权一般不可能建立起来，像空气、阳光、安全的价值怎样确定呢。然而我却承认，在那些现在这些东西不常见到的地方，它的价值是能被确定的。例如，在泰国，通过把森林的产权划分给农民，从而减少了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由于承认贫民窟居民的财产权，使得该地区的居民能够拒绝把他们的地盘当作垃圾场，从而使该地区的卫生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新西兰，通过可传递的捕鱼权利，成功地扼制住了狂捕滥杀。按照这样的思路，可以相信，减少溢出的无效状态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我们可以承认，许多非常小的溢出同市场效率评价是无甚关联的，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社会的一切相互依赖关系都会产生大量的溢出。我很讨厌你有意对我的狗龇牙咧嘴逗乐，狗的狂吠会打扰我的邻居。生活在市场体制中的人，对于这些溢出并不会感到奇怪。如果某人想把市场体制不与乌托邦社会而与其他制度相比较，那么这些不可避免的溢出就可能被忽略不计。即使在乌托邦社会，也可能会允许许多有意义的溢出，因为我们不可能指望在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彼此被孤立开来，以至于谁也不会在偶然的情况下造成对对方的伤害。

一些观点认为，对其他人施加的有意义的负担，同时也可以被认为是人身自由为了我的自由，我同意自由说话的广泛的权利，

即使我有时会大大伤害了你。我会锁上我的家门以防范入侵者，哪怕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露宿在马路旁边。我们不会给市场贴上无效率的标签，因为它赋予了我们自由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允许对其他人施加溢出负担。

当然 政府一直在利用自己的身份 试图控制溢出 比如 对土地使用的范围及用途加以限制，治理废物排放，为雇员的健康和工作保障进行规划，调节职业期限等。试图控制溢出的频度表明，它们已经是多么的寻常，构成了多么大的威胁了。同时也表明，它们是希望得到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体制的。这样的希望有没有可能变成现实，这要看政府对大多数的企业交换的调节力度，还要看这个想法是否会引起多数人的反感。另一方面，假如政府的调节没有什么效果，这种可能性是要考虑到的，那么作为市场体制总体无效率的根源，溢出就是在所难免的了。在企业的影响下，政府常常会拒绝治理溢出，并且往往会保护企业制造溢出的特权。比如，它们会压制个人对公司的控告，有时候会设法掩饰对公司的公开批评

尽管反对声时常可以预料到，但应该注意到，如果同那些计划经济制度对资源的滥用相比，市场社会似乎还算是好的。假设一个社会，其生产由中央权威机构决定，那么只有当局会考虑空气污染和恶化，企业家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呢。经验证据表明，市场社会比奉行计划的社会，更注重保护环境，更讲究对环境舒适性的要求。据此，我们不妨大胆地推断，就全部无效的溢出来说，市场体制比中央计划体制似乎更在乎溢出问题，与政府调节相结合，市场体制比不借助市场体制的中央控制，能更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哪怕政府调节再有缺陷，上述推论可以说是正确的。

溢出负担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如果说上面所讲都是溢

出的反面，那么溢出的好处就是溢出的正面。例如，某个企业对它招聘来的员工进行培训，经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培训课程学习，其中一些受过培训的员工可能被其他企业挖走了，那么这些企业将享有培训的好处。再比如，你把一座漂亮的花园养护得很时兴，路过这儿的人便会得到赏心悦目的享受。这些不经意的好处，为数可能不亚于那些许许多多不经意的负担。

乍一看，溢出的好处明显是额外给予的东西，属于偶然使人愉快的效益。可是，从原则的角度看，它并不亚于溢出负担，这反映了市场效率中的不足。它表明，如果当事人在交易中考虑了溢出的好处，那么收益就能够扩大。因此，溢出的好处只表达了浪费掉了的机会。据此，一个有效的培训计划需要更多的超过企业提供的培训，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难理解，当企业决定对它自己的雇员进行培训时，它们便不会把溢出的好处考虑进来。政府职业培训计划的开展，是对这样的一个不足的反应。

溢出的好处和溢出的负担，几乎可以肯定是不能简单清除的，如果市场忽略了溢出负担，那么地球就会失去森林，就会失去新鲜空气；如果试验室无意中释放了一种致命的有害物质；对此，溢出的好处能抵消这些灾难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在未来的几十年，将会看到一个虽然迟缓但很严格的对市场体制的重新思考。

二、交易的终结

如果说花两个小时就能学会跳探戈，那么达成一笔市场交易至少需要两个小时以上，并且还要求每个人都是自愿行动的。但可能只需一方当事人就能终止市场交易，其结果是给另一方当事人施加了负担和成本这个负担在决策人决策时是没有考虑到

的，因而其决策是无效的。对旁观者来说，对不是从事交易的当事人的人来说，这不是溢出，而是由交易的一方当事人给另一方当事人施加的损失。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市场体制中某位雇员被解雇，成千上万的人从来不会担心这个负担将会落在他们的头上。解雇的遭遇决不会一生中只发生一次，他们在整个劳动生涯中，可能会一次次遭到解雇。这对他们来说该是严重的成本吧？当然，一切将取决于有什么样的可供选择的工作能够利用。市场体制理想化的模式要求，不能缺乏令人满意的可供选择的工作。然而，在现实世界的所有市场体制中，即使在号称实现了充分就业的社会，可供选择的工作的缺乏恰恰正是问题之所在。对负担的权衡，要视是否存在可依靠的保护而定，诸如失业补贴等。

市场关系终结所带来的多种多样严重的负担包括：企业离开了某个城市，地主逐出了佃户，雇主不发给雇员奖金等。

保守的观点认为，市场体制好比是一个竞技场，在那里人，与人能够从事有利可图的交换。然而，直率地讲，市场体制实际上既是人们从事交换的场所，同时也是把人逐出市场的场所。市场效率的经典论点，包括理想化市场的数学模型，指出了在具体的条件下对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净利益，但是它只是同非交易相比的交易利益。在一定的假定条件下，市场体制比非市场体制要好。这些观点没有指出在某个给定的市场体制中，人人从连续不断的交易和结局中获得的利益。事实上，人们不是这样来获取利益的

市场关系终止实际上是难以接受的。因此，许多社会都从法律上限制终止交易的权利。雇主有时被严禁在法律不允许的理由下解雇工人，如果雇主依然我行我素，则必须作出赔偿。地主只能在有限的原则下收回佃户的土地。在某些条件下，律师不能抛弃当事人。电话公司、煤气公司、电力公司对那些没有按时交费的消

费者，也不允许断然就终止服务。如果考虑到这些问题，显然很清楚，市场无效应该得到广泛的承认。

撤出或退出的负担明确地说明了俄罗斯和东欧其他国家走向市场体制的困难。在那儿，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他们在计划体制时代享有的固定不变的要求已经被削减了，他们对雇主新的选择可能会终止对自己的雇佣感到担惊受怕。

三、专制价格

尽管市场体制的效率主要取决于效率价格，但我们已经注意到，现实的市场体制对价格的确定，在某种意义上时常带有些任意和武断。实践中的做法，总是会降低市场体制对效率的要求。

专制价格有两个根源，一是垄断，另一是政府对价格的控制，其中，前者可能更为常见。尽管有很多抱怨，同我们平时所想的相比，垄断是无效的次要根源，因为完全垄断的状况根本不存在。卖方之间总是存在着竞争，相互之间的牵制，限制了对价格的操纵。尽管没有多少具有充分竞争的市场，在那里能够制定理想的和几近完全的效率价格，但是在大多数市场中，接近的情况是很普遍的，至少它们是可以接受的。每一个市场都不会是由单一的卖者控制着价格，都不会是寡头垄断。

我们设想一个这样的地方，它只有一条民用航线，你要么就乘这条航线上的飞机，要么就不乘飞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航线可供选择。如果是这样的话，该航空公司可能会把机票价格订得很高，另外，还会发生丢失旅客行李、有意得罪顾客等行为。但即使如此，航空公司抬高价格的权力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对某些价格和权力的滥用，你可以予以拒绝，如果觉得机票的价格过高，你可以乘火车或长途汽车，租一辆小汽车，乃至自

己开车，也可以乘船，如果这些你都不乐意，还可以呆在家里嘛。诸如此类的约束对航空公司来讲，是非常有效果的，因为航空公司将不得不考虑旅客很有可能不坐飞机而给它带来的损失。尽管由于条件限制你不得不乘飞机，但其他航线的旅客却不会遭到这样的待遇。

卖方对价格控制的能力，受到买方可选择的替代品的约束，在认识垄断时，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概念。顾客所有可能的支出，是对应的最小距离的替代品。购买 Hyundai 的替代选择包括：购买 Civic，重新装饰一下住所，进行一次豪华的度假，根据自己的积蓄能够购买的一些东西。对定价过高的早餐食品麦片，它的替代品包括另一种类的麦片或其他食品。

有各种各样的农学家，与此类似，一个养殖绵羊的大牧场主可能只是提供同样产品给购买者的数以千计的企业中的一员。竞争使得大牧场主们始终处于被替代的环境之中，对价格确定没有多大的权力。因此，许多企业为了获得一份左右价格的权力，总是尽力提供与其他企业多多少少有点差别的服务和货物。Geisha 牌罐装菠萝同其他品牌的菠萝有些区别，另外，在广告上的宣传差别更大。所以，企业对产品的定价持有部分权力，因为消费者难以准确地找出这个厂家与其他厂家产品中的相同之处。

企业可以组成卡特尔，甚至不知不觉地也会这样做。卡特尔是关于价格和其他策略的明确的或不言而喻的协议。通过卡特尔可以限制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强烈推动走向效率价格。专利允许价格操纵，许多许可立法和其他一些依法对贸易施加的约束，也有这样的功能。就所有这些方面的理由来说，由卖方造成的一定程度的专制价格，是贯穿于市场体制始终的。

由于专制价格给企业在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时带来一定的安全保障，另外还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回报，所以对价格的垄断权力

有时会激起技术革新，就这一点来讲，我们不能简单地、笼统地把它一概归结为无效。另一方面，当企业逐渐由提供货物转向提供服务时，垄断可能会变成具有剥削的性质。消费者经常受到电视修理商的摆布，他们不知道哪个部件需要修理，也不知道修理商究竟是怎样做的，而且修理商之间、修理服务之间也存在区别。于是，企业的蒙骗和漫天要价的机会就来了。这可能是比大公司过高定价还要有意义的的一个垄断问题

作为市场体制无效率的根源之一，垄断所导致的无效同溢出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和城市枯萎相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另外，也有迹象表明，垄断带来的专制价格对价格的扭曲程度，比不上政府控制价格所造成的破坏。市场体制中的垄断和政府对价格的控制这两个无效率的根源，往往是相互呼应的。比如，政府设立的关税，挡住了国外竞争对手的进入，这实际上承认了受保护企业的垄断权力其他的还有：政府通过许可经营，限制竞争性企业的数量以控制住竞争；受某些产业的影响，答应对一些公共物品如自来水和电力的价格实施调节等。政府在这些方面的行为，会使它堕入腐败。总之，政府在某些方面控制着垄断，但在更多的场合里却是垄断最重要的支持者。

广义上讲，垄断包括着惯例，而不仅仅是销售价格的控制。与传统的垄断相比，可以说惯例是无效的重要原因。比如说某个企业打算建造一座工厂，那么它需要同市政府当局谈判，同地方政府谈判，甚至还需要同中央政府谈判。企业通过承诺在该地区开辟新的就业岗位，以换取政府对税收的让步或其他补贴。这样的企业通过对市政府当局乃至中央政府进行投机活动，引诱政府与自己一道与其他企业开展竞争。欧洲迪斯尼乐园接受的法国政府包括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补贴，估计将达到 10 亿美元 目的是把迪斯尼乐园建在巴黎。一些不怎么富裕的小国，不仅为吸引海外的公

司承诺给以补贴，而且还修改法律以赢得这些公司的放心。实际上，如果以价格来衡量，补贴就是一个得到这份补贴的企业对某个社会“售出”的就业机会。对诸如此类谈判的研究，表明了一个一般的模式，即：社会为每一个承诺的工作支付了高价——有人做过研究，估计每一份工作的代价是 7 万美金，不过这些用代价换来的工作常常没有兑现。

暂且撇开垄断不说，政府对价格专制性的控制，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主要是通过明确的固定价格进行的，以使制定出来的价格能服务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在发展中国家有时会强行降低食品价格，以尽量避免城市居民的不安，须知，这些不安有的时候可能会引发骚乱。为了扼制住通货膨胀，无论哪个地方的政府，都会实行最高价的限制。如此具体的目的，其带来的效率上的损失可能值得也可能不值得。

尽管不是所有的补贴都有效果，但政府还是经常利用补贴制定专制价格。市场体制给各式各样的行业提供了补贴。补贴降低了这些行业的开支，使它们的产品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政治对补贴的压力是巨大的，常常都是为了最坏的理由。通过税收优惠或其他服务的提供进行补贴的，主要是农业、木材、矿业、石油、航运、渔业、畜牧以及电力，并且在这些行业实施补贴项目的数目是非常大的。在意大利，补贴可能占电力公司收入的 1/5 左右。补贴的效果贯穿于整个社会经济，构成了市场体制寻求分配效率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这里，我们还得承认，政府固定价格和提供补贴，明显地造成了市场体制的退化。在为数众多的民族国家里，泰国就是一个极普通的例子，企业通常利用政治影响和贿赂以获得来自政府控制的银行的低息贷款，或者在其他企业得不到贷款的时候，这些企

业却能够得到贷款

当然，补贴可以被用于许多良好的目的，比如：帮助贫困地区的低收入农民，支持前景看好的产业，鼓励像医疗保障这类服务的供给政府宣告补贴的目的，经常会得到赞扬，可是事实上，政府实施补贴的理由却是，补贴对一些集团或产业有好处，而这些集团和产业对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农业补贴名义上常被认为是为了保护低收入农民，可是几乎毫无例外地都给了高收入的农民或农业公司。

四、无知和非理性

效率价格和成本计算并不会使买方与卖方变得更加高明。尽管按照效率的必然要求进行了成本计算，可是市场参与者总会被普遍的非理性和无知弄得焦头烂额。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非理性和无知对所有的人都会产生影响。无数产品所构成的复杂性，经常搞得消费者根本无法知道自己究竟要挑选什么样的东西。试问某位消费者他能弄清楚装在包装箱里的某个品牌的洗衣机与另一台洗衣机有什么不同吗？他能知道穿白大褂的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吗？

通常，消费者根本不想去试一试找出有什么差异，相反总是在非理性的状态下进行选择，并且受到广告的左右和糊弄。今天出版的晨报上刊登一则广告说，某电话公司开展了一项服务——开通与情人联络的通讯线路，这好像其他电话公司就做不到似的。消费者生活在云天雾地般的真假信息包围之中，经常不能做到明辨是非。不仅仅是溢出，也包括所有市场参与者的无能力，才导致了像萨立多胺（Thalidomide）这样的药品所引起的意想不到的大灾难。

有的人或许对这些考虑嗤之以鼻，一味坚持认为，效率应该由消费者的欲望来判断，至于他们有没有能力知道想要或需要什么可以不作考虑。有的人或许会说，比起表面上能力十足的政府官员，一个无能为力的消费者可能是位十分好的选择者。然而，消费者们却认为他们时常是力不从心的。因此，在市场体制中，人们便会求助于政府，让政府来对他们所要购买的东西承担责任，几乎没有什么人相信，顾客总是能知道得那么多。

当然，每一个社会制度都是无效率的，因为人们包括家庭成员、消费者、企业家乃至内阁成员 经常会发生决策失误 即使他们拥有花代价搜集来的信息资料，甚至微不足道的个人决策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过分浇水导致了室内盆栽植物的死亡，教唆孩子撒谎以逃避父母的惩罚。无论是政府的决策还是公司的决策，都会给社会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根据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建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绝对是个错误。

这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决策失误，从这种角度来说，这样的决策是无效的。在许多人坚持的既定的价值标准下，欧洲货币单位——欧元也会产生错误。

不良的市场选择决不止造成简单的错误，比如生产的是大汽车，而消费者想要的是小汽车。不合实际的选择，将能引起巨大的浪费。买或不买这种小心翼翼的决策，可能会引发萧条，从而失去数百万份工作，减少社会产品产量。农民们在是否要灌溉土地上的精推细敲的决策，经常使土壤盐碱化，破坏了土地的生产力。按市场体制进行选择可能会发生的错误，似乎远不只这些，可以讲是无止尽的。

因此，市场体制总体上说是无效的，持批评意见的人说这样的话是正确的。为了处理社会中巨大的复杂性事务，任何社会制度中都会产生易犯错误的职位。问题多多，但人脑有限。再一次说

明一下，我们仅能指出市场体制的属性，如效率价格，这些属性使得市场体制具有了比其他社会制度更多的优势。

五、不平等问题

绝对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和财富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也包括地位和机会的不平等）。由于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市场体制产生了巨大的不平等性。据联合国估计，世界上 1/5 的人消耗了世界上货物和服务的 86% 而收入排在倒数 1/5 的人只消耗不足 3% 的货物和服务。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世界每年用于健康研究的支出总计在 560 亿美元，而只有区区不足 10% 的钱花在了世界 90% 的贫困人口疾病的研究上。须知，这部分人口经常会患上与富人们不同的病，比如热带病。在工业化国家中，财富方面的不平等性减小了，但通过实行福利政策而进行的再分配，绝对没有消除不平等。如果把属于再分配性质的收入也考虑进来，1989 年英国最富裕的 1% 的人，占了英国财富总量的 13%。美国最富有的 1% 的人大概拥有了美国财富的 22%。

然而，可以说不平等是所有大规模社会制度的一个特征，这同那些把平等写进蓝皮书的假想的社会制度是有实质区别的。无论是过去的市场体制，还是现在的市场体制，都没有大规模地消除社会制度中的不平等特征，有时甚至还加深了不平等的程度。尽管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和其他方法，只要人们或统治者愿意，任何现有的市场社会都可以显著地减少或重新塑造不平等程度。根据这些理由，现存市场体制的不平等决不能成为放弃市场体制的理由和借口。

不平等一定没有效率吗？或者像许多经济学家说的，不平等仅仅提出了公平或正义的问题而不是效率吗？我们应该还记得，

效率取决于有价值的产出与有价值的投入之间的关系。假如社会组织评价的结果采用了集体价值观 比如“一个好的社会”那么不平等便是一个效率问题。如果把市场体制看作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分配地球上和一个社会里所拥有资源的方法之一，那么人们确实会质问，高度的不平等能不能算是有效的分配？考虑到世界上多数地方处于贫困，小部分地区享有富裕，人们有理由会提出疑问，市场体制的效率是不是把如此众多的人口推向肮脏不堪的生活境地。

不平等究竟应视作公平问题还是效率问题，一些人没有被这个问题搞乱，另外的一些人却被社会摆脱不平等极其缓慢的历史进程所吓倒，这部分人喜欢不平等，并且倾向于依赖着它。还有一部分人虽然对不平等感到遗憾，但却认为这是激励所必需的，至少可以说是有效率的。另一方面，根据调查研究，许多人希望继续减少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在这些人当中不去抽象地思考分配的模式，而希望减少不平等所带来的具体的弊端，比如对受教育的障碍，不充分的医疗保障，上了年纪的人的收入无保障等。

不管是从抽象的角度，还是联系具体的弊端来考虑不平等问题，没有哪一个人能有说服力地宣称，市场体制具有可接受的效率而无需正视不平等现象。在对合作生产的货物和服务的分配中，市场体制服务于一部分人的需要和欲望，对剩下的人则很少考虑，说得极端一点，它使得数百万人没有得到基本的生活需求。对此，人们应该去妥善处理这个简单的辩解，即为了一个“好社会”按照无效率的方式分配资源，至于什么才算是“好社会”，则无关紧要。

六、企业的动机问题

最后要说的是，对市场体制的效率有很大贡献的动机的力量，经常会陷入无效的境地。我个人倒觉得，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过度发展的美国烟草业和瑞士银行业的经理们产生了不同寻常的道德沦丧。即使这些企业家的道德水准高于或低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然而他们的行为确实受到市场激励力量的支配。企业家们将会采用同样的决定和创造性地引进新的产品。类似地，假如政府不赞成企业生产的食品或者为了国内的消费者不同意企业生产的药品，那么这些企业将会把这些产品运往国外，在国外市场上大做广告，宣传其产品的特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溢出损失都可归结为企业家的无知，比如无视工业废物对环境的危害。市场激励清楚地告诉了企业家“不管是黑猫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其他的可以不管。

市场的促进力量，使企业家们使出浑身解数，创造性地进行争斗，永无休止地回避管制。另外，它还经常使企业家们发生贪婪和操纵行为。1991年在日本，Nomura 公司的主席、Suminoto 银行的主席和 Nikko 证券的主席，由于种种丑闻，统统被撤职了。同一期间，杰尼斯事件刚刚在英国料理停当，法国又不得不处理非法的内部人交易问题。

总而言之，企业的动机，不仅创造出可用于出售的产品，而且也会产生包括诸如病态社会和盗贼这样的“产品”。通过促进销售，也产生了使市场体制无效率的非理性和无知。由于动机的力量在给社会带来利益同时也带来了灾难，所以并不很清楚什么样水平的力量是合理的。我知道，还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现在的哪

一个市场社会，已经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动机力量水平。既然如此，一般地讲，关于市场社会中企业动机力量的水平具有高效率的任何判断，都是不成熟的，并且也不可能正确。

1. 关于环境灾难的恐慌和断言，参考 W·E·哈劳、K·B·泰罗编《21 世纪的经济：处在变化世界中的经济学前景》。

2. 关于溢出问题，S·彼得在她的研究中提出了证据——《全球性的恐慌：公司对环境论的攻击》。在这本书中，彼得指出公司不只对环境保护漠然视之，相反渐渐产生了敌意。

3. 关于不平等问题，参阅联合国发展规划署文件《人类发展报告》（1997）以及 C·R·桑斯泰因的著作《自由市场与社会主义》。

4. 关于不可靠的、不可接受的企业家的动机问题，以及美国、法国、日本和德国企业非法经营的参考资料，主要参考了 D·福格尔的著作《沆瀣一气：政治与企业之间令人不安的关系》。关于腐败的问题，参阅 S·罗斯-阿肯曼的著作《腐败与政府 成因、结果及改革》。

第十二章 太少太迟

若是不存在溢出，没有强迫的终止，没有垄断，没有价格固定，进行选择时不存在无知和非理性，没有动机缺陷，那么市场体制就一定能够获得高水平的分配效率吗？有的人可能会这样来考虑，但答案是否定的，除非把效率进行重新定义。显然，还存在着效率的障碍，因为市场体制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运行，可是许多有效的分配大多发生在这个范围之外。

我们已经知道，市场体制范围的主要限制，就是它只能协调那些自觉自愿的分配。市场参与者要想得到物品和服务，必须先要拿出好处作为交换的前提，并且买卖双方的行为完全出于自愿。市场体制能够协调一座摩天大楼的建造过程，能够协调 1 万名工人给投资者提供金融服务，但是不能协调为建造一条高速公路怎样去征用土地。说到底，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土地所有者肯定会被迫让出土地的。市场体制也不能完成货币收入和财富从一群人到另一群人的有计划地转移，它也不能解决父母无力承担教育费用的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为了做到这一切，市场体制经常需要来自政府的帮助，比如通过征税，重新分配收入，以便使穷人能得到产品。对有些任务，市场体制几乎完全派不上用场，比如，它无法召集一个代表小组起草一份章程，即使章程制定出来了，也无法保证章程的实施。

然而，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不是一个效率问题。一柄锤子不能

给孩子洗澡，也不传递电话信息，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说锤子是无效率的。与此类似，不可根据在市场体制力所能及之外的协调任务断定市场体制无效。当对市场体制的效率提出了广泛要求的时候，关于市场体制无力利用强制进行协调的问题又重新回到了效率问题上。例如，利用市场体制获得资源的有效分配，就是一个普通的一般要求。通过对这一要求的调查研究和反复权衡，人们发现它是错误的。最好应这样来说，只有当资源分配完全通过自愿交换获得了实现时，市场体制就是有效率的。换句话说，有限的市场范围同关于它的效率判定是息息相关的。

另一个对市场体制提出的过高效率要求表现在，认为市场体制一般允许人们通过自愿而非强迫的行动去追求属于他们自己的抱负，而不管抱负是什么样的。不过，正确的表述与此大相径庭。被强制在自愿轨道中的正是市场体制，为了抱负的实现，当自愿行动不充分的时候，市场体制将不会发生作用。市场体制的无能力，加上对效率更广泛的要求，从而再一次使之变成一个效率问题。

还有一个常见的评价过高的主张认为，市场体制是有效的，因为它能够反映与分配有关的偏好。事实是，市场体制最多只能反映可以用技能和财产表示的这样的偏好。随着技能和财产分配的改变，为市场所响应的偏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对市场体制中教育服务崭新的较高的评价，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已经考虑过教育的价值，它可能仅表明财产已经被强迫进行了再分配。再一次重申，市场体制有限的力量，剥夺了广泛的效率要求。

围绕着市场体制逐渐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它揭示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希望的强制性分配，因此市场体制实际上被确信是有效率的，主要是由于它没有强制的能力。可是，正如第六章已经表明的，要不是存在广泛的强制，社会不可能生存下来，更不可能达到繁荣。当然，社会需要税收，也需要强制，像隐含在选举中的程

序那样的强制，它会强迫被投票打倒的少数派接受赢得选举胜利一方的决策。

市场体制不仅不能实现为效率所必需的强制性分配，同时它的存在还会阻碍对政府等其他机制的有效使用。作为资源有效分配必要手段的税收，经常担当着压制纳税企业行动的角色。企业家们愤怒地指出，环境立法肯定会打击新的投资，甚至有可能导致一些企业走向破产。历史上，企业家们对政府禁用童工、规定工作时间、保障职业安全进行过同样的反对，并且还反对除此之外的政府的一切干预。有的时候，这些抱怨可能有点效果，有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不管怎么说，为了维持市场部门中较高的活动率，社会经常会在一些非市场领域如教育和健康领域中小心翼翼地采取行动，为了这些领域的活力，强制性的税收至少是有必要的其结果就是，市场体制领域内部的市场效率，是以其他领域的无效率为代价实现的。

顺便说一下 我们或许会注意到 对政府‘干预’此起彼伏的反对声，由于不完善很少能产生效果。征收收入所得税可能会使某位歌唱演员减少演出，这将因此会剥夺那些观众品评很高的演出的欣赏机会。总起来说，税收是不是无效率，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会不会对这些歌唱家们的选择发生影响，另一是税收基金是否会被用于减少资源分配中的无效性。

一、优先决定

为了获得效率，必要的强制除了税收和国家福利，它还包括更为重要的内容，我把它称为优先决定。优先决定超出了市场体制的能力，并且大大地改变了市场效率的要求。

市场体制要求有两套决策方案，其中一套由市场交易构成，另

一套由财产和技能在人与人之间分配的优先决定组成。优先决定来自于习惯、法律和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基本上是强制性的。这两套决策很流行，对它们的比较决不是现在与过去的比较。可以证实，社会中人身自由和财产权早在二三百年之前就得到了很好的确认，然而只有同现在的法律和习惯相结合，它们才能对市场体制发挥作用。今天，优先决定中的有些东西正在被修改，它们将日复一日地迈向未来。

在优先决定被确定下来之前，是不能进行市场交易的。市场交易不是白手起家，根据习惯法和产权法，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在属于你的财产得到明确之前，你是不能把它们拿到市场出售的。另外，在你的劳动力由习惯法和自由权法确定之前，你不能在市面上出售自己的劳动力。

尽管习惯和法律把一部分像财产这样的东西留给了政府，但是在市场体系中绝大部分财产理所当然地应该分配给个人。这种分配可能不仅仅是衣服，甚至包括土地、房屋、证券和应收贷款。在我们这个时代，关于自由的习惯法，通常会禁止违背他人意愿的劳动力买卖，历史上的奴隶制早已被封杀了。习惯法还力图取消一些职业 如职业杀手、毒品交易。

通过历史和遗产途径实行财产和技能分配的模式，在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某一社会可能实行对某一部分人的优惠倾斜政策，而在另一社会却会对另外一部分人实行倾斜政策。模式从来就不是完全固定不变的，但在某些方面，所有的市场社会都相差无几。他们无一例外地赋予了个人对土地的权利，而不是坚持土地都归集体所有。对公司财产的股份权也是如此。所有的社会对财产皆实行着不平等的分配。

那么，我们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对任何市场体制，我们不能笼统地根据市场交易来解释产出或结果的模式，因为模式本身总

是交易和优选决定共同采用的结果。例如，市场交换会不会产生于讲究排场的大笔费用支出，或者说，在必需的情况下，大笔的费用开支，是不是主要由优先确定的模式所决定的。

现今的一代人享受着上代人历年生产和积累下来的财产，在工业化国家，这样的积累如同小山一般。财产的分配，主要通过习惯和管理遗产的法律进行。总体上看，分配是不会考虑周到的，也没有被计算从而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共同好处这样的目标。除了基因不谈，我们每个人所继承的，基本上是由漫长的战争、征服、掠夺、欺诈和威胁的历史，以及关于产权和继承权的立法决定的。我是一位瑞典农民的后代，我的祖辈们拥有一些积存的财产，但随着历史上瑞典遭到了外来的侵略和征服，他们逐渐耗光了财产变成了农民，当到了我的曾祖父手里的时候，财产已经十分有限，仅够他移民到美国的旅费。法律最终交移到我祖父手中的财产更是有限，这些财产随后又为他的儿子即我的父亲所继承。可是，就是这么一丁点的财产在大萧条的时期荡然无存了。

第二个结论是，在任何时间优先决定的运作都不是有效的。它们主要由历史事件和继承法所决定着，本身并不服从于利益和成本的得失权衡。

从以上两个结论中，我们可以对市场效率进行一个重要的推断。在既定的一套优先决定条件下，市场交换至多不过给当事人提供了进行有效决策的机会。它们不会允许人们抹杀或回避优先决定的无效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效率实在是太少太迟了。当没有关注效率的早些时候的决策基本上已经决定了结果的时候，它也就注定是要完结的。由于要依赖优先决定，所以市场体制好像一辆小汽车，虽然拥有一台效率很高的马达，但它只有在有油的时候才能运转。

再来考虑一下体育馆中商人们进行交易的例子，假如有这样

一个捐赠人，把物品和技能分配给他们，商人从中得到的恩惠，既可自己使用，也可以用于交换更好的东西。捐赠者没有做出什么努力来使他的礼物适合接受人，也没有试图进行有效的选择。当当事人完成了他们的交换的时候，其结果每个人都将变得更有钱，或者至少不会比原来差。对此，结果可能不完全适应当事人的欲望和需要，这主要是受限于原始礼物的选择。由捐献者实施的原始分配是随意的、无效率的，并且交换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作改善。

有的人可能会在假设的游戏和现实的市场生活之间，试图作出一个严格的区分。对于游戏，人们也许会说，原始分配是随意的，除了使游戏能够开始进行外，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在市场体制里，对每个人来说，原始分配是给定的，即某人与一定的自由权以及凭借自身劳动力可能取得和拥有的东西。不过，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区分，每个人所拥有的东西，是分配程序的结果，就是说，是历史和现实社会进程的结果。它们创造出并且经常得到不断修正的权利，这种权利常被人们称为所有权或产权。喜马拉雅山脉绵延在亚洲的南部，但人类社会的分配却并不就是这样天然而成的，它们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并且还是基于市场交换获得的。冠以自由这个名称的权利，同样也是如此。人凭借自身的劳动获取享受是可能的，因为人能够进行优先决定，首先把自由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下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说明。设想获得对资产和技能进行有效分配选择的两种方法（对利用财产和技能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也是如此）。在某个国家，政府不把土地和资本这些生产性财产分配给个人和私人组织，为了在利用这些财产为本国居民提供满意产品时获得效率，政府官员通过制定计划把生产性财产分配到各个生产线上。政府官员们或许能获得有效率的分配和生产

计划，也许在大量的任务之下做不到这一点。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作为一个整体问题，他们都已接近了分配和社会资源使用的有效选择。在另一个国家，官员们根本不想劳心费力去制定一个有效的分配或生产计划，他们可能认为，这些工作属于他们分外的事情。因此，他们仅仅把生产性财产分配给社会成员，让接受者自己好好利用分配给他们的一份东西。那么，官员们是怎么决定每个社会成员应该分得的份额呢？他们主要是参考历史先例、其他社会采用的方式以及政治上可行的办法等，在这一过程中，官员们根本不会关心效率问题。通过对可能产生的结果的观察，他们发现接受者们利用交换和富有效率地改变自己的身份，创造出了市场体制。

对于第一种情况，由于所有的选择都要与效率选择打交道，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所能获得的效率水平，完全取决于官员们的能力。分配有可能会达到较高的效率。对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可能说对效率不抱希望。但能够怀着希望的，是社会取得了对原始分配的改善。从远景来看，这是个小小的市场发育要求。

简而言之，第三个也即最后一个结论是，市场体制实际上基本抛弃了资源有效分配和有效生产模式的可能性，相反，它决定了对无效分配作一定程度的改善。十分寻常，它使得选择避开了人的视线。但是，近年来，在俄国选择的过程一直引人注目并且公开化。在那里，在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引起了非同寻常的、残酷的争斗。人们纷纷想在从前归国家所有的资产中分得一份。权力、贪婪和腐败，正产生着高度不平等的财产分配。

我对市场体制根植于它的过去说得太多了吗？是的，我已经补充了那个要点，即市场体制有限的范围，是它获得有效分配能力的一大限制。

我还补充过，市场体制需要一系列的条件，比如产权法，没有

这些条件，它便不能生存，但这些严格的条件，同时也限制了它可能得到的效率。市场体制与众不同的效率就是有效的自愿选择，然而如此这般的选择却需要一套在此之前的强制性“选择”。要想得到市场体制的效率，需要社会承受优先决定的无效率。

我可能还要补充，通过再分配性质的税收和其他转移支付，如失业补贴，只要希望这样，市场社会一定可以大大改善优先决定的效率。根据它们与优先决定的串联关系，这将使得市场体制成为比它以前的效率更加有效的工具。在这里，再一次重申，我发现了一个可以相信的理由，市场体制比任何制度都可能更好。

然而，我还补充过，市场体制本身妨碍了优先决定的一些改善，否则它可能会使市场体制的结局更加有效。从这种意义上讲，市场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受到习惯和法律基础的局限，市场阻止了其中的许多变化，须知，这些变化有可能会使市场结果更富有效率。

二、优先决定的持久性

优先分配本身究竟是在此之前的市场交换的结果，还是通过法律和习惯得到的结果？比如，我拥有的财产，是不是并非由法律或习惯把它们分配给我的，而是我通过自己的收入买来的呢？是的，可能是我花钱买来的。然而假如是这样的，那么我的收入是由我在此之前的优先决定而完全确定的。法律和习惯禁止一些类别的提前交易。通过税收，它们决定了在我的收入中有多少数额我可以保留下来，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决定着我是否可以凭借我父母的财产进入市场活动。关于继承的法律和习惯，描绘着市场结果的一个巨大的先前决定。不回避死亡，也不回避对继承习惯法的每一位当事人的影响。不管数额大还是小，每一代人都是以受

到继承法明确规定的一系列财产开展他们的市场生活的。

人在市场体制中能够产生的，或者能够从市场体制中取出的，通常皆是先前分配交织而成的结果，这是一张网络，而且是一张非常广阔的网络，比我以前所讨论的都要大。只要政府大规模地修筑公路，福特可以给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低成本的小汽车，没有政府修筑公路这个条件，那么市场对汽车的需求量就不可能增加。如果大家都是文盲，盖茨就不可能提供他的微软产品和服务，他也不可能因此而变为一个亿万富翁。社会之所以没有变成文盲的社会，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得益于非市场化决策的结果，尤其是关于教育的立法。市场表现的结果，部分取决于先前的决定，它们永远不会被抛弃，永远不会寿终正寝。在有效的社会整合这台戏剧中，第一幕属于政府，在这幕戏中，政府半盲目地半无效地确定了优先决定，从而决定了下一幕戏的路线。第二幕戏属于市场体制中的交换，这是一幕非常长的戏，许多观众参与了进来，它不是向有效结局运动但最终会朝着这个方向。由于它被限制要把第一幕戏演到底，所以它难以获得那样的结局。第三幕戏又属于政府，政府通过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常常会利用易犯错误的办法，试图把每个人带到一个有效的结局。政府半醒半醉地认识到，障碍不仅是第二幕戏的失败，而且也在于自己在第一幕戏中的表演。这是一幕漫长的表演，其中，第三幕戏总是会变成下一台表演的第一幕，然后，一个新的三幕戏又要重写了。

1. 我清楚地认识到，许多经济学家不把优先分配看作是为了效率，而把它看成是为了分配中的公平。由于市场交换是自愿进行的，于是一些经济学

家便把它看成是趋向于某种状态的运动，在这种状态中，人人都能充分地进行交换，直到再也找不到相互有利的交换为止。这部分人认为这个运动是为了人类福利的重大结果，可以理解，他们希望把市场交换与进一步的可能交换区别开来。所以，这部分人仅能把相互有利的行动称作是有效率的，从而断言，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的行动是谈不上有效和无效的，只能说是公平和不公平。因此，优先决定确实没有无效率 and 有效率可言，代之而起的应该说有无公平存在。

2. 出于多种目的，这些人的观点是极其有个性的，然而对于我来说经济学家们试图套用“效率”一词，以说明相互有利的交换，未免让人感到有点遗憾。效率最普通的定义表明，某个选择或者是分配，只要做到得能补失，就可以说是有效率的。比如，现在要决定一块土地的使用问题，假如这块荒地用于娱乐项目的收益，不低于应征的税收份额，那么我们便可以断定这块地的使用是有效率的，哪怕大多数纳税人从来没有光顾过这个地方。类似于上述的判断总是不可避免的，对市场体制的评价不能没有它们，至于用什么词语都是无所谓的。

第十三章 自由之见

无论是在学术出版物中，还是在热烈的讨论中，关于市场体制的特征和优点，我读到或听到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市场体制不仅带来了效率，而且也带来了自由。

为了确定与市场体制有关的自由和解放的性质，首先，我最好来谈一谈这些词的含义。即使在极端专制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享有的自由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多。我们能完全自由地去做一切事情，不管这些事情是大还是小，只要不妨碍其他人即可，如我们做俯卧撑、自娱自乐地唱首歌。然而，仅有这些数量有限的自由还不能算是得到了自由。某些重要的自由，比如像自由演讲、自由选择职业是必需的。另一方面，对我们选择的一些严格的要求，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是剥夺了自由。多数人认为，人是自由的，即使法律规定要纳税，即使有应征入伍的义务。要意识到，我们都受到家庭、市场、国家和其他影响的约束，所以我们要划开界线。可以断言，有些控制和自由是一致的，但另一些却不是。

那么很清楚 说人是自由的 并不是表明一个简单的事实 比如人的身高或头发的颜色，而是说，被认为是重要和有价值的选择，不能被阻塞和封闭起来。由此，不禁要问，什么样的选择才算是有价值和重要的呢？人们的看法可能彼此不同。这些差别使得关于自由的分析陷入了抽象的幻境，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始终没有结论 尽管推理严密 阐述也很清楚。

在这一章里，我们不可能展开自由是什么和怎样才能获得自由的大讨论，然而，我们却能明确几点看法，它们对认识市场体制和自由之间的关联是至关重要的。在此，我打算将市场自由暂且束之高阁，尤其是，市场体制为政治民主创造有利条件和民主反过来又保护着自由的可能性。在不考虑政治民主是否存在的前提下，市场交换的性质究竟是扩大了市场参与者们的有价值的选择，还是制约着这个选择？

如果按照市场体制的定义来给出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那就相当好了。市场体制是自愿交换实现协调的一种方法。把市场体制与一个假设的废除了货币和价格的物质计划体制进行对照，我们可以看到，在物质计划体制中，没有选择的自由，有的只是行政命令，它才决定着应该生产什么样的货物和服务，决定着生产出来的货物和服务分配给谁，每个人应得到多少份额，决定着怎样把工作分到每个人的手里。在这种物质计划体制里，某一本书应不应该出版，你能否得到一册，将取决于行政决定而不是是否存在能自由进行选择的购买者，比如你可否从曼谷的车行里购一辆巴士开到你在郊区的公寓去，或者在回家的路上捎带几样杂货，这都不取决于你能不能花得起钱，而取决于是否得到了允许。

无论人们怎样推敲“自由”和“行政命令”这些字眼，从行政命令和市场选择之间引出来的差别是一致的。这种差别还可以这样来讲，即行政命令和诱因之间的差别。市场关系主要是诱因关系。根据随便什么人对自由的认识，市场关系带来的自由，远远超过行政命令关系的自由。不过，前提需要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并且还要弱化。

一、没有市场体制的市场自由

第一个限制条件不是微不足道的。许多——如果我们能数一数的话 我们可能会说 大多数——市场自由都不需要以市场体制为必要条件。在没有市场体制的时候，自由依然可以得到。在没有货币的物质计划体制不允许自由选择时，我们便很容易想像使用货币的非市场体制却可以做到。

职业选择自由和消费选择自由，是为大多数人所实践着的两类市场自由。在没有市场体制的场合，中央计划不仅承认它们，而且还会寻找很好的理由来这样做。

（一）非市场体制下的职业选择自由。在已经制定出各种产品的生产方案之后，计划者不得不吸引工人开展生产，他们可能会起草一个方案，把劳动力分配到每一个计划好的岗位、公司、行业和地方。相比较而言，招聘到自己愿意和有素质的工人是比较容易的，难得的是如何通过劳动力管理部门，把人分配到合适的工作中去。制定一个详细的征兵计划已经够困难的了，那么要为全部劳动力制定分配方案简直让人难以想像。相反，工资提供者一般不是用强制和征兵那样的手段，而仅凭工资诱惑吸引雇员，从而招收到必要数额的工人，对那些难以招到劳动力的岗位，可以通过提高工资来进行招募。工人们会积极响应工资提供者，在各种工作之间作出自由的挑选，就像在市场体制中的做法一样。

在中央计划体制中，职业自由选择有时有几个，这绝对不是假设的。如同前苏联的计划者们，当局会采取征召的办法，以及其他正式和非正式的强迫，包括强迫城市居民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曾大规模地这样干过。可是，它们也曾有选择地广泛使用过职业的自由选择。它们采用的工作分配方

法是混合的。市场社会也会限制职业自由选择，比如征召服役人员，将那些由国家支付费用培养起来的医生派到农村地区去工作。

（二）非市场体制中的消费者自由选择。在计划的产品生产出来之后，中央计划者们必须设计出分配计划产品的方法。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同等份额的商品和服务，必将造成很大的浪费。有一些人需要适合小孩穿的衣服和玩具，另一些人可能需要学校教师提供教育服务，而其他的人需要老年病学方面的医生。通过凭证实行配额供给，这是笨拙的、浪费的并且也是令人烦恼的做法，由此便会产生黑市交易。在中央计划体制里，分配产品最简单最容易的方法，就是给每个人分配货币收入，不管方式是否平等，人民和统治者都希望这样做，据此，可以把生产出来的产品拿去卖，这将使得每一类产品市场皆十分清晰，并且可以保证消费者像市场体制中同样的自由选择。

再次强调，这不仅是假设的，因为在计划制度里实际上也实践着消费者自由的选择，只不过范围不够广泛而已。比如，在这样的制度中，经常会分配住房以及分配其他物品和服务，由于随意地压低价格，从而引起供给短缺。其结果是，消费者不得不去从事简单的市场买卖，并且试图同供给者保持关系，甚至非法的关系。但是，人民通过市场选择获得了范围相当广泛的货物和服务。不是缺少消费者自由选择，而是由于专制的存在，才导致了计划制度的不自由。

假如独裁主义的制度实现了广泛的消费者自由选择和职业自由选择，实行民主计划体制，假设它们似乎是这样的话，那么它们也能做到，并且范围要多广有多广。我提出这样的看法，并不是提倡诸如此类的制度，而是想弄清楚这些市场中的自由程度，尽管它们需要市场，根本不需要市场体制。当然，民主的中央计划体制，不完全都是假设。今天的市场社会，都带有一定程度的生产“中

央计划的痕迹 此外还包括补贴、调节和禁令 从商业步行街到医疗保障，莫不是如此，从而给政府一双强有力的大手，使之能够左右资源分配和产出决定，但却保留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自由根本不只属于市场体制，它们既可以在专制形式的中央计划体制中找到踪迹，也可以在民主的中央计划体制中找到表现的空间

一个司空见惯的结论不能回避。当计划者们给消费者提供了自由选择由中央决定已生产出来的货物和服务时，却不能提供给消费者们相应的主权，即经济学家常说的消费者主权根据定义，中央计划体制否定消费者主权。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两种体制的区别。其中，前一种体制是消费者可以在计划者们决定生产的那些物品中进行选择，而在后一种体制中，生产应按消费者的购买偏好进行。尽管这两种体制都实行消费者自由选择，都使用消费品市场，但是只有市场体制才能实现消费者主权。

人们或许相信，假如消费者的选择不能控制生产，那么消费者实际上是不自由的。至于无论多么自由地对中央主义者计划生产的物品和服务进行挑选，都是无关紧要的。在任何普通的自由范畴之下，我认为，这样的见解几乎不可能坚持下去。在市场社会中，你根本不可能对国家的宇宙空间探索或道路建设的投资产生影响。但是，做不到这些不要紧，因为它们不妨碍你的自由，尽管你可能会因不能控制政府官员的决策而时常抱怨政治上的不自由。我怀疑法国和英国的大多数消费者，甚至不知道在他们的国家中牛奶产品和其他农产品，是否受到了消费者的购买量和政府对这些产品提供的补贴的控制。他们不会考虑他们的自由受到了威胁，因为不管哪一种情况，他们都能自由地去进行选择。确实，生活在民主社会的公民，常常会要求他们的政府去决定产出和投入，例如，他们通过纳税和支出，要求政府而不是消费者来决定水

利灌溉、航空运输或其他产品的生产。在民主政府中 官员们制定某些产品的生产计划，决不会成为被指责造成不自由的依据。我们可以想像得出 在一个高度民主的社会里 它会把产出和投入的决定权完全留在政府手里，并仍然能广泛地实行着消费者自由选择。

二、专制型企业

所谓的市场体制和自由之间的关系的第二个限制条件是，许多雇主只有在他们不工作时，才把他们自己看成是自由的。关于市场支撑自由的任何主张都必须考虑到工厂中的非自由现象，工厂内部实行着命令体制 如同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 工厂是市场之海中的专权之岛。

针对厂方限制雇员自由的传统指责 辩护者认为 这是雇员愿意接受的，他们以此来换取工资收入。对这个辩解传统的反应是，市场体制要求人必须同意在工作期间放弃他们的一些自由。即使交易能够自由进入，但它也只能是出售部分个人的自由。在不诘难基本的大致真实的条件下，这两个见解都是正确的。

当然 在非市场化社会中 工厂也实行着命令体制。非市场化的工厂当局同市场体制下的工厂当局没有多大差别。假如等级制组织对某些生产线来说至少是必要的 那么 不管是非市场体制还是市场体制，都不可避免地要承认服从当局的权威。有一部分观察家对生活不愉快的事实不予考虑 闭口不谈自由 而另一部分人把等级制度、权威和服从看成是对自由最深刻的限制，这是个悲剧，即使在市场体制下也难以避免。这两个见解，并非不赞同事实。有的人建议在分析情况时不愿一味使用自由这个字眼，可是另一部分人却决意要加以使用。

不管怎样讲，企业不是一个不受约束的独裁者，因为管理者一般只是希望在组织生产的工作时间内使用必要的命令手段，在工作时间之外的命令就无效了。然而，在工业化社会里，在工厂之外的对自由践踏的证据也大量存在，如企业的管理人员会试图使雇员们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投票选举等。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管理专权主义者依然喜欢自成一体、与世隔绝，拥有本公司的商店和住房。

管理专权的主要约束来自雇员的辞职，它是怎样约束管理的，取决于雇员可能寻找到的替代工作。如果这些约束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政府立马会对工厂实施控制。在所有的市场体制中，持续不断的对工人参与管理的要求，已经表明了对工厂权威的不满意。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实现“工业民主”的强烈呼声其中德国的企业雇员监督委员会算是典型的一例。

如果对工人的争夺十分激烈，那么一个对工人要求过多的雇主将难以留住雇员。大致上不可否定高压统治的潜在性，因为作为一种一般性的策略，雇主能够有选择地实施强制，它能做出一些雇员不可能做到的行动 比如解雇“煽风点火的人”解雇工会组织者。

三、交易中的强制

关于市场体制和自由之间关系的第三个限制条件是：除了工厂专制之外，许多种类的市场交换强加了无法躲避的负担，如果能自由选择 这些负担本是可以被拒绝的。

（一）溢出。溢出会导致无效率，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强制。一份晨报报道了曼哈顿公寓住户的烦恼，他们不喜欢新公寓房屋的高墙挡住了他们眺望哈德逊河的视线，挡住了阳光。市场体制不完全由自由选择者所组成，随着不断的、大量的移居，人们

被迫接受着由其他人造成的有害选择的后果。

(二) 终止。由于市场交换的某一方的终止行为，市场自由被迫遭受侵害。被顾客抛弃的企业的破产，就是消费者对企业家进行自由选择的一个例子，在这个时候，企业家是做不了主的。被解雇掉的雇员不能参与自由选择，在这一点上，雇主有选择的权力。我们能否漠视这个强制，而坚持认为雇主没有义务继续提供工作呢？是的，雇主没有这样的义务。因此，解雇是被强迫的。更为糟糕的是，解雇的威胁经常被用于其他强制的工具，比如阻碍雇员参加组织工会的自由。

(三) 被迫工作。市场也会强制人们去工作。不，根本不会强制的，有的人可能这样来进行反驳。工作仅仅是生活的一种需要，大多数人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参加工作。问题是，难以回避的是自由还是强制这个困难等价交换的原则告诉我们，在市场体制中，为了生存下去，人必须做出一点特别的贡献，它是可以进行买卖的东西。没有其他的选择，除此之外别无出路。在市场体制中，大多数成年人要么在工作中生存，要么是在无所事事中死亡。假如这就是生活的现实，那么在任何制度里，不管是市场的还是其他的制度，大多数人都必须被迫去工作，市场体制不过是实现这个强制要求的途径之一而已。从这个方面来说，市场体制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不是因为它留给了人民自由，而是因为它没有留下自由。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赞成市场体制，因为它能强制民众参加劳动，汤森曾指出是饥饿‘无声的、持续不断的压力’帮助实现了这一点。

(四)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性。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不平等意味着允许一些市场参与者压制其他的参与者。由于缺乏收入，有的人感到压力很大，以至于不得不卖身为奴，或沦落为妓女。当不平等发展到极点，比如一贫如洗的时候，发展到不能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時候，养不活孩子和老弱病残的时候，许多人就会断言太不自

由于如果不平等的程度不过分，那么有的人就会认为自由没有遭受损失。有的人认为，低收入不会引起人们不自由的反应，只会引起一些不太多的特权。然而，大多数人却认为，即使不贫穷，但由于缺少收入，可能会造成不能自由地去上大学，不能随心所欲地寻找好的住处，甚至不能自由地寻找理想的工作。

（五）市场地位的不平等性。每个参与者在市场交换中的影响和势力的不平等，同他们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常见的也是比较重要的这类不平等，便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可是，它超出了专制不自由的范围。有能力雇佣数百、数千个雇员的雇主，很容易拒绝任何一个申请者的就业要求，并且经常能够迫使申请者接受雇主开出的条件。对于一位发展前景看好的雇主，申请者没有相应的讨价还价的权利，除非该申请者具有某种特殊的才能，或者能够提供特殊的服务，以至于雇主如果不雇用他就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因此，雇主的权力压倒了工人的市场权利。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工作申请者们经常被强迫去接受工作条件，在他们看来，这些条件多少带有强制性，包括对健康和安全的低风险

市场有助于自由的主张，其依据的假设是，每个买者和每一位卖者都能找到替代。买者将不会受到压迫，只要他们能够从其他的卖者那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只要他们不依赖于惟一的卖者。同样地，卖者也是自由的，只要他们拥有大量的消费者或雇主，只要他们不依赖于惟一的买者。然而，替代常常是有限的。垄断是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地位的不平等，市场关系中的恫吓、强迫和强制因而十分平常。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至少会有这样的体验，即在同公司打交道时，它根本不关心我们作为顾客的抱怨。假如企业打算忽视我们，那么它拥有的财产和收入就会允许它心安理得地去这样做，我们常常被迫接受挫折和被击败的事实。

（六）无知与操纵。如果选择者没有认识到他们有可供选择的替代品，在他们进行挑选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选择是无效的吗？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是一个不自由的两可事例。如果市场参与者蓄意否定信息、发出错误的导向或混淆是非以控制其他人的行为的话，挑选者们可能愿意承认是强制。在促销活动中，这类情况比比皆是。然而，即使在这种场合，挑选者将更有可能声称，选择不是纯粹自由的，我们经常将其与自由相联系的正是无价值的选择，或者说是退化的自由选择。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将其称之为强迫性的，尽管许多批评家这样认为。总之，我们不能唤起对自由的单一的定义和解释。

假如我们说受到操纵的促销会阻碍更加真实的自由选择，那么正确观察事物互相关系的能力就要求我们要承认政治选择也是退化的。政党和候选人不想去摆脱偏见，但希望能控制全体选民。在他们传达的东西当中，他们有意地引导人民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投票。从这个侧面来讲，他们与那些竭力想控制人们的销售商相比，根本就没有什么二致。他们会转移人民的视线，搞昏人们的头脑，阻止更富信息和更有思想的选择。现在越来越多的政治操纵，也采用了像促销那样的伎俩。这些惯用手段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人们的指责，在市场体制中，操纵行为弱化了自由选择。相反，他们却认为，精英对大众的操纵是与自由选择开战，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发现这种观点 如在市场、政治界、教育界、宗教界乃至在科学界。

有关这些方面的考虑是不是低估了市场体制所允许和鼓励的自由呢？我们应该正确地说，自由事实上在西欧、北美的市场体制中一直没有被削减，因为政府在许多方面已经着手去保护市场本身不能保护的自由。政府不允许人卖身为奴，它们对雇主解雇雇员施加了限制，比如提前通知、支付解雇工资。工会和其他私人组

织也经常进行干预，它们和政府的干预一道，使得市场对自由的冒犯重新回到自由的轨道上来。

四、其他的两个告诫

把贫民窟变成干净的地方，为贫困的老年人提供住房，这一切都要求来点强制，至少要向人民征收必要的税金。有人可能提出，一个自由的人需要去追求集体的事业，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他们就不是自由的。注意，这看起来就像变戏法一般在上面的叙述中，我已经将话题从个人选择的自由，转向了集体选择的自由，它表明，如果重要的集体选择没有被公开，那么人们仍然是不自由的。作为一个人，只有在合适的条件下，大多数人能够强迫少数人默认的时候，他们才是自由的。

我们已经认识到，市场体制，没有给强加的带有集体性质的压制留下空间。关于市场自由的要求，把个人选择与市场体制联系起来，但集体性质的自由选择却保持了沉默。它们没有正视自由人的社会与自由的集体之间的差别。尽管你和我个人或许能在市场体制中进行自由选择，但这并不必然有“我们大家”也能自由选择。市场体制给我们的并不都是自由，比如：要一个家庭把它的土地让出来修建公路，强迫每个孩子接受义务教育。只有在充分的民主政府统治下，人们才能得到集体选择的自由。

我曾经提到过，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不仅是各种各样自由的数目的多少，更关心它的内容实质和模式。现在，我再补充一点，我们不要把单个个人的自由和机构的自由搞混淆。一个社会如果承诺广泛的机构的自由，那么这个社会将会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警察部队的自由、议会的自由，这只是梦幻般的想像，好比是让税收官僚和空军实施自由一样，令人难以置信。机构或组

织，包括政府的和私人性质的，必须置于能坚持履行自身义务的控制之下 要限制它们的权力 否则它们就会逃避义务 进而蛮干 无法无天。对所有的各类组织，包括政府机构、工会和慈善机构，这一点都要坚持。

对企业组织来说，也要坚持这一点，要对它们实施监控，不能授予广泛的自由权。没有什么人希望企业和企业的经理们放任自由。市场体制之所以能够运行下去，主要是因为企业受到了来自其顾客、雇员和供应商们的控制，另外还包括政府的控制。自由的企业，就是不受市场控制，不考虑人们的需要随意组织生产的企业，对此情景，我们简直难以想像，即使想像得出来也毫无意义。社会需要的企业，不是为所欲为的企业，而是受到控制和约束的企业，能够满足人民的欲望和需求。

这一章的论述，没有给市场体制对市场自由的影响提供一个完整的分析。可是，我们已经抓住了市场体制与自由之间的基本联系。毕竟我们已在路上走了一程，继续前进吧。

市场体制的拥护者们毫无顾忌地宣称，自由而不是效率才是市场体制的特征。这可能反映了这些人考虑问题的优先次序，也许仅表明自由比效率更容易讨论。总之，有两个人比较有代表性，一是新近去世的奥地利经济学家 F·A·冯·哈耶克 其著作《通向奴役之路》享有广泛的读者。这部学术味很浓的书虽然传播着同样的主张，但似乎更深刻和精致。另一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 M·弗里德曼 其代表性著作有《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个人声明》。在这两本书中，弗里德曼虽然突出地表明了自由的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市场体制中自由的分析水准比不上哈耶克，同时也难以与他本人在货币理论方面的光辉著作相比。

第十四章 个性与文化

对市场体制会影响个性和文化的焦虑，我没有听说过，相反却听到过许多这样的声音，即市场体制给我们带来了繁荣和自由。然而，对一些市场体制的观察家们来说，他们确实关心着市场体制下的个性和文化问题。

带着崇高的评价，市场人庆幸得到了职业和生活方式的各种各样的选择。他们能确切地知道他们作出的每一个选择的代价，他们能够自由地进行选择。多么美妙呵！但是，他们一直是处于最好的状态吗？一百五十多年来，许多批评家们认为并非如此。不仅马克思持否定态度，就连批评家罗斯金和心理学家弗罗姆，以及社会科学哲学家马尔库塞这些人，也同样持否定意见。亚当·斯密本人时常怀着悲叹，他承认市场在投入方面具有效率，但对市场日常中的效率感到惋惜。如果听一听这些人对过度贪婪的批评，或者重温一下亚里士多德的警告，那么可以发现市场中十分混乱的场面。假如历史上女性的人格没有被玷污，那仅仅是由于男性从事着市场活动，而女性一直在家庭担当着家庭工作。

批评家们究竟是怎样对市场人写真的呢？他们认为，市场人过分追求生活的低价值而不是高价值。他们承认市场人对食物和住房的追求，但不赞成市场人仅为个人的缘故而过分追求更多的物品、服务以及金钱，以至于排斥了心灵和精神上的东西。对经典的占希腊人的价值观，如真实、善良和美好，市场人几乎没有给予

考虑，相反却竭尽全力地追求着低级的、腐朽的物质至上的价值观。

市场人的心胸相当狭隘，精于对自己有利的计算。市场人殚精竭虑地玩弄狡猾的手腕，他们的思考方式常常引起人们的反感。他们所奉行的道德标准不是东正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倡导的善行操守，而是一切为了个人自己。

市场人是自我主义者，并且还是不太高明的自我主义者。他们对市场优势狭隘的追求，使得自身变得十分愚钝和浅薄。市场人对成本和家庭生活开支十分敏感，他们从来不承认孤独，无论多么困难，他们总是会考虑到“我”而不是“我们”。在市场体制的所有参与者中，企业家作为其中的典型之一，在以上各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完全具备了以上的各项特征。问题是，谁会钦佩他们的成就和这些方面的特征呢？

我承认上面对市场人的写真，然而，就算这幅面孔我们经常能遇到，那么它是否具有代表性呢？假如它具有代表性，那它代表什么呢？不一定是市场体制，或许是工业化社会中的城市人的代表，也许包括市场体制，也许不包括。写真表达了绘画人对现代生活某些阴暗面的蔑视，尽管他们可能没有认真地探索其中的根源。

批评家不知道他们画的像与市场体制之间的关系，削弱了我们在这一章里要探讨这个问题的勇气。我们知道得不多，因此我们不能得到这样的结论，即市场体制究竟有没有使个性和文化走向堕落。然而，通过对一些典型主张的调查，我们能够证明，批评家们闭门造车，炮制的是带有感性认识和非感性认识的毫无说服力的混合东西。即使到本章的结尾，我仍然对市场体制对个性和文化的影响，不会知道得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多。可是，在评价指责的严重性中，在评估我们究竟不知道多少的过程中，在决定什么样的假设最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所收益。

从柏拉图开始 无数的哲学家和理论家 包括马克思、缪因、斯宾塞和涂尔干在内，已经划出了世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之间的区别，就像托尼所做的那样。粗略地看，他们区别了人类和平和合作性联合的两种形式。其一是，基于亲缘的、共有价值的和钟爱之情的多面关系，其二是，基于单向关系和处心积虑的正式组织。前者采取了公有制形式，而后者采用了像国家、官僚机构、公司这样的正规组织，它追求的是与公有制生活迥然不同的目的，也不是组织本身。在西欧和北美，在最近的 300 年中，他们认为这些地区的社会正在由第一种形式向着第二种形式过渡。

尽管这种转移与市场体制的兴起是同步的，并且几乎可以肯定它改变了人的个性和文化，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断言市场体制对此要承担责任，因为这个转移同时也与工业化和技术革新陈陈相因，此外，还包括城市化和官僚主义化。尽管有一个很长的时滞，但是似乎可以肯定，转移还同政治民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假如我们认为，这些变化相互之间提供了滋养，那么应该区别究竟谁是原因谁是结果。很清楚 在前苏联 工业化、城市化、技术革新和官僚政治组织，基本上都是在与市场体制无关的轨道上运行着的。因此市场体制既不能被认为是原因，也不能被认为是结果。这便给想从市场体制中寻找有关当代个性和文化方面问题根源的任何假定的信度造成了损害，也就是说持这样看法的可信程度大大降低了。唉，非但没有找到联系，反而让我们头痛不止。

如果许多人想到他们要在当局的监督之下从事工作，那么可能有人会把这个具体的变化归结为是由于大型商业和产业组织的出现。非市场体制组织的大企业，并不亚于市场体制中的做法。生产中的官僚主义化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在计划体制中存在着，在市场体制中也存在着。老板式人物决不是市场体制中仅有的特殊动物。

有人甚至可能对历经 300 年的转变有疑问。在由公共制社会到有目的的组织世界的变化过程中，市场体制通常被看成是属于后者的世界，而不是先前的世界。市场关系采用了多边的形式，在大多数成人之中实行着交换，它们决不仅限于正式组织中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相信，市场关系不会是具有传统型社会特征的那种关系。可是，同传统型社会一样，它们也采用了把人联系起来的多边控制的蛛网形式。

如果 300 年来的事实一直这样提醒着我们的话，通过对社会的两种形式即公有制和有目的组织之间的比较，或许可以证明是更加有效的。并且，我们会发现，对传统社会与主要由有目的政府当局协调的具有同样性质的社会的悲剧性结局的比较，是没有错误的。除了法西斯和公有制社会，变化不会那么深远，由此产生的第三个选择就是市场体制，它提供了超出社会可能性的大规模的社会协调，并且还不需要人们从属于有目的的组织。正是由于市场体制这个第三种选择，避免有目的的专制政府才有了可能。在当今世界，作为人和组织遍及社会的协调者，市场体制保留了早期社会的一些重要特征，尤其是保留了社会交换的多边特征，从而使有目的组织的单边权威减小到最低程度。

一、假设

根据上面的告诫，我们可以来考察市场体制对个性和文化影响的几个假设。

（一）唯物主义与商业主义

首先来讨论第一个普通的论题，即市场体制会促进参与者追求物质结果。如果从字面上看，这个论题被滥用了。如同在第六章中所指出的，其实最终结果是非物质性的，换句话说，就是非物

质产品。最终追求的是心灵的状态，比如像安全感和满足感，也包括友谊和冒险的快乐事物算不算物质呢？是的，它是物质，但是它在物质上的质量、重量、体积和形状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所需要的，是那些非物质的、无形的东西，比如满足、味道和好奇等。衣服呢？显然属于物质，但是我们穿衣服一要合身，二要有助于展示。那么，难道我们追求心灵的状态就不需要物质产品吗？是的，就像一切生活那样与物质目标的需要相比，心灵的状态可能更需要服务。一位贪得无厌的市场参与者会追求物质目标，但他似乎更贪求医疗、法律和金融服务，以及银行存款、股票和债券带来的收入与财富的权利。在我们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利用了一些东西，如服务、观念和决策，这其中，物质上的目标只是当中的一类。

市场体制促使参与者走向物质主义，常常是一条不雅观的途径，以至于人们说它促进了参与者追求金钱，或者是能够用钱买到的那些行为和东西。这是一个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观点，它表明了文化中过度的商业气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腐败。

在市场社会里，货币是交换的重要工具。谁能否定市场体制下的人不会围绕着它转呢？问题是，怎样看待我们对货币收入的重要追求。从一定角度来看，货币是一个伟大的解放者，它为广泛的选择开创了道路。当然，货币也有局限性，它不是万能的，在其有限的能量之下，它可以帮助人们赢得朋友，找到内心的安宁，获得千古流芳。人们时常为了这些目的花费金钱，比如他们当中有的人给学校捐钱，以换取在建筑物上刻上名字，有的人甚至已经在挖空心思冷冻自己，以便在一千年之后还能活过来。在市场体制里，如此众多的抱负有了钱都可以办到，人们会精明地制定花钱计划，然后便付诸实施，把钱存起来以保证一切可能的开销。然而，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幅选择范围广泛和充满理性的画图，而不是

对个性和文化的腐蚀。

然而，这仅仅是一小步，有可能会永久地拖延对许多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思考，有可能会因对金钱的追求而放弃所有其他的选择。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下的陷阱是，隧道中的生活实际上可能更为普遍，并非不常见。有些搞得比较好的调查研究似乎表明，在市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他们对有挑战性的工作、友谊、孩子与家庭生活快乐的追求，超过了对金钱和商品的追求。这类研究对市场体制会腐蚀我们的理想的普遍见解，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挑战。

有可能人们会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对金钱和能够购买到的东西上，可是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理想和抱负已经变得狭隘了，而是由于通过市场体制比通过政府和民间社会更容易实现理想和抱负。对比起来，在市场体制中，想要的东西只要用钱买就可以了，如果没有钱，那么一切抱负都不必谈。人们可能都会按照这种方式行事，因为每个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头脑非常清楚，而不是因为市场生活扭曲了人们的抱负和追求。

诸如此类模棱两可的解释，说明了评估市场体制影响的困难。也许正是人们对求助于市场交换追求个人抱负的事例充满着诱惑，才使人们贸然拒绝了社会。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社会的集体活动参与的衰亡，使得人变得缺乏人性了。对此，我们能知道多少呢？我们了解到，社会的参与率和参与类型，各个社会之间是有着明显差别的，并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然而，我们不知道，这些差别是否完全可以归因于市场体制，我们不清楚是不是由于市场体制才使我们变得无人性。

（二）工具主义

我们经常没有给卖给我们火车票的人以更多的人身关爱，相反，却对取代人工的自动售票机给予了许多关注。我们能够礼貌地对待铅管工，但我们时常不把他们当成我们的朋友。在市场交

换中，参与者被说成仅仅把对方看作是工具，比如：你仅仅是符合我的目的的工具，只要你能提供我想要的东西，我就对你感兴趣。两相比较，据说非市场关系可能更加温暖，工具主义色彩较少。交换的双方在相互引起兴趣的点上相互寻找着，他们每个人都能受到一定的尊重，也明确了自己的义务，并且经常一起加入到友谊活动中去。

通过这个对比，我们似乎看到了等价交换原则的正面。如果等价交换原则表明的是“你能拿走的取决于你所投入的”那么它似乎也表明，“你之所以要投入仅仅是为了索取”。我不会为你做什么事情的，除非我能从你那儿得到什么东西。我对你的兴趣与对自动售货机的兴趣不会有什么两样，你和机器无非都是实现我的目的的工具。这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但是工具论充满着陷阱。

在市场体制中，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之下，没有任何东西会被禁止自愿交换，也不会阻止社会交换、友谊和爱心。是不是市场参与者们过于忙着做买卖而没有时间进行其他交往呢？对此，有研究资料表明，市场体制中的参与者拥有一个比市场社会之前其先辈们更加广泛的相互交往的圈子。在现代社会，尽管家庭关系出现了衰退，但这决不是相互交往普遍的真实情况。

如果把市场社会与在此之前的社会进行比较，很容易就能够看出，当代市场体制下的协调相互影响，与先前社会的令人愉悦的闲暇交往如喝酒、跳舞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没有市场体制的时候，农业生产的协调，需要靠权威和行政命令。地主和牧师施展着权威和命令，并以此来取得他们自身的优越性。在这种条件下，要让地主和牧师不把他们的臣民当作工具，而像现代市场交换中相互更温和地对待对方，显然是十分困难的，也是极不现实的。

工具主义的命题也耐人寻味，因为它的指称过于扩大化了。市场的相互关系有各种各样的类别，注意到了二手车销售商和企

业家的传奇，有的人便试图把市场关系推而广之，认为市场关系不仅是工具，而且掠夺成性。也许时常是这样的，然而，牛奶场农民之间的市场关系，以及他们与乳酪制造商的关系，却是另外的一种类型。这些关系是相当疏远的，以至于他们根本看不到相互之间还有关系存在着。农民们可能还不知道其他养奶牛的人，他们觉得没有什么理由要考虑其他人。农民们不会把其他养牛的人当作工具，也不会进行剥削。话再说回来，有些市场关系是相当温暖的。友谊时常在不断重复的交往中产生，顾客们有时认为在购物时同卖方的对话和交谈是令人愉悦的，他们愿意与卖方一起分享快乐。市场体制提供的相互关系是极其复杂的。

可是，假如许多市场关系是疏远的和非人性化的，那么至少可以说那些关系是不温暖的，如同许多非市场关系比如社会交际和友谊一样。网上购物可能会大大降低温度，再者，有调查表明，这些冷冰冰的交换给在市场社会中兴盛的温暖的非市场关系留下了空间。强调一下，并不是所有的非市场交往都是温暖的，这一点只要把销售收入小册子与征兵局的传票比较一下便略知一二。

在既定的城市化和产业化条件下，非市场社会的相互交往是否比市场社会的交往更温暖呢？不可能的，人们已经见识过了前苏联的零售店员和服务员的冷面孔和粗鲁行为，也见识过了对消费者冷漠的操纵让他们抢夺稀少的产品。交换结构上的巨大差别，不应该被忽视。在当今的非市场社会里，一小撮精英和统治者把整个成年人口当做获取成功的工具。那么，不管是市场社会还是非市场社会，我们都是其他人的各种各样的工具。注意，把我们当做工具的这部分人，在不同的制度下其组成是不完全相同的。谁在操纵着工具呢？在市场体制中，几乎每个人都是操纵者。可是在其他体制中，属于操纵者的就比较少少了。

可是，在市场体制中，有一个无所不在的冷酷的工具主义，这

就是促销。市场体制中的促销活动，令人眼花缭乱，十分扎眼，堪与极权社会中统治者刻意让人民屈服的虚饰和宣传鼓动的工具相媲美。然而，促销对冷酷的工具主义的推动，可能甚于民主制度下处于统治地位的官员对选举的推动。因为尽管民主社会的统治者使出浑身解数，劝说选民们选举他们，让他们继续留在执政位置上，但是他们缺乏韧劲，也没有耐心去准备大量的劝说材料，绝对不像促销活动那样能持久下去。假如说来自政治精英们的消息每一周每一天都试图操纵我们，那么由销售商发出的信息几乎每一天都有好几次想操纵我们

（三）工作的退化

一些持批评意见的人坚持认为，市场体制下的工作已经发生退化了，原因在于工作的崇高目的丧失殆尽了，一切都屈服于赚钱的营生，再直接一点地说，就是围绕着雇主的意图打转转。如果你是一位靠工资谋生的人，那么根本不可能有雅兴沉湎于精益求精，从某种程度上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雇主的意图服务。你不可能从你生产出来的产品中获得满足，因为你努力的结果是令人烦恼地同成千上万的人共同生产着一件产品联系在一起，你只能独自欣赏自己所做的一份成果。尽管监工可能不断地提醒你要加快速度，注意降低生产成本，但你可能不会被邀请去思考工作的乐趣和尊严。

工资完全能得到，但它们被作了净化处理，并且被缩小了。他们来自于对自给自足的社会回忆，器具由家庭成员自己设计和制造出来。埋怨指出了大规模社会合作的结果，不是市场体制的结果。再与公有制社会作一比较，便可知道。是监督人还是管理者呢？当然制定的质量和成本标准，不论是高还是低，工人们都必须接受吗？当然如此。没有看到和提出最终产品的要求吗？这一点与市场体制下的情况是一致的。生活和工作的机会怎么样呢？

有没有鼓励对工作和生活的意义进行反思呢？这可能只有在乌托邦社会里才能见到，不会发生在我们知道的当代非市场社会中。

对工作退化的最具说服力的反驳，将所有这些考虑搁置在一边，仅仅指出了前市场社会中对工作的态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劳动正在变质，这个论断一直流行到 19 世纪。在英国的上层社会中，长期以来始终流露出对工作和贸易的轻蔑。正是由于市场体制的崛起，才使得这样的轻蔑开始消逝了。

(四) 市场伦理

随着俄罗斯等国走向市场体制，这些国家出现的弊端似乎超过了已存在的市场体制中的弊端，有的人可能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主张暂时不去过问。有的人可能会从法律漏洞方面找原因，而不认为市场体制会造成这些情况的出现。还有的人认为，在这些国家中，除了精英的离职，我们可能什么也看不到，正是精英们悄无声息地实行着那些弊端，尤其新出现的精英们，为了攫取他们个人的社会地位而叫嚷不休。尽管有了这样或那样的对令人惋惜的场面能够打消顾虑的解释，但是现在我们确实看到了市场生活对个性和文化的最坏的典型的结果。在已经建立了市场体制的社会里，类似的结果或许会被搞混，但仍有不小的破坏性。我们不知道确切的程度，可是，已有的破坏性令人感到沮丧，以至于不能被忽视。

在已经建立的市场体制社会中，有些批评家指出，没有过分粉饰的腐败已经达到了受道德准则保护的地步，这些道德和伦理准则试图为它们提供合法的外衣。他们说，市场体制受到行为准则的管制。从古希腊到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以及其他文化传统，最美好的愿望一直在教导着同情、仁慈、诚实、友爱和社会责任的美德。市场道德赞成在允许的情况下，带着社会责任和仁慈心去索取，赞成仅对个人及其家庭的照顾，赞成竞争，赞成优胜劣汰。根据伟大

的传统，好的社会就是一个共同体，可是根据竞争伦理学，好的社会就是竞争。在前者的社会里，人被要求对他们的邻居友爱，然而在后者社会里，人没有了邻居，甚至在相邻公寓中的同一楼层也难寻家庭踪迹。

正像有的争论所说的，市场伦理不仅仅为对其他人的福利漠不关心提供了依据，至少它的有些信徒走得更远，如同兰德的小说描述的，他们从正面歌颂着贪婪的德行。它不仅仅为某位经理在缩小生产规模时解雇雇员，为他把另一个企业逐出市场提供了依据，市场伦理要求经理们必须依市场道德和社会效率行事。市场伦理把不人道的等价交换变成了一个道德美行。

对企业家来说，市场伦理允许和鼓励对其他企业经理、雇员和顾客们的福利弃之不顾。对经理们来说，吹捧本企业提供的东西，肆无忌惮地玩弄顾客的感情，贬低其他企业提供的物品，扰乱消费者的头脑，这没有什么不道德，相反却被认为是应有的行为。在一些明白的界限之内，市场伦理允许和鼓励通过逃税和躲避法律控制削减广泛的社会利益。除了企业家之流，对任何人而言，市场伦理使经理们对正直、合理的讨论或交流、同情、怜悯逃避了义务。举一个简单而又明白的例子，尽管解雇会给工人们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公司不会承担哪怕是一个多余工人的负担。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好地展现了市场伦理背后的力量。这是事关企业生存的颇具说服力的伦理，在方便的时候它也支持为获取更多的财富而永无休止、永不满足的运动。

这一切听起来似乎很丑陋，但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市场伦理是许许多多不可或缺的角色伦理中的一分子。角色伦理与伟大的伦理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是一个普通的准则，它要求每个人保持同样的操行，不会顾及角色问题。角色伦理指出了必要的区别，法官的角色伦理要求他要做到公正无私，并且还要怀有一

颗铁石心肠。或许因为天生的善心，裁决的严酷性会得到一点稀释，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指望这位当值法官能在亲情、友谊、爱情和宽恕的请求下，最终产生动摇。对于法官，伦理的许多普遍准则是被禁止的。类似地，角色伦理允许辩护律师对犯罪当事人进行辩护。维护公众对政府官员控制中的一个共同的难点，可能在于对政府官员的角色伦理缺乏一个很好的界定，从而足以使公众对他们的行为进行预见和可能的控制。

对于市场体制产生出来的一个特殊的市场伦理，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横加责备。伟大的伦理传统不适用于指导企业的决策，如同“勿看恶行，勿听恶言”这个普遍规则不适用于判断一样。为了能享有社会合作的好处，社会与成本控制、创新以及筛选出已经没有用途的技术和企业有着利害关系。在许多合适的情况下，解雇工人不再需要认可。一个社会不要仅仅因为它要认可维持一个企业或使企业能够成长的努力，就去畏惧市场角色道德。金融家索罗斯已经明确地承认了两种伦理之间的差别，他赞成道义上的责任就是要保证它们之间的独立性，并被引导至各自的位置上。

对市场角色伦理，我们已经说了一句好话，可是，我还想作些补充，许多观察家把现存的市场伦理准则看成是有缺陷的，相信那些认为市场生活腐化了社会伦理的人的说法。在这一点上，反对的意见不在于市场伦理为等价交换的原则提供了依据。尽管在市场伦理与普遍伦理的结合中，我没有看出什么重大的社会弊端，但我的异议是，市场伦理在很大程度上将有问题的习惯性做法变成了合理化的东西。比如，在医生的角色理论中，医生们把他们自己置身于道义之上、责任之下，而不去揭露某位同事没有法律认可的执业资格。同样，企业家们也会把他们置身于责任之下，不会相互竞相压价出售商品，他们只能在伦理上和可以接受的办法上试图建立垄断。早在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已告诫了我们这些习惯

上的做法。由于在市场社会中企业家的角色如此重要，以至于市场伦理被看得比普遍伦理重要，所以有人也在考虑市场伦理范围扩张和普遍伦理范围收缩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这部分人还在考虑持续不断的市场伦理和普遍伦理的冲突，会不会导致任何一类伦理准则效率的下降问题。因此，我们不仅没能就市场体制对社会伦理的影响做出自然而然的陈述，而且一些重大的问题也超过了我们现有的观察能力。

二、共同防御

关于对个性和文化有益影响的主张，我们时不时地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有的甚至站在效率要求的肩膀上。由于市场有效率，所以这些人断言，市场能够创造财富，其他任何协调的方法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反过来，财富又对个性和特征的发展产生益处。财富能够帮助提高教育水平，扩大人们享受人生阅历的范围，承认人们所选择的各种各样的生活风格，并且还可能帮助人们远离诽谤。

关于财富的一些陈规陋习是有害的，可是它们可以反映一些比其周围的人拥有更多财富的人的个性的真实情况。然而，有研究结论表明，当整个社会变得相对富裕的时候，如西欧和北美的情况，它们便会倾向于发展个性品质，如较高水平的道德理性、自信、责任感，以及认识复杂性的能力。

有的研究甚至提出了更为强烈的主张，认为不仅是财富而且还包括市场参与，都会产生出上述个性品质以及其他的性格特征。当市场参与者们被卷进永无止境的选择之中时，他们便会认为自己处于自身及其生活的控制之下，他们会把自己的决策看成是在眼前实际和生活伦理之间作出选择。在市场体制中，市场参与者们把权力、自治、独立和责任一起归结于他们自己，而这些个性

特征反过来又支撑着自尊。自尊是经常被思考的基本的人类精神。如果没有货币和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有关的真相将会被改变。中央主义者在决策中的协调，取代了他们个人自己的许多决定

市场参与者们能承受多大的选择和自力更生的负担呢？60年以前，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认为，德国人滑入法西斯主义，部分是为了躲避令人对付不了的决策负担，以及市场体制强加给他们的合乎逻辑的焦虑。近年来，在社会主义社会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许多俄罗斯人及东欧人不仅恐惧市场体制可能带来的不安全，而且也包括新决策所带来的负担。他们必须承担起寻找工作、住房和医疗的新义务，要获得这些必需的东西，通常需要决策和行动的创新，然而政府从原来全部承担的义务中的退却，已经加强了个人自力更生的需要。

这些观察研究已补充说明了这样的可能性，即达到一定程度的激励会提升处理复杂事情的理智能力，但过重的负担会减少这种能力，并且可能引起认识的倒退。市场体制确实有激励作用，如同变化的步伐频率和幅度一样，另外，寻找工作和为家庭的将来准备许多必要的东西同样有激励作用，可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依然不够深入，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激励总体上看其负担是不是过重。

对市场带有结论性和肯定性的主张就是，市场体制为人民带来了他们想要的一切。这个颇为自信的提法，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过了。但是，我认为更正确一点的提法应该是，市场体制在人民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水平上，为他们带来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当然，市场体制只能给人们提供市场所能提供的那一类利益，有些好处是不能进行买卖的。不考虑这些条件，那么是否可以说市场体制给人们带来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呢？

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要求，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人类所想要的是 2500 多年以来，人们探索的源泉。尽管我们仍然不知道他们或我们想要什么东西，但旁观者确实知道他们习以为常地进行着自欺欺人、言行自相矛盾、在冲突的欲望中争斗、创造神话、渴望否定自身，并且经常主张更值得称赞的动机。所有这一切足够表明，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们甚至不能说，市场体制给了人们所想和所要的东西，因为人们所想和所做的常常背道而驰。不能对市场体制提出额外的要求，它只能给人们在进行市场选择时提供一个隐约的近似值。即使人们没有作出选择，市场体制也会给他们施加负担，比如溢出问题；另外，当工人们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在不愿从事的工作中进行选择时，市场体制会迫使他们去接受而不是选择。

所以这一切，都与一个重大的问题有关，这个问题是我无法解决的，即市场体制会不会使人们感到幸福？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专门写本书，也许还要几本书来论述。然而，值得提醒的是，它确实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全世界都在对来自研究人员的探索做出反应，据说人们的幸福感在下降，许多国家报道称，诊疗所反映的意志消沉的比率有升无降。总之，关于市场的责任，应该加以认真的思考。

1. 同带有推测性质的解释和历史分析相比，关于市场体制对文化影响的研究发现是比较晚的。这其中，R·E·莱恩的著作《市场历程》是一本标志性的书，他在该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本章中，我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于这本书。

2. 关于市场体制的影响，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
② J·拉斯金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第一准则的四篇随笔（这本小册子由 L·J·赫本卡编辑整理的）；E·弗罗姆的著作《逃避自由》；④ H·马尔库塞的著作《单面人 关于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

3. 从社会科学角度研究市场体制与个性文化之间的关系，其中在几十年里一直占据着头把交椅，并且即使在现在仍然具有广泛影响的是：① M·韦伯。韦伯是一位才学广博的学者，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② H·托雷。托雷是位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是《信仰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4. 关于公有制与社会的区别，参阅 F·托尼斯的著作《公有制与社会》本书的英文版由密执安州立大学出版社于 1957 年。

5. 至于现在的争论，可参见：① T·科恩的著作《荣归商业文化》；
② R·H·弗兰克的著作《奢侈的狂热：为什么钱在毫无节制的时代总不能得到满足》。

6. 关于幸福的失落 参见 R·E·莱恩的著作《市场民主与幸福损害》。

7. 关于民众支持衰落的两个可供对比的观点，参见：① R·普特兰的著作《独自玩起滚球 美国社会的崩溃与再兴》；② E·C·拉德的著作《拉德报道》

第十五章 取信于民

市场体制发展了相互作用的一种与众不同的并且十分重要的形式，对此，我们在前面已经顺便提到过了。这样的相互作用形式，与效率、自由、个性及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市场精英的企业家，他们主要从事着影响公众的单边信息的传输。这种相互作用的模式极大地讽刺了被民主论调所歌颂的“观念的竞争”因为公众是不可能作出答复的。这种模式不仅反映了试图教导公众的企图，而且也反映了引导人们去购买市场精英们所卖的东西的企图。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个假设。如果消费者购买的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而是卖方的劝说使他们作出购买行为，假如这种假设确实能够成立，那么市场体制将会是循环迂回的，并且几乎可以认为毫无效率。假如市场参与者们能够被卓有成效地操纵着，那么人们可能没有信心去称参与者们是完全自由的，有的人或许还会把为数众多的人看成是受骗上当者，此时，这些人的个性将会在精英们不断操纵的文化氛围中被不断地重新塑造。

“假如这是真的”这种假设能成立吗？下面我们就来对此作一考察。

首先让我们走马观花地看看市场精英们与大众联系的一些基本的事实。尽管家庭和朋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可是在市场体制中，人民大众间的主导的交流形式却是高度单一的。一小部分企

业家及其代理商向广大群众发送消息。正是这种模式，它需要社会成员要有读写能力。只有当人有阅读能力的时候，无论哪一种信息才能被成千上万的人所接收。通过广播，单边信息的收听率及听众规模会发生变化。电视是个新的世界，它传播着暴风骤雨般的单边信息。于是观众们就淹没在产品广告、销售宣传的汪洋大海之中 沉没在宣传和维持企业机构的广告之中 沉没在政治消息的大海之中。

作为普通的公民，尽管你和我都能想像出通过出版和广播电视能够把消息送达到广大的受众和读者之中去，可是这样的做法还是太昂贵了。说话是有代价的，报纸和电视由市场精英们拥有和经营着。对大部分人来说 只有另外的一些精英 才有能力购买到出版版面和广播时间。你和我难有机会对每天都给我们讲话的企业家作出反驳，我们不会同这些人喋喋不休地讨论他们的产品，可是无论是一清早 还是中午、晚上 我们读到和听到的都是他们刻意要说的有关他们的东西。

市场精英们的意图是为了实现某种控制，无非是引诱人们去购买 无非是希望人们对他们的企业有个较高的评价 而对他们的对手企业做出贬损的评价。对这部分人，我们时常可以用政客来称呼。此外 市场精英们还会使出浑身解数 尽力劝说人们给他们增加砝码，以支持对他们的企业比较有利的政策。我们一直是这样被教导着，即联系是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联络是教育和启发。事实上，联系的意图只不过是娱乐，对喜剧表演我们会放声大笑，而不是记录什么东西。然而，信息究竟是娱乐还是让我们消息灵通 都是次要的了 它们几乎都要服从于控制之目的。

即使是在多边联络的场合，实现控制的动机或许也处于支配性质的地位。“吃菠菜”没有说教的成分 但它试图去控制。很清楚，政治家不仅仅着意于说教，更专注于控制。广告商也是如此，

他们假心假意地去启发消费者，一遍遍重复着某件产品有“六个方面的好处”，然而却只字不提到底是哪六个好处。如果某位候选人说“我不会提高税收的”，那他的意图只不过是想要你投他一票。“新型的和有改进的”的说辞不过是类似于自我检举。

作为控制的手段之一，劝说性质的沟通是很有影响的，当然，与其他权力的行使一样，也时常有不成功的时候。影响的指向之一，就是企业家们不惜花费巨额金钱，以达到出售他们的服务产品和商品的目的。在美国，尤为典型的是，宁愿花钱做广告，也不愿意提高教育水平。影响的另一指向是，具有野心的政治家们如希特勒等，通过宣传手段以赢得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些人也会动用手中的权力，严禁对他们构成威胁的信息的传播。随着 20 世纪早期政治民主和民主理想的爆发，独裁者们发现直接和公开的命令难以行之有效，于是他们纷纷通过宣传和其他能够控制公民思想的劝说手段，转而尽力引导政治上的顺从气氛。与命令不同，劝说几乎普遍地被看作是权力的合法形式，结果是它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由于没有认识到这是权力的一种形式，所以人民只好臣服于它。

一、市场的迂回性

记住这个初步的开场白 现在的问题是在市场体制下 市场精英对大众心灵的控制有无可能走得那么远，以至于产生了高效的循环性呢？不考虑消费者的反应，企业家能不能引诱消费者去购买他们希望消费者购买的东西呢？这样的一个有关迂回的论题 断断续续被提出将近有 100 年了。

充其量，它只不过是一个极端的夸张。尽管有卖方和他们的广告商的巨大的促销影响 但似乎很清楚 消费者有千万般理由没

有必要按照广告商的劝说去做，他们照样进行着自己的吃喝、穿戴和休息。没有做广告的产品，不会从商店的购物清单上消失掉。世界上对医疗保障和电力设备的需求，毫无例外地也没有靠广告来实现。广告商甚至不可能完全控制着消费者对品牌的选择，因为消费者在这一方面经常能获悉敦促他们作出选择的自相矛盾的信息。“松下”给我发来了信息，“索尼”也传给了我信号。当我被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我作出了选择。很显然，消费者在总体上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摆脱控制的羁绊。

消费者的控制没有被促销的呼吁破坏掉，但是他们的控制受制于促销并被削弱了，这种表述不是没有争论，但至少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对此，我们也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为了保持市场体制的健康发展，促销业界的人士常常会声张信誉。他们认为，广告会引诱人们买得更多，使人们不会把过多的钱存起来不用。而庞大的花费，意味着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繁荣。反驳的意见认为，这种说法实在过于简单，因为对许多社会来说，不需要过多的开支，而需要更多的储蓄，以利于经济增长。姑且撇开这一点不说，刺激开支和减少储蓄可能都源于促销思想，然而有证据表明，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如果它们遵从了促销思想，那只不过是弱化的迂回，因为人们存钱的多少大多由个人的文化背景和所处的环境主宰着。日本人是储蓄者，讲究节俭，美国人却是花光为止，没有很强的储蓄观念。富人们会存钱，因为他们有的是钱，而穷人们哪里有钱存到银行去呢。

根据推测，促销有时候会将购买转移到奢侈的服务和物品上，比如：有钱的人会买高级时装，有钱无钱的人都会买由设计师设计的衬衣。但是，转移毕竟只是转移，人们不会摒弃衬衣而去购买剪裁得体的衬衫。对奢侈品和时尚时髦的追求有许许多多的理由和原因 比如攀比“奢侈狂”以及由有钱和过分花哨的消费者带起

的趋势和潮流。对于有约束的迂回，还没有太多的证据，即使是有钱的和过分花哨的消费者加入了广告运动。

如同第五章所指出的，由市场精英们发动的销售运动，没有受到欲望的驱使，以至于阻碍和重新塑造了大众的思想。在推进销售的过程中，不像政治精英，市场精英们的意图不在于保持他们对财富、权力和地位的优势。市场精英们所想的只是有利可图的销售，他们不太在意他们究竟卖的是什么东西，只要消费者愿意购买就行了。可是，为了使消费者作出反应，常常需要进行资本投资，因此时常倾向于发动生产。既然已经把资本投入到消费者想要的产品中去了，那么我们将看到，公司不希望潜在的消费者轻易地改变他们的想法。当然，它们希望能从它们投出去的资本中获取最大的回报。因此，企业家们经常总是花费巨额代价，以完成他们计划好了的销售任务。尽管这是一类循环，但它不会威胁到消费者对精英们的控制。充其量，这类循环只是为市场精英拿出巨额资本投入提供了可能。

二、向理智开战

有些促销活动并不是传递信息的，比如告诉消费者现在有什么有售，在什么地方能买到，价格怎样等，可是，问题在于，有多少是非信息成分的，又有多少带有误导性。我们当中的所有人几乎都心知肚明，促销究竟指向何人。多数促销手段旨在通过激情呐喊以促使消费者开始行动，刻意要扭曲人们的理性思考，扰乱人们的头脑。根据广告的说法，百事可乐是个“令人精神倍增的东西”，能够提神，甚至还能引起男性性欲。无论如何，这则信息不具有知识性，它没有说明这种饮料中含有什么物质成分，与可口可乐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除了扰乱人们的思维，根本无助于人们在选择

时作参考。那么，从市场精英们制造的泛滥成灾的充满诱惑的沟通中，引发出来的问题是，不在于他们决定为消费者带来消费者将要购买的一切，而在于他们腐化了消费者的意识，或者更确切地说，腐化了人们运用理智的能力。

这能够加以证实吗？不，我认为不可能。但是，它确实是个难以否定的结论。为了能够认识清楚，一个合理的怀疑是，市场精英们提供的信息，构成了对人的意识的双重攻击，其产生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政府精英们也加入进来为虎作伥。其中，第一重进攻应称为使人精神错乱，尤其是市场精英们不断地叫嚷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从而使消费者沉浸在汹涌澎湃的劝说之中。促销与公共关系本身属于一个行当，无时无刻，我们总是能听到它们的声音，看到它们的行为和活动。市场精英对大众的劝说是如此地坚持不懈和不屈不挠，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且花样不断翻新，以至于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市场精英们究竟有没有给消费者留下考虑其他东西的思维空间。第二重进攻就是使人感到困惑，就像我们看到的，促销和政治上的劝说主要与树立偶像和使用广告用语有关。其根本目的经常是想搞混人们的思维，而不是想让人们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从而达到使人进行毫无理性的挑选之目的。不过，所做的这一切多少带有一些娱乐性，就像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一样 我们正在“快乐地死去”。

你可以判断这双重进攻的力量，只要屈指一数数和反省一下你每天收到的消息即可明白。对于销售信息，你知道你总是被唤起去毫无理由地购买，但你也常常会发现上当受骗。

大部分时间里，作为进攻目标的接受者根本不会认识到，他们正接受着广告消息。由公司提供的张贴在教室里的宣传材料，不会让孩子们和老师们意识到其表达的思想内容。孩子们不可能从貌似其他的内容中识别出思想意识，老师们也不会时常停下来进

行思考。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的“石油恐慌”的岁月里，当美国的石油短缺促使建议政府对石油业进行调控时，没有多少电视观众注意到，有关石油的电视广告节目没有明确地提到政府或任何政治问题，但是向消费者披露了石油产业的秘密。美国人没有认识到近年来社论不断披露的关于过度的诉讼动向，这些诉讼多半来自于商业集团希望削弱政府管制的公关努力。

早在 1950 年，美国最好的报纸几乎一半的内容以及差不多所有小报登载的东西，据估计都来自于公共关系发布的信息，这还不包括有偿广告的版面。对人的理智的进攻变得如此密集了吗？是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广告增长的速度比全球人口的增长快了三倍。许多观察家呼吁，谈话节目在连续不断地衰减。通过连续的前后一致的观点交换，通过断断续续的问与答，公共问题不断地被播送出来。美国总统候选人不间断电视演讲的平均时间长度，已由 1968 年的 42.3 秒，下降到 1988 年的 9.8 秒，前者所用时间已少得令人惋惜，而继任者用的时间少得简直可怜。

从全世界来看，候选人和官员们培养选民的天数似乎正不断缩减。政治活动现在变成了小商小贩一样的买卖叫喊。至于市场精英们在商品的信息上的无聊、混乱和欺诈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提高全民的识字水平，动用大众媒介，尽管要花费沉重的代价，但其好处是无可争议的。

市场精英和消费者之间关系的某些趋势，由于因特网带来的多边沟通的发育成长，而放慢了甚至停止了。咨询公司、发布商业前景的代理商们提醒道，“在新的电子经济时代，潜在的购买者只要轻击几下鼠标，在几分钟之内他们就可以印出十几份有关你的产品的独立评论”并且还认为：“知识就是力量，保不准一刹那间，你的顾客就消失在汹涌澎湃的潮水中。”

促销和公共关系业对消费者心灵的影响，从感情方面是可以

提升的，从偏见方面来看也会变得严肃。有些人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认识，即促销和公关，尤其是促销，是公共教育的敌手。他们没有反思促销业与教育“产业”处于交战的状态：一方攻击着人的心灵，另一方试图传递信息并运用信息。促销业对事实真相的处置，大体上类同于它对歪曲、愚弄和糊弄的处理，即在法律容许的限度内，采取有用则用之的态度。教育产业竭尽全力去引起对真理的追求，一以贯之地坚持否定歪曲、愚弄和糊弄的立场。

在我们的周围，如果我们看一看促销和市场精英对大众政治的呼吁，那么我们无法回避一些担忧，它们正系统地削弱着对真理和诚实的应有尊重，需知，真理和诚实是社会之所以成为文明社会的必要条件。也许传统上对诚实的赞美只不过是花样文章，只是为年轻人刻意准备的。无论如何，对真理的崇拜总是不牢靠的，总是有着极高的限定条件。然而，在这里，市场对文化的影响依然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在美国，司法制度在很久以前就认可了对产品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歪曲的描述。法官们会说，“吹捧”在商业交易中是可以预料到的，因此难以断定它们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法院是具有洞察力的：歪曲表述在实践中被广泛地使用着，这样的决定对市场社会作了生动的评论。

就像社会现在总是禁止买卖儿童、禁止奴隶制和开始控制工业污染一样，它们或许也能够对促销和公关业进行治理。现在许多国家对一些产品的促销实施管制，如毒品、股票和债券。我提出这一点，并不是要鼓吹某种政策，而只想指明，促销和公关这两种产业作为市场体制的内在条件，不应是目前的形式。原则上讲，市场体制能够在广泛的一系列的的社会关系中运行下去。市场体制需要信息的广泛分布，要求政府不要在这方面作过多的管制。假如不对自由演讲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么治理促销和公关的关键，在于

个人权利和组织特权之间的区别。

三、政治上的循环

如果只查找市场体制中对人的心灵的攻击，而不去查明它的循环性，那么我们或许一直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寻找着循环性。在市场精英们彼此相互竞争的场合，循环性最好还是在有关市场精英和政治精英联手控制的民主政治中去寻找。精英们对公众沟通的一个耳闻目睹的特征是，市场精英和政治精英们能就他们的某些信息达成协议。他们不会参与厨房用具的促销，但是他们会联合起来维护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因而，如果基于促销的进攻常常留给消费者的是困惑而不是劝诱，那么，基于政治消息的进攻就是劝说。政治消息的进攻可能因此而产生一个政治上的循环。在这样的循环中，公众被劝诱——到精英那里索取。当然，索取到的只是精英们愿意给他们的东西。

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有史以来，许多伟大的思想一直受到与社会组织和精英对大众操纵有关的思想扭曲的困惑。柏拉图提到了洞窟中的影子而不是现实，培根提到了“偶像”，甘特提到了“教导”，洛克提到了“暗示”，卢梭提到了“俘获意志”，马克思提的是“荒谬的意识”。在我们这个时代，熊彼特提到的是“制造业的愿望”，哈贝马斯提到了“扭曲的沟通”，沙特歌莱德提到了“天堂的乐队”。

精英们把他们政治上的交换当作是对意识观念竞争有贡献的东西而加以维护，并且珍藏在自由和民主的思想之中。可是，只有当条件具备的时候，观念的竞争才能产生效果。这些条件包括：

- (1) 信息必须相互非难。
- (2) 在发生争执时，声音不可大得盖过沉默。
- (3) 每个有争议的消息，必须都包括一些经验成分。
- (4) 争论

者不可对真理的尊重偏离得太远。

在市场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在市场精英和政治精英各自的内部，相互间的非难是屡见不鲜的，但都不是发生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尽管不是很明确地发出每一条消息，但是，在等级和不平等的“明显”功效上，在精英们的能力上，在维护社会团结的必要性上，在对政治煽动的危险性态度上，市场精英和政治精英们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在精英们的作用、特权和过错方面，政治精英和市场精英之间及其各自的内部之间，是不会有非难的。关于基本机制观念争论的失败，已经成了一个问题，这在美国尤为明显。关于“美国道路”政体、私人企业制度、公司和平等性问题的不适当性，暴露了片面追求意识形态一致的缺陷。

同精英们的嚎叫相比，来自消费者和环境组织的呼声却不常见，并且还很虚弱。尽管一些国家工会势力很强大，但工会的呐喊之声，无论是频度还是音量，都远远比不上企业精英和政府精英。企业精英和政府精英淹没了所有其他的贡献者，从而使后者没有发起耀眼的思想竞争。

如果说精英对人的心灵的进攻走得如此之远，以致表面上的政治民主事实上发生了循环，那么他们的成功主要归结于精英对大众漫长的操纵。可以说，在市场体制产生之前，还没有出现社会民主的时候，精英们就开始试图实行对大众的控制。事实也是如此，大多数早期记录下的历史，柏拉图式的理想国就是表面上仁慈的精英对大众控制的蓝图。在中世纪的欧洲，世俗社会的贵族和宗教界勾结起来对大众进行控制，通常被看成是精英即将到来。一位历史学家就文艺复兴写道，“对暴动的恐惧，成了一个不变的令人烦恼不已的刺激物”，关于政府与教会合作起来对大众进行控制这位历史学家写道：“从16世纪中叶开始，这样的合作变得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紧密了。”即使是美国民主的奠基人，也在与

对民众的恐惧中抗争着，试图找到一条控制民众在新宪法秩序中影响的路子

精英控制的局面变成了阶级冲突的图景，在阶级冲突中，处于社会有利地位的人及其精英领导人物，为控制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的思想而斗争着，其目标就是要保护他们在社会全部利益中的优势份额。这些利益包括货物和服务以及社会地位、影响和权力。在麦迪逊看来，政府的组成要能够控制主张财产权平等分配的“多数派”的要求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在近年来试图削减福利国家的过程中继续发生着争斗。策略上的动机除外，劝说处于劣势的人应该满足市场社会给他们带来的许多好处，正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的既得优势。

精英们不懈地努力地讲授不平等、等级权威、忠诚、服从、驯服、信用和诚实的美德。他们之所以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赞美，目的是为公众臣服于精英确立一条基本的原则和框架。对这些美德不变的、不加区分的过度吹捧，在每一个时期都被时代文化的额外信息补充着。从前，他们宣讲国王们神圣的权力，而现在他们鼓吹着资本主义正确的教条当然，精英们不会劝说自己，也不会劝说他们的子女。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精英信息表现出高度的连续性

一些激进的市场体制批评家，把精英信息看成是把市场体制成功地“卖给”了公众。他们认为，由于市场体制允许等价交换和明晰产权，从而使大众只能获得社会利益中的极其有限的份额，因此，市场体制事实上是带有剥削性质的社会过程。但尽管如此，精英们却获得了成功这是一类循环。这些批评家们带着嘲讽的表情，看待市场体制是和平的维护者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他们或许会说，市场体制对和平的维护确实不可否定，但因此而威胁和压制着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精英们一直规劝处于不利地位的

人，安心地去接受市场体制分配给他们的一小份好处，否则就要冒着失败和被打败的风险。这又是一个关于循环的有力论断

1. 关于广告支出的评估，参见 D·C·科顿的著作《后公司时代》，《快乐得要死：关于娱乐业一统天下时代的公开对话》这一本书虽然比较简短，但它对娱乐和困惑的分析却具有相当的启发性。

2. 关于公共关系的新闻，参阅了 S·彼得的著作《全球性的恐慌 公司对环境论的攻击》

3. 关于平民对精英控制的引文来自于 J·哈勒的著作《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文明》。

4. 近年来 由精英们发起的针对平民的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教育”和特别呼吁的出版物，几乎像潮水一样涌来，使得我不知道如何选择研究材料才好。关于公司控制和大众传媒的使用问题，参阅：① D·阿格尔的著作《巨型公司是怎样左右大众媒介、破坏竞争和危害民主的》② D·赫佐格的著作《毒害社会下层人民的心灵》；③ A·埃茨奥尼的著作《资本腐败：对美国社会民主的新抨击》，在这本书中，作者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对思想和政治腐败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许多观点另外，也可参阅 P·E·科科伦的著作《政治语言与修辞术》。

5. 关于阶级关系，可参阅 R·帕鲁奇、E·瓦颂的著作《新型阶级社会》。在这本书中，作者告诉人们社会正由中产阶级向两个阶级转移

第十六章 民主的必要条件

像政治民主一样，市场体制确立了大众对精英的控制，它们共同构成了成千上万人对少数人，主要是对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实施控制的可以相互替代的方法

当然，政治民主和市场体制是不可分割的。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不与市场体制结合起来，民主政府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没有市场体制，那么就不会有民主的存在在本章里，我们试图对此作出论证。

自古以来，奉行民主的政府，大多数都与市场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民主的市场体制倒也十分常见，如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但是，没有市场体制绝不会有民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市场体制与民主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因此，有些观察家认为，俄罗斯不可能实现民主，理由是，它先于市场改革而进行了民主改革，以至于民主缺乏市场体制的支持。这些人认为中国走了另一条道路 首先实行市场改革 要不了多久 中国就将拥有民主的合适的市场体制基础

与此同时，世界上从来没有见到任何类型的单一民主国家，总有一天，事实会证明这样的国家是有可能存在的。直到今天，世界上也从来没有见过民主的中央计划国家，但这也并不否认这样的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存在。或许民主与市场体制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并且最终会销声匿迹。现在，我们究竟应怎

样看待这个历史的结合呢？

说得最多的一个答案就是，假如某个政府通过实行中央计划而废除了市场体制，那么这样的政府就变得权力极大，以至于会造成对民主的破坏。假设追求的结果是民主，若是废除了市场体制，因此也会导致民主的终结。这是因为，在历史上一直没有民主的中央计划政府，这样的结果历史上根本找不到，它不可能帮助我们解释民主与市场体制的历史关系。

如果一个民主政府废除了市场体制，那可能会发生什么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即使它不能解释历史上民主与市场体制紧密集合的原因。通常的推测是，在没有市场体制的情况下，政府有足够的权力能够实行中央计划，由于它手中握有权力，必然会导致对民主控制的破坏。这是一个颇为吸引人的论点，但是似乎简单了点，它表明如果一方——比如政府权力过大，那么另一方——比如公民的权力就会过小。尽管在一定的条件下，上述观点是成立的，可是一般地看是不完全正确的。例如，如果公民通过因特网行使权力，那么他们便获得了制定规章制度的机构、政府机构和国际机构手中的权力，而且这样的权力还不小。

历史学家常常提出，迫使政府接受公民想要的方案的公民权力，不仅要求政府权力小，而且还要求当局机构有足够的权力实施税收和管理。例如，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经常因它们的政府的软弱而感到灰心丧气。公民的权力与强大的政府权力并不总是矛盾的。

另外，政府会不会滥用它们手中的权威，取决于规章制度，它植根于习惯或法律，在每一个国家，它都控制着精英们的政治行为。在民主得到很好确立的国家中，行政长官在竞选失利的时候，根本不会号召军队去维护他们的既得权力，因为这些人知道，即使他们有心这样做，也不会得到任何回应。然而，在民主体制不怎

完善的国家，其政治运行规则就大不相同了，军事政变有可能时常发生。同样，文职人员和司法系统的行为方式，也取决于他们采用的规则。一国拥有军队规模的大小，并不与对民主的威胁有着天然的联系，威胁的程度依赖于政府官员和受其指令的那些人所采取的习惯法则。

今天，民主政府比它早期时候以及到 18 世纪中期，行使着更大的权力，例如，拥有税收权，管理货币和信贷权，对企业的调控权，通过社会福利支付实行收入转移支付权等等。民主没有因为这些权力的存在而受到什么伤害，也就是说，并不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样民主正“通向奴役之路”。许多观察家可能会辩解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权力，不断增长着对政府的民主控制，历史上我们多次见到过广泛行使的战时权力，包括强行征兵，但这不会破坏民主

一、什么需要进行解释

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没有哪一个民主的单一的民族国家曾试图消灭市场体系，我们这样说可能会引起人们的震惊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实，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民主需要市场体制，为什么社会在实行民主的努力中，不能离开市场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西欧的主要产业发生了社会化的浪潮，不仅放弃了市场体制，而且开始了私人企业到公共企业的转变，企业仍然保持着市场体制下的买卖活动。当然，在税收政策、社会保险和商业调节中，政府已经改变了市场领域。几十年前，法国的“指导性计划”以及今天意大利政府的商业调节都反映了偏离市场体制的运动。另外，印度实行连续的五年计划，尽管这些计划仅仅只是为政府投资确定了基本的目标。民主不会冒险去取代市场体制，只有在战时经济动员的时候，有可能会取代市场体制。

没有哪一个民主政府曾试图要废除市场体制，这怎么可能呢？有的人可能会认为，200 年的历史至少提示了终结市场体制的民主企图，尽管它们最终都流产了。对此，市场批评家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包括英国费边社那样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接二连三的萧条，促进了替代选择的讨论。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具有巨大破坏性的大危机，或许在世界某些地方也会促进民主政府试图实行中央计划。

即使我们相信，对任何国家来说，要放弃市场体制可能会冒极大的风险，或者会犯严重的错误，但我们必须思考，为什么没有哪一个民主国家会冒这样的风险和犯这样的错误。因为国家哪怕是民主国家，经常会冒巨大的风险，犯巨大的错误。民主国家不会重新武装它们自己，但却让纳粹德国重整了武装，以至于几乎失去了整个欧洲。正是民主国家，大胆地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正是这个冒险，差一点毁灭了地球上的生命。为了要求古巴撤出导弹，一个民主国家甚至敢冒核战争的风险。

不管是明智的还是不明智的，为什么民主政治制度至今也没有尝试放弃市场体制的可能性呢？它们没有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即在思想上赞美或接受市场体制的值得注意的高度的一致性，这是一个重要的协定，从而使反对市场的公民及其领袖从来没有获得胜利，200 年里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发生过。

公民及其领袖毫无例外地总是决意去坚持市场体制，这是他们思想状态的事实反映，与市场体制如何运行无关。民主和市场体制的历史结合，取决于思想状态，不依赖于市场体制和民主的技术性细节。

二、怎样解释看法的一致性

有的人可能把看法的一致性，当作是对民主和市场体制历史结合的充分解释。有的人可能带着好奇心，坚持要去解释一致性。如果认为主流意见是正确的，而持不同意见者是错误的，并把它们当作证据是不可能解释清楚民主和市场体制的历史结合的，因为两个世纪以来，不论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在不断的辩论中都提出了相当有事实根据的论点，但无论哪一方都没有能够表现出正确的一面。即使市场倡导者是正确的，但没有解释 200 年来许多主流意见为什么是错误的，没有解释为什么许多真理从来也没有变成主流的意见。

近年来，就像现在有时所说的那样，计划体制的失败已经从根本上向所有国家的公民及其精英表明了市场体制的必要性。但是计划体制在 20 世纪的失败，不可以用来解释在早期的民主社会里，赞成市场体制的意见为什么变成了主流。无论如何，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统治的失败，对谈论民主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的帮助是微乎其微的，更不用说去解释看法的一致性了。

有的人可能认识到，市场体制下的人们生活得很好，同时也注意到，市场体制比非市场体制更加富裕。然而，无以计数的市场参与者其实过得并不好，也不见得就比非市场体制下的人富裕多少，但即使如此，他们没有转而反对市场体制。就拿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来说吧，尽管日子过得很悲惨，但在一些国家只有一小部分失业的人要求废除市场体制。

为什么赞成市场的意见取得了主流地位，对此，也不能用目前不存在其他可供选择的制度来解释。由于没有一个成功的可行的制度可以求助，所以毫无疑问，一些人及其政府根本不会去冒险跳

入未知的世界。可是如此的谨慎几乎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任何时候没有人民没有政府选择未知的非市场体制。美国立国，法国大革命 俄国和中国的革命 至少表明了群众和精英们时不时在寻求社会组织新的形式。

另一个带有倾向性的解释就是，那些享受着民主政治所带来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运动自由的人 还希望能享有消费者主权和职业选择自由的市场自由。这种解释或多或少带有尝试性，但都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中央计划可能允许消费者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 前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如此 只不过有一定的限度而已。要想为每个人提供这些市场自由，大可不必建立市场体制。

在意见稳定一致性解释的探索中 我只找到了一种可能性 虽然它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但至少表明了此解释是能够找到出处的。这种解释是对前一章意见的攻击，它不仅受到市场精英们的攻击，而且还受到市场精英的同盟——政府精英的攻击。正是这些精英们推动了社会的市场体制，因为对市场体制的任何替代，都有可能终结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力和优势。市场体制是根据一整套规则和习惯运转着的，这些规则和习惯限制了政府的权力。比如它们会阻碍财富的重大转移。另外，它们也要求权力向企业家扩散 而不是由中央计划者来取代。任何社会 只要不是土地拥有者的独裁统治 因为那时候市场体制没有确立 只要不是革命精英统治 因为此时市场体制已经被废除了 那么它都需要扩散精英们的治理 在这种情况下 精英们的特权和权力 便取决于市场体制的规则和惯例。这类精英可能根本不支持民主，相反却倾向于直接的统治。然而 即使它选择民主的路径 也是为保护自己 不断向民众的心灵发起攻击，教训他们要忠诚于市场体制。

我能够提出一些支持细节 皇室权威、习惯和立法长期以来一

直阻碍着市场交换，虽然没有完全堵塞交换，但却大大施加了约束。在 17、18 世纪，英国的商人阶级为了从交易中发财致富，纷纷要求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其结果，产生了得到王室机构担保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要是没有得到允许的授权，这些商人们是不可能获得胜利的。王室机构之所以愿意授权，原因是它们需要基金，以便备战时需要和日常管理的开支，须知，这方面的基金量是非常庞大的，单凭脆弱的税收制度难以支撑下去。为了获取商人们的同意，王室机构也会许诺优惠的贷款和征税办法，纷纷开设这样的基金项目，以换取利用市场机会的新的自由权。最终结果是，企业家们实现了对王室成员和土地拥有者的约束，政府权力分散，商人们享有了广泛的自由，并从中获取了利益。应运而生的市场体制，给商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一点都不要感到吃惊，新秩序具有促进社会其他集团要求像商人一样的自我管理的自由和权利的效果。那么，商人们面临的一个选择是压制需要的流行，就像 19 世纪德国所做的那样，或者吸收有新要求的人进而构成联盟，就像英国所做的。后一选择，使得英国的商人们走上了政治民主的道路。

允许和鼓励最低限度民主的发展，我们今天称作企业家的商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担心，已经被授权的那些人将会利用他们手中的选票夺去企业家们的财富和权力。通过《1867 年第二次改革法案》（Second Reform Bill of 1867），公民们获得了一些特权，对此英国议会两院的许多议员流露出了担心。他们担心“工人阶级现在已经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了，假如他们知道如何去利用，那么他们就有了成为环境主人的权力”。因此，市场精英们开始着手并坚持对公众蓄意的“训导”，告诫他们私人产权、私营企业、等级、不平等的好处，总之，都是为了支持市场体制的信念。在公共讨论中，在公众媒介中，在学校和教堂，他们发动着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攻击。

意在创造和形成赞美市场体制的思想上的 consistency。一言以蔽之，既然精英权力受到了挑战，通过对大众心灵的进攻，说服公民遵守市场体制的规则，不要想当“环境的主人”从而使民主受到了压制。

当然，完整的叙述需要条件。在最近的岁月里，民主已经被强加给了战败的国家，如日本和德国。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在没有经过商人挑战中央权威阶段，也已选择了民主。市场精英为了寻求市场机会，动用教育和宣传资源，支持市场体制而不是中央权威。当俄国革命似乎使社会主义的统治成为市场体制的替代的时候，精英劝说公众相信市场体制优势的努力便更为强大了。

根据这样的推测，由于精英对公众思想的进攻，市场体制历史性地与民主连结在一起了。

考虑到进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一致性，随着公民们思想能力的缺乏，从而使与最低限度或低级的民主相关的民主萎缩了。这种最低程度民主的存在，似乎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商人和企业家的政治能力，正因为如此，才控制了专制政府的权力。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们找到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能够相信市场体制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尽管没有找到，但我们承认民主与市场体制的关系还是有可能存在的，或许有一种联系被我们忽视了。

1. 关于劳动阶级正在成为社会主人的引文，参考了 R·麦肯锡，A·塞尔弗的著作《雕刻在大理石上的天使》。

2. 关于市场体制与民主的关系，可参阅：B·莫尔的著作《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

第十七章 民主的企业障碍

不论市场精英是否在历史上对最低限度的民主做出了贡献，也不论他们是否还会继续这样做，由于他们实施了对人的心灵的攻击，确实摧残了完备的民主。通过另外的办法，市场体制使得民主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阻碍了更加名副其实并且可行的民主。

按照定义，如果说真正的民主需要存在对精英控制的努力之中，公民之间的政治影响和权力大体上要平等，那么公民中任何明显的经济上的不平等，都会成为民主的障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将产生竞选公职机会上的不平等，将产生发动候选人、利用大众媒介影响选举人能力、游说以及与政党和政府官员社会交往上的不平等。而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是由市场体制造成的，所以市场体制妨碍了民主。用数学的语言来说，到此我们已经证明完毕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其他非市场体制也会产生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但这根本否定不了这个结论。

除了阻碍民主的基本的市场体制因素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它取决于企业尤其是公司在政治制度中所处的位置。本章里，我们就来讨论这方面的有关议题。

一、超大规模的公民

撇开夫妻杂货店和那些在民主政治体制中其特权很难与个人

特性区别开来的小企业不谈，只有大企业，才构成了政治民主的障碍。由于拥有充足的经费以及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美好关系，大企业行使的权力比公民要多得多，除少数特别富有的人之外，大企业的权力差不多掩盖了所有其他人的权力。

如果某个企业组成了公司，那么它便能享有一定的额外权力。比如，有限责任限制了股票持有者的损失，由此，投资者受到了保护，公司经理们能够比富有的人从中获得更多的基金，这笔基金甚至比民族政府可能获得的基金规模还要大。公司发挥着一种超大的、被广泛授权的公民的作用，这个作用不会明显地威胁民主政体崩溃，但会形成对政治平等巨大的侵犯。举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为了对公民关于环境问题的行为作出反应，大约在 1970 年，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企业开始受到请愿、集会、向政府官员写信，以及其他反对企业的活动的控告。受到控告的企业知道，在这些案件中，它们不可能赢得几场胜利，因为公民活动受到法律的保护，尤其是在民主社会中的演讲自由法律。然而，他们也知道，一件诉讼可能只是因为被告担心诉讼费用会落到他们身上而生效，因为他们不像原告那样有企业资金可使用。这些案件经常会构成威胁，以至于会妨碍演讲自由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最为典型的公司与政治平等不协调的活动例子，就是公司花钱发动竞选运动，致力发展与政府官员密切的关系。

企业在其身价本身之外能够享有许多有利条件，当其他群体的成员必须花费自己的收入时，企业却能利用“公共”基金。这些被投入到政治活动中的公共基金是公用的，它取自于企业的收入，同时也取自于消费者和股票持有者的收入，而与企业经理们的个人收入无关。有时法律会限制经理们对“公共”基金的动用，但是常常是徒劳无益的。

当普通人仍在设法招募基金和建立组织的时候，企业、公司及

类似的实体，由于早就实现了组织化，从而能享有额外的优势。当公民集团设法物色合适的职员的时候，公司已能给它的经理们分派政治任务。公司能坚持下去，它们不会死掉。当它们该死的对手丧失了能力或者死掉的时候，它们依然能代代坚持政治活动。

尽管各国的法律不尽相同，但法律无一例外地保持着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虚拟人——公司的许多权利，包括政治参与权。公司被赋予合法的政治活动参与权，哪怕它们不能投票竞选官职。公司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其实就是自由言论的合法权，与政治精英相勾结的权利。

对于由人组成的公司是民主的一个基本的事实，也许更确切地讲是非民主的一个基本事实。由公司到公民的转换是不可忽视的，企业毕竟是由一个个个人组成的。除了那些已被企业当事人所享有的权利之外，保证企业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的努力，将会给企业经理集团带来更加特殊的权力，从而使他们能够动用公司财产和人员。

除非重新解释民主的含义，否则我根本看不出民主与机构权利及真实人的权利是怎样协调起来的。民主的基础就是生存的权利和权力，以及有抱负的人在既定的权利和权力范围内保护自己和追求个人理想的机会权。根据民主的原理，把这样的权利和权力分配给消防栓和计算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既不会有痛苦，也没有渴望，公司也是如此，只有其中的人才是活生生的。民主政府应该把属于人的权利和权力分给人民才对。

为了实现社会赋予的功能，比如组织航空运输、开采矿藏，公司需要一定的权利和权力，比如进行买卖活动和管理工厂的权利和权力。如果公司拥有诸如此类的权利和权力，我看它就不会成为民主的必然障碍。只有当自由人的额外的权利和权力被赋予了公司的时候，公司成为民主的障碍才会发生。几乎每一个社会都

在最低限度上承认这一原则，我还不知道哪一个社会将允许公司竞选和占有政府官位。然而，民主需要对公司政治参与的其他限制，这就是说，同一原则的其他应用。公司作为合法的虚拟人的指派，确实有点碍事。

社会不会允许税务当局、军队、农业部去要求像一个个公民那样的公民权，正相反，它们会被限定在指定的目标追求上，而不是其他的打算。根据极其一般的界定，民主同样需要对公司和其他各类组织的类似的约束。与单个的人有所不同，组织理所当然地应是服务者，不应是公民的同伴，更不应是主人。比较的结果表明，民主需要像联合利华那样的组织的地位，同许多大公司相似，在某些方面，联合利华的活动与政府无异，但决不是一般的人和服务者。只有在合法的地位和一整套与其功能相应的规则之下，公司才会满足政治民主的要求。在民主社会里，公司作为一个被伤害者，它不会诉诸法律，但会进入作为一个社会机构的角色。

二、国际秩序中的公司

在正形成的国际新秩序中，公司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成了民主的挑战者，其政治角色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可能是它骑在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新结构的背上，驾驭着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左右着政府实施着对它们的保护和促进帮助。

我们已经注意到，许多公司拥有的资源和生产的产品数量，比许多民族国家还要多得多，结果是，这些公司能带来更多的权力，从而影响着这些国家。相反，民族国家却做不到这一点。除此之外，来自公司和银行的市场精英们，与政府精英们一道，被授权共同建立对国际经济实行中央指挥的权力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等。对此，至少向民主政府提出了三大问题：

1.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机构成了技术上有一套办法的精英们的领域，那么，政府部门中常常没有技术资质的官员，不可能实现对银行家、金融家、经济学家等精英们的有效控制。就这一点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强加的正统的财政政策，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例许多民族国家，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能有效地承担对该组织的控制。

2. 即使成员国完全能实现有效的控制，那么这样的控制其实也掌握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们的手中。国际组织会继续存在，同有投票权的成员国毫无关系，在许多问题上，成员国几乎接近无权力。新的欧洲中央银行正蓄意被规划，以便部分地同政治隔离开来，目的是为了实现在不怎么高的就业水平，然而，价格水平的稳定性却为市场精英们所拥护

3. 尽管与投票国无关，但这些机构更易受到公司的影响。例如，当欧洲委员会允许企业对有毒和放射性废物通过稀释以再生消费品或用作化肥的处置时，它一定会接到对此感兴趣的企业的来信，不管怎样，普通的公民都会被动员去聆听意见。

在一些大的国家，要想在国民层面上推行民主是十分困难的，只能部分地得到实现。对于抱负和事业彼此不同的数十亿的“选民”来说，国际组织机构的民主控制能否实现和怎样得以实现，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或许这样的控制问题根本就不可能成立。在 21 世纪，市场调节机构将会怎样决定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动向需要继续观察。在此期间，公司、银行和国际政治精英们，会在较少的民主控制之下做出重要的决定。

三、企业内部的权威

我们知道，公司是通过独裁而不是民主的内部结构运行着的，

这种结构一直受到公司在生产性财产方面有私有权的权利者的支持。从某些方面来看，法律削弱了这些权利，它允许工会将小规模民主测评带入劳资关系中，一些国家建立了雇员委员会，只不过权威受到高度的限制而已。

在民主社会里，每一个大公司在其内部应该按民主政治进行组织，公司的雇员要能发挥像公民那样的作用，并且可以挑选、更换和控制执行经理，诸如这样的想法吸引了一大批深信不疑的追随者。关于政府民主和公司民主一致性的呼吁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辩解，它认为，如果民主对政府来说是个好的主张，那么对同政府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公司来说，民主也是一个好的主意。然而，只有少数国家冒险涉入正式的雇员控制，比如德国的法律支持在公司监督委员会中吸收雇员代表。

在评价服从权威的工厂是民主障碍的时候，我宁愿小心谨慎地行事。在一些方面，工厂民主同整个社会的民主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产业民主”的范围和程度是不是更大民主的必要条件，这从根本上看还是不很清楚的。

根据民主原理，有谁会赞成把军队的控制权交给士兵而不是立法机构或内阁呢？谁会主张把税收政策的制定权转移给收税机构中的雇员呢？有谁会同意把建造新公路的决定权让给建造公路的工人呢？

大体上讲，对军队、税收和公路这样的决定，比较合适的选民是“我们大家”不是那些具体从事这些方面工作的人 哪怕他们怀有浓厚的兴趣想组织和制定方案。决定应该生产多少个品种电视机的人，是那些同各种各样的需求者频繁打交道的人，决不会是制造电视机的人。工厂报酬率的决定，不仅会影响到工厂中的雇员，而且还会影响对社会生产提出分配要求的人。

如果雇员想取代股票持有者（股东）充当公司直接的控制者，

那么他们选出的新经理，将必然会继续对市场控制的反应很敏感，也会对新雇员控制极为敏感。这样一来，当雇员要求增加工资从而吸干公司的流动资本、市场控制要求增加投资以促进增长的时候，这两种控制必然会发生冲突。

即使公司内部通向更加民主的道路仍没有很好地确定下来，但在一些国家人们发现它是值得探求的。工厂许多的专制习惯不是与生俱来的，公众对经理的切实可行的控制的障碍也是如此。在招聘时存在的种族和民族歧视，毫无充足理由的解雇，人为的工资差别，经理过高的报酬，隐瞒工作场所可能对雇员身体和安全的危害，诸如此类的现象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在一些国家，尽管已经消除了公司内部过分的专制，可是到 21 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如果人们回过头看，仍然会吃惊地发现，我们这个时代在民主原则和公司里专制做法之间的巨大差异。

四、充满热情的公司

民主准则唤醒了公司的慈善之心，使它们转而考虑这些问题：对教育进行无偿援助，对研究活动、环境保护、艺术以及贫困人口的资助。表面上看，这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有的人可能会相信，根据民主原则或其他任何理由，对公司的宽宏大量除了感恩戴德，同别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对于公司在慈善事业上的花费，尽管事实上都是由消费者和股东负担的，但他们并没有因为公司这样做而被征了税，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是他们在买单，而不是公司慷慨的接受者。不管是糊涂了还是漫不经心，总之，消费者和股东欢迎公司的慷慨大方，因为他们深信不疑，他们没有花什么代价就得到了东西。

公司在这些方面的活动和行为，提出了一个曾一度被认为是

“充满热情”的公司的的问题。社会拥有选择的空间，它们能够把公司紧紧地束缚在它们所卖的东西的生产上，能够控制公司使其支出仅仅在生产基金的范围之内。或者，社会可能允许公司不受约束地使用“公共”基金，仅仅是因为社会需要这些慈善之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多半倾向于后者。

尽管公司在为销售而生产的市场控制之下运转着，但它们很少因与屈服于各式理由的机构有关而被控制着。在市场体制中，消费者能投票赞成或反对出售西红柿和短期巡游，但是他们不会赞成也不会反对公司对城市乐队的捐助，公司会拒绝支持对污染的调查，会拒绝支持在学校里开展私有企业宣传活动。在不存在公司控制的场合，公司经理们将不会民主地引导“公共”基金的使用，相反会不加考虑地将其用于个人的目的。更有甚者，比如像所有的集团一样，他们受到富有特征的偏见的的影响。慈善之举产生了重要的问题，主要是公司民主选择的能力和礼节，类似于公司政治支出这样的问题。

按照定义，更加纯粹的民主可能会要求公司不仅要在公开的政治和慈善活动中受到约束，而且也应受到产品声誉的制约。它会严禁除了有关产品之外的任何大众化的广告吗？对一些观察家来说，这样的措施看上去是社会处理大量的公司信息的一条民主途径，需要知道，这些公司消息阻碍了真正的意识竞争，而它们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民主的先决条件。对另外的一些观察家来说，这些措施自然而然地会导致言论自由的泯灭。民主理论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以至于可以提供判别的准则。

五、市场精英的政治地位特权

超越这些人所共知的民主的市场障碍的就是市场精英在政治

体制中的特权地位。在民主制度里，特权常常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在这儿，我们超越的不仅仅是怀疑，根据分析，它不过是结果而已，尽管这样说尚存很大的争议。

政府试图发挥市场体制作用是通过对企业各种各样的资助，以激发企业家的能量。尽管企业能被命令“停止下来和断掉念头”能被强制不进行生产，但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之外，它们不能被强求去进行生产。对企业只能进行引导。政府掌握了各种各样的引导手段，其中主要包括关税保护、贷款、直接的现金援助、政府购买、专利、税收减免、信息和研究服务、广告补贴、政府出面斡旋乃至军事介入以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政府还会改变学校体制，以适合企业的需要。政府被强烈地驱使着为企业提供它们所需要的东西，以换取企业的做为。当代，人们所广为熟知的有关这方面的贬义词，都从另一面说明了企业的福利。

政府对企业的给予和引导是非常大的，超过了大多数人的想像力。在 19 世纪晚期，为了鼓励州际间的铁路建设，美国联邦政府作为铁路建设的礼物，把明尼苏达州和华盛顿地区四分之一的土地、威士康星州、衣阿华州、堪萨斯州、北达科他州和蒙他拿州五分之一的土地拿了出来。作为礼物的土地总面积，比法国或德国的国土还要大。据现代人的估计，引诱的价值累计达到数十亿美元，不过估计结果有悬殊差别，这主要取决于哪些应该计入总数，哪些不应该计入，比如政府在公共教育上的支出，究竟有多少应该计入企业的好处或是对企业的诱使。

假如企业因缺乏诱因而投资、雇佣和生产上逡巡不前，那么政府精英比企业精英更有可能失去他们的地位。结果是政治精英们一向比较在意市场精英们的要求，例如在美国进行总统选举时，习惯做法是总统候选人会把主要大公司的掌门人召集起来开个会，甚至在没有取得总统宝座之前，就会信誓旦旦地许诺新总统

将会及时地考虑这些公司的要求。这样的许诺是不会对农民、工会、市政当局、军队或其他类似的集团做出的。在许多问题上和许多条件下，政府会优先考虑市场精英们的要求而不是民主。选民们对失望的反应常常是迟钝的，到下一次选举时，已经把前面的失望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是，市场精英中一旦有人感到失望了，几乎毫不例外地立马会削减生产，裁减员工乃至关闭工厂或转移到国外。

在不同的地方，其他的一些集团当其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可能会拒绝或威胁拒绝提供服务，以此也影响着政府。地铁工人和垃圾搬运工，以罢工为威胁，也能迫使市政府做出让步。政府也会屈服于不满的医生们的劝说，去制定健康保护政策。然而，政府究竟能做到多广、多深和能否持之以恒，不取决于这些集团的表现，像他们依赖于企业精英那样，因为对于企业精英，政府要靠他们转动产业的车轮，并且只有这个轮子转得足够快的时候，才能保证人口的就业和保证企业精英们在政治中的地位。

所有这一切给市场精英们带来了特殊的发言权和特殊的好处，在政治制度中，像这样的特权其他人是不会得到的。在好几个活动场所中，我们都会看到这一切。在国民场所中，它不仅给市场精英们带来了特殊的利益，比如税收减免，同时会使政府勉为其难地去制服市场精英对广泛的政策颁布的反对。从市政当局的层面上看，税收减免和其他好处，已使市场精英们从市政当局手中榨取了利益，一旦无利可图，他们便威胁要把公司搬到别的地方去。从全球范围来看，公司的规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就业机会和它们提供给一些小国的好处，使公司得到了可乘之机，从而以撤出投资为要挟，凌驾于这些国家的政府之上。面对着飞利浦电器公司威胁要把它的许多工厂转移到波兰去，荷兰经济事务大臣解释道：“我以为飞利浦公司的这种行为，对在国际市场运行的公司来说是很

正常的，……政府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为企业提供最大限度的吸引力。”人们几乎看到这位大臣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不断地摆弄着自己的双手，充满着一脸的无奈。

市场精英们具有特权的政治地位，构成了民主政治中的一大缺陷，随着权力的授予和由此产生的影响，逐渐违背了政治上的平等性。这从另一方面帮助解释了政治精英倾向于同经济精英联手共同维护业已存在的政治和市场制度的原因，它明确地揭示了为什么市场社会中政治精英和市场精英从来不会废除市场体制。

我认为，由于大家认识到了公共政策必须满足精英的需要，所以市场精英特殊的政治地位被加强了，如大多数人其实都支持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可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强烈地要求着，这倒并非不一定合理，关键是害怕会导致雇主减少雇佣指标。无论如何，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减免税收对富人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可是他们仍然支持这样做，关键是害怕削弱投资的积极性，因为他们知道而且也是这样被教导的，“企业的自信心”就像一棵植物，有可能开花结果，也有可能枯萎死去，有人发现到了，尽管是多么的不情愿，但大多数人承认，在他们频繁的被称之为涓涓细流理论的灌输中，给企业精英们一份特殊的地位是必要的，因为只有精英们被善待了，才能保证好处将流向大众身上。因此，众所周知的认识表明，市场精英需要特殊的政治地位，以便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

企业的特权地位在某些重大的问题上被强烈地维护着，因为它是市场体制运行的必要条件。维护等于承认，市场体制确实妨碍了民主，这好比是说，民主标准的降低，是值得花费的保证市场运转的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讲，民主与市场体制之间的上述关系使人们认识到，损失民主是为了激活市场体制。实践中的市场社会是否承认对民主的更大限制而不认为是促进市场体制的必要条件，对此，

那些市场社会是不怎么关心的。就算体制间的物物交换是需要的，然而在交换中被接受的民主的缺陷是相当肤浅的。它们隐含着一种满足市场精英需要的政治过程的实质歪曲，其采取的手段要么是制服大众的政治要求，要么就是幕后操纵。作为一个例子，它们会出现在许多新的顾问委员会之中，例如 1998 年英国工党已经在政府中建立了这样的顾问委员会。通过顾问委员会，公司的经理们与部长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为了市场体制，社会必然会为民主的损失付出沉重的代价。

对可归因于企业尤其是公司的所有的民主障碍，很少有人建议加以废除。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很难想像出没有像公司这样的东西的世界。尽管公司是民主的绊脚石，可是它一直是并且仍然会是生产性的机构，每一个社会都将有可能决定具有某种形式的公司及其合适的未来。福兰克斯坦因刻画了一个疯狂的怪物，但与人类集体创造的公司相比，它只能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成就。因为公司的神智是正常的，它知道如何实现生存和繁荣，可是福兰克斯坦因的怪物做不到这些。公司是不会死掉的，而福兰克斯坦因的怪物却不可能不死。公司能够把好处或复仇的恐慌传播到世界各地，福兰克斯坦因的怪物怎能做到这一点呢？人们能够设想出给公司套上一个更民主的轡头，但它怎样才能被更好地驾驭，主要还是取决于公司自身，因为公司为了摆脱民主的束缚，会凭借强壮的脚力大胆地自由自在地奔跑。

1. 关于公司的虚拟人问题，参阅 W·G·罗伊的著作《社会化的资本 美国大型产业公司的崛起》。

2. 美国政府拱手送出土地的惊人估价，参考了 P·约翰逊的著作《美国人的历史》。

3. 关于企业的特权问题，参考了 C·E·林德布鲁姆的著作《政治与市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

4. 关于企业与民主之间关系的详细研究，参阅：① N·J·米切尔的著作《招摇过市的公司 商业、公共政策与民主代表性》；② D·福格尔的著作《沆一气：政治与企业之间令人不安的关系》；③ K·麦克·奎德的著作《令人不安的伙伴 美国政治中的大企业》；④ D·耶金、J·斯坦尼斯诺著《居高临下》。

第三部分

何去何从

第十八章 市场体制的选择

在法国，市场精英和政府精英的合作比美国来得紧密，在美国，市场精英和政府精英经常相互把对方看作是对手。在英国，政府会同企业合作起来共同治理环境污染，可是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对环境污染熟视无睹，以至于“一度曾被称作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各种各样的理由表明，市场体制新的形式出现了，有时它没有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有时又是这些人在处心积虑地勾划着。

在 20 世纪，当政策制定者们在他们的议事日程上关心着其他出路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市场体制的地位由于大量的妇女进入工厂的运动发生了深刻的、持续不断的变化。妇女们的任务现在主要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不取决于她们丈夫的权威，也不取决于家庭的传统。随着有了自己的货币收入，妇女们现在在市场中购买了许多的服务，当然也包括一些物品，须知，这些服务和物品以前多半是家庭自己生产出来的。随着 21 世纪因特网和多边信息技术的新发展，同等重要的未曾料及的变化可能还会发生。网上拍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大大地向市场参与者们扩大了选择的范围，也大大地增加了市场活动的容量。

在这一章里，我打算来考察一下市场体制中公开的选择问题。我将要说的，有时会为对其他选择的替代提供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事例，但这都不是我的目标。我之所以要讨论替代问题，是因为它

能表明至今仍然被忽视或多少被忘却的市场体制的一些性质特征。

通过前面有关章节的论述，我们可以很快地处理一系列具体的选择。起码可以假定，每一个社会都可以这样来选择市场体制，它在下列方面具有很少、稍多或更大程度的政府控制：

1. 溢出。
2. 各种各样形式的垄断。
3. 公司权力（包括政治权力）
4. 企业内部的专制管理。
5. 企业家激励。
6. 投资。
7. 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选择不会被限制于差别较小的范围，从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政府和公司之间的亲密合作，一直到美国继续存在的政府与公司之间骚动的关系。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制度中，对每一个这样的变量，都有着广阔的、公开的并且能产生结果的选择空间。不论多么大的国家，像中国、印度、俄罗斯和美国，它们选择处理溢出的办法，可能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假设的角度，我认为，社会是能够进行选择的。在现实的世界中，政府是推动市场体制运转的主要杠杆，社会无论多么依赖于政府，通过统治精英或民主社会中的公民，是能够被驾驭的。让步不应得到鼓励，因为政府本身就存在着缺陷。公司也是各种各样的障碍之一，特别是它在政府中的作用，使其成为市场体制向更好方向发展的障碍。

在市场体制所引起的关于政府控制的程度和特征选择的各个方面，最频繁的争论是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问题，因为它已经偏离了等价交换的原则。再分配的范围很广，从通过福利国家的

免费公共教育，直到失业补贴和家庭补贴。

我的一位同事曾直截了当地对我说，“福利国家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了”。很清楚，福利国家的方案经常麻烦不断，医疗保障便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典型，然而，医疗保障的要求究竟应该保持在一个怎样可行的水平之上呢？对消费者来说，医疗保障的价格是否足够的高以至于要施加必要的约束呢？福利国家也由于政府超出计划和预期花费的倾向而遭受着困扰。福利支出从历史上来看经常增加了过度的花费 比如庆祝用的公共工程、军队、统治者的奢靡以及公司福利等。可是即使方案被采用了，但随着许多社会的人口步入老龄化，劳动人口的数量不足以继续维持慈善事业，从而使福利方案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的主题。

不过，这些分配似乎表面上仍停留于此。市场社会能够在各种福利国家的样板中作出选择，从吝啬的再分配到漫不经心的无节制。根据联合国的估计，按人均收入来说，美国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可是实行的却是发达工业化国家中最高水平的贫困化福利方案。福利被认为是必要的，它是“文明”的产物，因此放弃福利国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福利也是一个策略，通过它，精英们能够安抚潜在的激进的民众。

福利国家仍然没有必要将身体健壮的工人永久地驱逐出市场体制，既不是由于年老，也不是由于伤残或短时丧失劳动能力，只是由于没有充足的生产能力。有一个令人生畏的可能性，即由成千上万的没有充足的技能和资本以实现必要的等价交换的人所组成的新的低下阶层的出现。这一阶层一旦形成，那么不仅需要收入，而且也需要工作，以及与从事这些工作相关的地位。不属于低下阶层的那些人，是不大可能会容忍和支持下去的，而那些属于低下阶层的人也不可能平静地接受被驱逐的安排。今后，或许不得不作出困难的选择。有两个研究法律的学者，最近曾提出一条

建议，每一个美国成年的年轻人，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按照社会的资本财富一次性地分发给 8 万美元的份额，以此来创造一个人人持股的社会。有的人可能会预料，如果工业化国家不得不面临身体健全者的市场逐出的未来的话，国民显著的差异将会涌现。

一、两种见解

关于市场体制清单和其他方面的每一项选择，你所做的，也包括我所做的，乃至一个社会所做的，可能都受着某种理论或某个模式指导，或许是精确的，或许只是大概，但这些理论和模式几乎都反映了政府和市场体制之间的倾向性关系。

一个普通的模式或者见解，就是把市场体制摆在前台和中央地位，而把政府放在了两边从属的地位。其中，一是确立市场体制的法律基础，没有它市场体制不可能运行起来，在这样的模式中，政府的第一重作用虽不会产生多少问题，但在很大程度上却被疏忽掉了。二是所谓的“干涉”和“干预”或者是“调节”这后一种用词，虽然不带有什麼谴责的意味，但仍具有否定的色彩。这种模式把政府想像成一种不和谐的因素，充其量不过是成功的拙劣的修补工，从最坏处着眼，就是一个破坏者。市场参与者是由一个个个人所组成的，政府不仅是参与者，而且是一个调节者，因此它受到来自市场体制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它才被怀疑。政府试图去满足被市场购买所忽略掉的集体需要，但在这个范围之内，它没有什么效率，因为追求社会融洽和环境保护这些目的，它们不像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和服务，一般都不好作价处理。

在能够替代的各种各样模式中，我倾向于选择一种特殊的模式，它没有被提倡，但通过比较可以说明。在上面所讲的第二个模式中，政府虽然是一个不十分完美的机构，但与第一个模式相比，

它确立了市场体制的法律基础，并且它对市场体制提供的支持还要更多。政府的支持是经常的而且范围广泛，它包括货币管理、信用管理、补贴和税收减免、研究和开发、开辟和保护海外市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援助。与此同时，政府还起着调节的作用，但这种调节作用不经常发生并且也不是很有力度。政府还是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者。

在第二个模式中的政府作用之外，有另外两个为第一个模式所忽视掉的作用。作为买者和卖者，政府是市场参与者，更有甚者，政府是市场体制最大的买者和卖者，比如它要购买技师的服务、科学研究人员的服务，它要购买公路建设承包商的服务，要购买农产品、计算机和卡车等。政府还是许多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制定者，它对某些农产品制定了最低价以保证农民们的收入，它还限定了电力的最高价以削弱垄断，通过关税政策提高进口产品的价格以保护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生产者。价格确定是政府发挥调节作用的一部分，有时候它又是政府发挥支持作用的一部分，有时候它还是再分配作用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带有种种意图的价格确定者，政府是市场一以贯之的参与者，就像它作为买者和卖者所发挥的作用一样通过这两方面的作用，政府成了市场体制的内部人，而不是市场体制之外的力量。

在上面所讲的第二个模式中，政府追求的集体目标不亚于单个的市场体制参与者所追求的目标，它一样是有价值的。事实上，这些目标往往是相同的。比如之所以会在郊区购买住房，是因为他们想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舒服，这样的舒服在拥挤的城区生活中是不可能得到的。人们也可能希望得到直接的绿色环境，而不是满目建筑物和砖石铺成的路面，他们想要的是安静而不是噪声。诸如此类的目标，也是由政府掌握的集体选择的目标，包括舒适和环境等。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这些目标只有通过强制性措施才

能追求到，所以政府所采取的强制性做法是该模式中可以接受的成分。

我倾向于第二种模式，并且也发现它更加现实可行。不管你是怎样做的 其中隐含的一个意思是 这些重要的帮助可以明确我们的选择。

二、作为政府管理工具的市场体制

根据第二种模式所隐含的东西，市场体制是政府实行管理的重要工具。它决不仅仅是工具，因为政府经常会通过公开的命令和频繁的禁令来从事活动。然而，对一个全能目标的工具来说，它是最接近的东西。政府利用市场体制是司空见惯的，并且十分寻常。政府会刻意去提高医疗保障的标准吗？那么降低其价格就可以了。政府会促进研究吗？为研究提供基金支持就可以了。政府会让空气变得更清洁吗？对此，只要对工业废弃物的排放进行收费就行了。政府会减少种族冲突吗？这只要在招聘活动中严禁种族歧视就可以了。总而言之，政府管理市场体制最普通的规则，最好就是利用市场体制的做法。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识别市场体制和个人主义的时候，一直走在错误的轨道上，仿佛市场体制不能服务于集体目标。很明显，政府追求着各种各样的集体目标，但它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一方面利用市场体制，另一方面通过控制，从而将自己的目标追求变成可能。市场体制的未来，毫无例外地不仅与个人主义有关系，而且也与集体事业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认识到这一点，是在进行选择时保持清醒的头脑的前提。

我认为，对市场体制是怎样和为什么会成为政府管理的工具进行准确的解释，是十分必要而且值得的，因为我们当中的大部分

人不像我们这样能认识到这一点。

政府可能会怎样引导公民们按照他们和他们的统治者认为是必要的方案去行动？答案之一是，通过命令实现令行禁止，禁止不合适的行为，比如公路上超速驾驶或纵火。但是，它是怎样获得公民们良好的表现的呢？比如，是怎样使劳工从事公路建设的呢？对于正面表现，命令只能在有限的环境中被使用，如同征兵工作一样。哪怕是专制性质的政府，它也不能使命令处处发挥作用，因为存在着更好的选择。

政府购买它想要的行为，就像你和我花钱修剪头发一样没有多大的区别。直接地或者通过合同企业，政府能买到修建新公路、医疗保障、为穷人生产食品的各种各样的必要的行为。

因此，购买是一个颇具影响力和完全有效的政府管理工具。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在大多数情况下，购买优越于行政命令，具体地说，就是能够被广泛地使用，几乎不存在不适应的情况，而且操作起来又比较简单。

政府引导正面行为，以确定公民行为的另外两个常见的方法，与改变定价策略有关。其中的一条途径是实行补贴包括：公寓建设补贴 健康关怀补贴 航运补贴 农业补贴 以及对市场和价格已经确定的其他产业生产的服务和货物的补贴等。补贴作为一个基本的管理手段，弥补了购买的不足。

如果通过补贴能够引致想要的行为，那么容易推断，明确的、有目标的税收就能够阻止不合适的行为，比如：对货物和服务进行征税，就能够控制工业污染物的排放，以及各类国际间的金融交易。这样一来，税收补充了作为管理的购买和补贴的作用。

无论政府会追求什么样的集体目标，从国防到美化环境，管理三重奏的购买、补贴和税收，其使用起来都得心应手。因此，政府对娱乐场地或医生服务的购买，在市场社会中是十分寻常的，例

如：荷兰对艺术家实行补贴制，意大利给重工业予以补贴，挪威政府实行地区补贴以维护挪威北部地区的经济活力。在许多社会，税收保护着无能力的消费者。尽管这一切需要一些彻底的禁律，就像对食品和药品的管制一样。有时候，税收和补贴被掩饰了起来。例如，对中产阶级住房的补贴，由于房屋所有权开支或抵押利息的税收减免而被掩盖了，尽管在数量上它们可能比不上明显的对低成本住房的直接补贴。

为了弥补购买、补贴和税收的缺陷，政府还会使用其他价格手段，并不完全都通过行政命令管理，例如，通过企业购买有限度地对污染排放的允许，政府能够提高非污染企业的收入和产出，能够降低污染企业的收入和产出。或者通过谈判，国家组成的集团能够指派每个国家可以买卖的污染许可，从而鼓励每个国家控制释放，以便能出售许可以及回避必要的购买。

不论公民及其统治者是否希望政府进行干预，购买、补贴和税收及有关的手段都可以利用。它们能被用于作出准确的选择，就像补贴特殊的药品生产一样，也能被用于更加广泛的选择，如同补贴儿童关怀事业。它们可以用于将选择的个人转移到政府，就像税收强行减少了烟草消费一样，仿佛由于有了担保人，就能使孩子的父母为孩子们挑选一所学校一般。

购买、补贴和税收能够被用于生产链中的任何一个地方，比如用于对某个具体投入的补贴，或对该投入进行征税，而不是用在生产线结束后的消费者服务和货物上。再比如，政府可能决定要减少汽车产量，那么它会实行对每一辆汽车进行征税的办法，或者为了减少大功率汽车的产量，它也可能按照汽车的重量和长度进行征税，为了减少汽车工业对钢材的消费，政府可能不会对汽车征税，但会对金属制品进行征税。政府可能给学校或学生提供补贴，以从整体上提高教育水平，为了提高学习数学和科学的学生人数，

也会给这些方面的学生提供补贴。

在世界市场体制中，用于提高或降低服务和货物生产的税收，不见得比补贴来得更普遍，但它依然十分常见，如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关税和其他形式的收费便控制着进口。补贴的使用更加广泛，没有什么好的理由，除了悲哀之外。补贴的分发主要是为了调动接受者，通常多半是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在有理由的补贴和政治施舍之间没有明确可分的界限。日本为了使其大量的产业能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新的角色，通过关税和其他进口限制把提供补贴作为它有计划推进这项工作的一部分，那么它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继续推行补贴，主要与其在这些领域的追求有关。水泥、玻璃、钢铁和石油提炼。对原木业的补贴，导致了一个不幸的后果，加快了森林破坏的速度，然而，它的确受到政治因素和一些精诚的关心支持着，这主要是为了社会的福利，因为一旦原木开采衰退了，那么与此有关的人将会遭到打击。

政府购买、税收、补贴以及其他处理溢出的措施，不断地给社会提供了重要的选择。受到城市拥塞和枯萎的困扰，经常发生流行病、土地肥力降低、森林退化、矿物资源衰竭、全球气候变暖。所有这一切，期待着社会加强努力以控制溢出。在当代，几乎每一个社会都会碰到这些问题。溢出的数量和恐慌的不断增加，已经激起了从北美到南美，从欧洲、非洲到亚洲一轮接一轮的环境保护立法。世界市场体制是税收、补贴超出一般力量的使用者，当然也包括禁令，目的是为了应对上述的严重问题。例如，荷兰政府现在给设立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企业提供修建防止污染设施的补贴，目的是减少空气污染，否则这些受到污染的空气会飘到荷兰上空。

在这儿，我不打算介入当代关于什么时候采用市场控制，什么时候通过直接的命令和禁令来处理环境问题的讨论。我的观点是简单的。事实上，对于集体目标，政府可以使用广泛的市场控制。每

一个社会都有怎样使用这些手段的决定权和选择权。显然，非市场的强制性的控制，是应该有相应的作用和地位的。

假如我们能认真考虑利用政府购买、补贴和税收以处理溢出和其他问题，同时也认真考虑，制定一个规划以减少贫困、减少收入和财富分配中巨大的不平等、缓和等价交换的困苦，那么在一些方面只有市场体制才像一座未完工的公寓建筑，人能够在里面居住，只不过不那么舒适而已，只有当内部装修好、供热、照明和其他舒适设备安装好，才适合于居住。没有这些东西，大多数人会发现其太黑暗、太冷和不安全。

通过购买、税收和补贴，社会使得市场体制有了价值可言。如果说市场体制是一种结构，政府能把许多改善放入其中的话，那么，国家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它们把什么置入了其中，并且获得了什么样的成功。在这个方面，每一个市场社会总是具有并且继续拥有重大的选择机会。这不是小的不重要的观点，改进需要赖以依附的市场结构。

1. 带着对信息革命的特别关注，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的一系列颇富见识的研究，当属 W·E·哈劳、K·B·泰罗编的《21 世纪的经济学：处在变化世界中的经济学的前景》。

2. 关于福利国家的困难，参见 D·巴克、M·怀斯布鲁特的著作《社会保障》。关于福利国家的前景，参见 C·皮尔逊的著作《关于福利问题的新政治经济学》。对上述都做研究的当属 T·R·马摩、J·L·马休、P·L·哈维的著作《美国对福利国家的误解：持久之谜，不朽的现实》。

3. 赌金保管者的建议取自于 B·阿克曼、A·阿尔斯突特的著作《赌金保管者社会》。

第十九章 其他出路

在市场体制中，我们能够看到它的一些可替代的形式。这些形式随着各个国家用自己的方式处理溢出、公司权力和不平等问题而将继续得到发展。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否存在着对市场体制整体的替代呢？是否存在着在市场体制与别的什么之间的选择呢？正好，这就是我们想要说的话。假如有的话，目前的替代是什么？社会难道面临着如此重大的选择吗？就像过去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与行政命令体制之间所面临的那样的选择一样。

作为一种贯穿始终的社会协调方法，笨拙的机制已经过时了。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对生产完全实行中央决定而废除货币的这样的体制感兴趣，也不会对货物和服务由政府进行分配而个人和家庭不能直接进行选择的体制抱有兴趣。换句话说，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让消费者进行市场选择的优势已经被认识到了。无论生产是怎么被控制和计划的，似乎还没有一个分配产出的一般性方法，只能让个人及其家庭买他们想买的东西，它抛弃了管理者和消费者的愤怒、武断和定额票证的无效率。当然，一些货物和服务需要进行特殊的安排，比如某些类别的医疗保障，这是不能自由分配的。可是，作为一个普遍性的准则，消费者市场选择的优越性现在被认识到了。我们注意到，即使是实行专制主义的社会，也能发现利用消费者选择的有利的一面。我们也能想像出一种中央

计划体制，它几乎普遍地使用着消费者选择。

与此类似，在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地方是这样的情况，即通过行政命令来招聘劳动力，除非是特殊情况下的征兵活动。再者，管理者和公民都发现职业选择远远优越于招募。

另外我们不怀疑，所有的社会将会利用购买、补贴和税收，以把它们当作政府的管理工具。强调一下，社会主义制度是有选择地这样做的。我们能够设想出一个假设的非市场体制中央计划也在广泛地利用着它们。

就社会范围内的协调而言，市场体制替代的那种体制，在许多方面看上去都像市场体制，它也使用货币、价格、消费者选择、职业选择以及其他各种市场运作方式。那么，在这两个彼此相像的体制中，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关于差别的最为一般的表述是，尽管存在着很多类似之处，但市场体制利用货币、价格和市场运作，将生产的控制权让给了无数的市场参与者，而作为替代体制，它利用这些东西却将生产的控制权让渡给了政府当局和计划者。市场体制不会由中央来制定生产计划，但替代体制却这样干。在市场体制中，生产不仅对中央决定有反应，同时也对消费者的购买作出反应。

做出上述区分是正确的，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可是令人感到麻烦的是，除了纯粹的市场体制，所有现实世界中的市场体制社会却实践着大量的中央计划生产活动，不管它是怎样被称呼的。我们已经进入 21 世纪了，尽管市场体制仍处于支配性地位，但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还是一种实践的生产的国民计划做法并没有消亡，在一些圈子里，人们仍在诅咒这个词。我对国民计划的理解是，它是一种方法，通过它，社会或社会的统治者所致力于将信息和政府选择的想法公布出去，好让人们知道最近和更长远的未来。不论人们是否喜欢，社会都在进行着这些方面的努力。根据这样

的诠释，计划活动自始就存在着。古代的暴君有时也使用它，重商主义者也这样干的，亚当·斯密就是以重商主义学说为基础，构建他的市场体制案例的民主联盟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战时的需要也是这样做的。确实，计划是如此的平凡，以至于它被说成是不要标称的需要之物。对于这个词，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把自己弄得紧张兮兮的。制定计划只要在人的认识能力范围之内，是能够获得过得去的成功的，但要是人的其他能力比如贪婪的范围之内，就会使计划走向失败。

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它们正在干着什么，当代市场社会中的政府发现它们自己正在实践着刚才所说的那样的计划，比如制定产业政策。政府也会进行一些深思熟虑的选择，并且兢兢业业地从事着就像在环境改革方面所做的那样，只不过有时是明智的，有时则不然。我们已经看到了，市场体制下的政府经常有计划地进行购买、征税和提供补贴。

因此，我们最好这样来说，任何现实的市场社会与作为其替代的社会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较少实行中央计划，而后者却较多地实行着中央计划。

尽管这个重新的阐述减小了市场体制与非市场体制之间的差别，但它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区别，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中央计划只适用于政府对由政府决定的集体目标的追求，而市场体制适用于集体和个人混合目标的追求，这样的目标，虽然有时是由政府决定的，但更为经常的是由成千上万的市场参与者所决定的，因为无论生活在哪个地方的人，既追求着像道路建设这样的集体目标，同时也追求着像食物和娱乐这样的个体目标，就这一点而言，市场体制的优势似乎更加明显。

这是一个基本的区别，对中央计划和市场社会作这样的区分，从整体上看是相当有用的，假如能被认为大体正确的话。但是，它

不完全正确，因为政府官员和计划工作者尽管代表着集体，但他们经常决定去实现同一个体目标，比如加强营养，而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购买得到。

这样的区别虽然被广泛接受并认为大体上正确，但是仍有待于深入研究。我们需要作出进一步的比较，即在市场体制被注入到计划活动中的计划方法，与类似于计划体制中的计划方法之间作出比较。这样的比较，既不明显，同时我们也不大熟悉。

如果不存在市场体制，中央计划工作者要么不考虑价格就作出决定，要么就是用不反映成本的垄断价格指导他们的决策。在市场体制的社会里，中央计划工作者像单个的消费者一样，会面对着一系列的效率价格，确切地说，应该是近似的效率价格，因此他们在作决策的时候，会考虑到成本信息。总之，效率价格指导着市场体制的中央计划，而不是计划的替代形式。

第三个差别标志着两种体制的区别。没有效率价格的中央计划，需要广泛的等级决策结构，以便协调由计划者们决定的许多生产线。在决定了什么应该生产之后，中央计划者将通过行政命令手段，监控着生产和把投入要素分配到每一条生产线上。基于市场体制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在市场体制中，中央决策仅限于确定产出，然后通过市场购买、补贴和税收来加以调控。总而言之，市场计划的核心是企业家，不是投入的分配者，也不是贯穿始终的生产监督人。

一、作为计划工具的市场体制

当然 市场并不是一种政府式的计划体制 许多人赞美它 仅仅是因为这样的理由。然而，当我们说它是政府主要管理工具的时候，我们认识到它是政府中央计划的一个重要工具。如果我们

对市场体制计划与旧式或更传统的计划概念的比较看得更加仔细一点的话，便能大大促进我们对市场体制的认识。

既然生产不仅是为了销售和对成千上万的个人及家庭的其他分派，而且也是为了集体目标，如研究活动、征募兵员、建设公路等，那么市场体制中的决策者或计划人员，就将进入市场以购买他们已决定生产的必要的东西。同非市场体制中的计划工作者有所不同，他们不会发布命令，不会确定生产指标，不会分配投入。他们不会通过行政命令来购买货物和服务。效率价格告诉了它们，每一个选择的成本都必须考虑。购买而不是命令允许它们去执行它们的决定，一切要靠购买来加以引导。

另一方面，既然生产决定着对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在食物、住房和娱乐等需求上的分配，那么市场体制计划获得了不同的转变。对此，我们能够想像出决策者会按他们认为是必要的数量来购买产品。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更为简单的方法，它在市场体制中事实上已经被实践着，这就是决策者会提高支付货物和服务供给商的价格，以希望供应商们能够增加生产。决策者们也会降低支付价格，以达到减少生产的目的。对于前者，决策者们大多会采用补贴手段，对于后者，要采用征税的手段了。正因为如此，通过补贴，决策者们增加了可资利用的住房供给，通过税收，削减了汽车的产量。

在这两种计划方法之中，市场体制的计划活动不同于类似的计划工作。

1. 在市场体制范围之内。首先，市场体制下的计划活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置于运行着的市场体制之中，它不是市场体制的对手，货币、价格和市场不仅仅附属于计划，也是计划的点缀。在大多数决策中，仍由消费者、工人和企业家而不是市场体制之外的计划工作者决定的。

2. 效率价格。如同我们已经说过的，由此而导致的差异，是因为市场体制中作中央决策的那些人，不管是内阁成员、立法者还是公务员，他们拥有着效率价格所反映出来的信息。在非市场体制中，效率价格一般是不存在的。

当官员们在征税和提供补贴，以修正和驾驭市场体制参与者的市场选择时，他们当然会用集体价值去施加影响。这表明，对于存在问题的任何货物和服务，他们会考虑把市场评价和效率价格看作是不合适的测算。可是，效率价格依旧告诉他们，个体参与者的价值是什么，以及每一个个体市场选择的成本，它会敦促他们把市场存在的评价和他们自己的评价作比较。另外，它还驱使他们在进行计划时，不仅不能忽略市场评价，而且还要想办法作出修正。在非市场体制社会中，官员们不会有这样的信息，也不会有这样的指南，更不要说修正的可能了，没有效率价格去告知，个人和大众是怎样评价的。

3. 序列决策。市场体制计划活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会给生产制定一个完整的计划，比如五年计划、一年计划等。相反，它会进行一系列的决策和计划，一次性地为市场体制的某个或某几个部分制定计划，并且会参照以前的决策以及对将来的预期，对待每一部分的决策。

有些人可能认为，不具有全面计划的序列决策，不值得使用计划这个词。这些人的看法已经过时了，他们所指的是旧的计划理论。要想了解为什么非序列的一年或五年计划过时了，我们最好去比较一下国民生产计划与家庭支出的决定。

如果你被要求起草一份家庭年度计划，以说明家庭在每一件物品和每一项服务上所要求的数量，此时你可能会感到难以下手。如果你设法对每一项都作出规定，恐怕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要预料到变化的需要、始料未及的条件、成本变化和新的物品和服务的

出现，这些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你不可能提前知道你的家庭在医疗上的开销，也许今年屋顶会突然发生渗漏，也许你将要一些 7 月份将面市的新的计算机软件。

值得高兴的是，你从来也不需要去实践这些一劳永逸的计划。相反，市场体制给你提供了一系列的选择，而每一项选择都可作出，只要它适合你的决定。你会根据已经制定的决策，去衡量每一项选择值不值得。假如你打算买一辆小汽车，那么同时你也会购买保险。你的选择是可以操纵的，在这一点上，你能够达到相当高的自主权，这是年度计划所难以得到的。很有可能，在你的内心世界，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年度开销的约束，它明确规定了你的开销范围，比如对本年度娱乐活动开支的限制。然而，你所做的计划，对近处的选择是完全明确的，并且呈现出序列化。

尽管你能够做到像你希望的那样无忧无虑，但是在另一方面，你可能会研究每一项可能的决定。各项决策之间的相互依赖告诉我们，每一项决策都不可马虎，需要进行检查，以便及时作出调整。一次性决策是需要的，每一个决定要按照你所希望的从范围和深度上都要进行研究和计划。

根据过去的计划活动的思想和观念，国家计划工作者和决策人应该同时做出五年计划或年度计划。按照这样的办法进行分配，我们终于看到，他们发生了错乱。更可管理和合理的国家计划要允许决策人和计划工作者们，依次面对每一个一次性的决策。这会提高决策人的能力，就像作出无止境的一系列市场选择的机会将提高能力一样。对需要考虑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努力，由于免除了在所有部分同时决策的责任而减轻了。

关于两种计划形式之间的评论，我的一位同事曾告诉我，在具备完全信息以及人类计算分析能力没有限制的条件下，这两种计划形式都能同等地很好地发挥作用，也就是它们都能理想地产生

影响。可是他没有领会我的意思。人不可能拥有完备的信息，不可能具备不受限制的分析能力。

4. 有差别的范围。两种计划方式之间的最后一个区别就是范围问题。在市场体制下的计划工作者对社会控制的范围内不像神那样灵通，他们通常会指望市场体制承担社会组织的大部分负担。尽管他们时常为他们的计划感到骄傲，但他们的典型的工作只能算做是对市场体制协调结果的勉强合格的补充。社会使传统的中央计划工作者承载着所有的重要的分配决策，比如应该生产什么，在哪一条生产线上进行生产，用什么样的资源进行生产。比较起来，市场体制下的计划活动限制了对生产的中央决策。在公民和他们的统治者看来，它优于市场中消费者的决策。仅就这一点而言，后一类型的生产计划是比较简单的，并且也更容易管理。由于不是同时要做那么多的工作，计划工作者或决策者能够将他们所做的工作干得更好，并且还没有什么挫折感。

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任何市场计划者没有理由制定计划的生产线中，如果计划制定者们持无为而治的姿态，决不会留下空虚和混乱，相反会使现存的市场体制继续运转。假如他们决定给大规模的运输系统提供补贴，不仅是因为没有他们所决策的运输仍将到达一个站点，而且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能改进不断发展着的运输系统。即使没有计划者们的决定，运输系统也能运转，火车是不会等着他们的。

二、一份清单

然而，关于市场体制及其替代物之间差异的思考，是否存在一种对市场体制有利的判断呢？对此，我一点都不怀疑。市场体制的替代物类似于市场体制，但它不存在效率价格，也没有一个企业

家核心。当然，还存在一种作为中央计划替代品的市场体制情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果有必要，中央计划也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可是，我并不是要宣称，具有优先决定的市场体制总是有效的，哪怕效率价格至少给它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效率，我一直担心着它会冲撞民主，不管怎样，这至少表明了某种关心，就是市场体制对个性和文化的影响。

在前面的几章中，我们感兴趣的是市场体制的有关属性，比如它的效率和无效问题，它对自由的影响结果等，但这不应掩盖我们在本书前几章里所讨论的市场体制的基本性质。处于计划中的市场体制，不可能做到这样。为了回忆市场体制的那些性质特征，让我们假定我们一致期望在我们的生活中给合作留下比较大的空间 如是否安排汽车的合伙使用 孩子的白天看护 造一栋房子 把哥伦比亚的咖啡运过来。即使一些希望的合作需要中央权威来组织，但我们知道，其中许多是可以留给个人处理的，让他们相互调整以达到协调。我们知道，人会发现许多合作的机会，而这些机会从来没有被当局所注意。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协调过程，市场体制的基石取决于相互调整的功过。

有时候，在相互调节的过程中，我们便不知不觉地进行着合作，比如和邻居一道修补篱笆，因为这项工作其本身可能是令人愉快的。有时候，我们无需花多大的力气，只要进行劝说就能安排相互协调的合作，比如：“你愿意跟我一起干这个活吗？我本人不能处理它。”可是 在多数情况下 我们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我们需要一些比较强硬的方法以影响他人，尤其是在那些持续时间较长的相互协调中，目的是为了获得其他人的合作。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赞成，作为一种一般性的准则，暴力威胁、肉体侵犯以及其他的强迫，应该被杜绝和禁止。那么留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只是某种原则或程序，即每个人都能够从其他人那里获得想要的帮

助，但也要随之给其他人提供好处。这就是社会协调最简单、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准则。

我想像不出任何理由，要一概禁止自愿的相互协调，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期望从中得到更大的好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好处可以被大大地扩张，尤其是在货币、信用和企业家出现之后。因此，市场体制最基本的理由已经确定下来了。如果个人、家庭或其他集团打算去享有一系列非强制性的机会以积极安排合作，那么他们就需要市场体制。

与市场体制不同的事例是永远不存在的。没有市场体制的社会的未来，根本不值得我们去思考在这个对市场一般要求的外面，存在着许多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呼声，有些是有说服力的，但基本上都带有我们已经考察过的缺陷。政治上的要求和断言的缺点，可能值得讨论，但作为普遍的基础性的主张不包括在内。

这个带有普遍性的要求并不表明，市场体制是足够的了。这不是对现有的市场体制的赞美，因为从总体上看它们都有不足的地方。这样的主张仅仅表明，在其他制度和社会进程之中，某些形式的市场体制在人类互相作用的某些领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当然，它也需要用其他形式的社会协调如政府、家庭、公司等来补充。

市场体制是我们所有生活方面的结果，它能够实现在我们的父辈看来是个惊人的连想都不敢想的合作，它把全社会、一个国家乃至全球都协调起来了，它帮助我们维护着社会的安宁。另一方面，市场体制本身具有的等价交换的原则，向社会学概念提出了挑战。市场体制可以被理解成一个重要的无所不在的社会结构和生活的一部分。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问您一句，您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类型的社会中呢？

责任编辑 蒋卫国
封面设计 阿海

现代
思想译丛



市场体制的秘密

THE MARKET
SYSTEM

美

现代思想译丛

资本主义的模式

[英] 戴维·柯茨

20世纪的性理论和性观念

[英] 杰佛瑞·威克斯

告别理性

[美] 保罗·费耶阿本德

传统与现时代

[德] 汉娜·阿伦特

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

[英] 约翰·格雷

后现代的伦理学

[英] 齐格蒙特·鲍曼

后现代性导论

[意] 约瑟夫·纳托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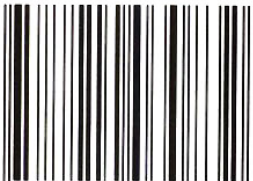
平等的理论和实践

[美] 罗纳德·德沃金

市场体制的秘密

[美] C·E·林德布鲁姆

ISBN 7-214-03083-7



9 787214 030832 >